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袁新洁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6

ISBN 978-7-210-04140-5

I.近… II.袁… III.①报刊—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②报刊—关系—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IV.G219.296 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3251号

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

作者:袁新洁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0791-6899010

发行部电话:0791-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数:227千字

ISBN 978-7-210-04140-5

定价:30.00元

承印: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文人论政”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从 1840 年到 1949 年,中国社会主要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幕幕恢弘的历史大剧中,作为“文人论政”载体的报刊,表现出了与纯商业性报刊及其他各种专门性报刊迥然不同的品质,他们始终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严复、谭嗣同,到孙中山、章太炎、于右任,再到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成舍我、邹韬奋、张季鸾、储安平等,从《循环日报》到《时务报》《新民丛报》《中国日报》《苏报》《民报》“竖三民”报,到《京报》《世界日报》,再到《生活》周刊、新记《大公报》及《观察》周刊等。这些报人和报刊的立场,或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或有偏差甚至错误;他们的声音,或旗帜鲜明,或模棱两可甚至稚嫩谬误;他们的力量,或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或改变了一部分人的信念。但是,他们在追求民族复兴、富强的过程中,勉力宣传中西各种政治学说,致力于他们心中的救国与报国之道理,积极参与,敢于担当,上下求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大舞台上,展示了舆论的锋芒,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国人的思想和言行,推进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文人论政”是近现代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传统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一般认为办报文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基本上否定了“文人论政”的积

极倾向和进步意义,鲜有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由于思想界的拨乱反正,正常的研究活动迅速地开展起来,并产生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本书研究的意义,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即“文人论政”传统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及其对当代新闻事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也就是说,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任何历史人物归根到底都是时代的产儿。因此,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作为时,应该把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而不能用今天标准去苛求。列宁也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作者在书中提出,我们对以王韬、梁启超、邹韬奋、张季鸾及储安平等为代表的“文人论政”传统的评价,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不能简单地否定,也不能不加分析地肯定,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即“扬弃”。我们要注意挖掘“文人论政”传统中最能体现其本质和精神的内涵,鉴古照今,使我国当代报刊的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更加有机地结合,在创新中前进,使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的舆论支持作用。

该书的研究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厘清阶段,注重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作者在多年的新闻实践和研究工作中,深感“文人论政”传统对当今新闻从业人员的重要意义,深感这一领域是值得深入挖掘的领域。从1840年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1949年的一百多年时间内,仅这一传统表现出的深厚的爱国情怀及其风范,就值得让我们赞赏。但作者也看到,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逐渐丰富,但还不够系统。许多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人物或事件,其中虽然不乏鸿篇巨制,但仍无法从整体上体现出这一传统的思想力量。故作者在借鉴各家观点、结合自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分成五个阶段进行仔细梳理,并对其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作了尽可能充分的阐述,以便人们从整体上把握“文人论政”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二是史论结合,注重对代表报刊的言论研究。“文人论政”要落脚在“论政”上,所谓“政”,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现实;“论”主要体现在报刊言论上。因此,作者在宏观的历史观照中,特别注意对“文人论政”代表报刊的言论研究。其原因是:一方面,言论是报刊的灵魂,是体现报刊政治面貌的旗帜;另一方面,“言为心声”,言论特别是社论较为鲜明地体现了撰者的立场和观点,较之其他新闻体裁,其更有利于我们把握撰者的倾向。通过对那些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言论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考察他们的办报思想,从而对诸多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解释。

三是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对“文人论政”传统进行剖析。作者的这一选题酝酿已久,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作者对占有的文献资料作了深入仔细的分析研究,以求考索源流,辨析真伪,胥释有据。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文人论政”传统进行了切中肯綮、人情入理的剖析,既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我与袁新洁相识已久,他是一个勤奋的人,能够在繁忙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余,拿出这样一本颇有新意和分量的专著,我感到十分欣慰。我记得他是从199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那时他才二十多岁,一个人承担了一所大学的校报编辑工作,同时还要负责学校

的对外宣传工作。他热爱新闻事业,视之为自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他克服重重困难,一直在这一领域耕耘不已的动因。他善于动脑筋,工作颇有成效,从助理编辑一直晋升到主任编辑。一个高校的新闻工作者,能够在新闻系列里晋升到高级职称,这在湖南省的高校中是并不多见的。希望他能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多出一些更有分量的成果,以回馈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8年10月20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中国新闻史上光彩的一页	1
余论 期待政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第一章 发轫:放眼世界的呼声与变法自强的前奏	12
第一节 “文人论政”传统发轫的历史条件	12
第二节 近代早期“文人论政”的特殊性之成因	22
第三节 “文人论政”传统发轫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 ——王韬的报刊活动	30
第四节 《循环日报》及王韬报刊思想评析	34
第五节 王韬报刊思想的历史影响	56
第二章 承启:“维新”与“革命”的鼙鼓	61
第一节 “文人论政”传统承上启下的时代条件	61
第二节 “文人论政”传统承上启下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85
第三节 《时务报》《新民丛报》及梁启超报刊思想评析	89
第四节 梁启超报刊思想的历史影响	116
第三章 发展:上下求索的呐喊	121
第一节 “文人论政”传统发展的主要原因及体现	121
第二节 “文人论政”传统的衰退与再度兴起	141
第三节 “文人论政”传统发展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 ——邹韬奋的报刊活动	148
第四节 《生活》周刊及“韬奋精神”核心内涵评析	151

第五节 邹韬奋对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创造性贡献 及其时代意义	170
第四章 高峰:抗日救亡的战歌	174
第一节 “文人论政”传统高峰阶段的政治环境 与新闻政策法规	174
第二节 “文人论政”传统高峰阶段的新闻背景	178
第三节 “文人论政”传统高峰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 ——张季鸾的报刊活动	186
第四节 《大公报》及张季鸾报刊思想评析	190
第五节 张季鸾报刊思想的历史影响	225
第五章 尾声:自由主义的绝唱	230
第一节 “文人论政”传统尾声阶段的社会环境 和新闻界的状况	230
第二节 新闻界的斗争与“文人论政”高潮的出现	233
第三节 “文人论政”传统尾声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 ——储安平报刊活动	239
第四节 《观察》周刊及储安平报刊思想评析	244
第五节 “文人论政”的高峰,自由主义的绝唱	271
参考文献	282
后记	292

绪论 中国新闻史上光彩的一页

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该报一改中国传统报刊以传抄上谕、刊载奏章为主要内容的办报方式,而以“立言”为目的,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刊,成为近现代以来“文人论政”传统的发轫。继王韬之后,梁启超的《时务报》《新民丛报》,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张季鸾的《大公报》,储安平《观察》等,无不以这一传统为标榜并将其发扬光大。

综观世界报刊史,“文人论政”之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枝独秀,是因为其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背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华大地上风雨如晦。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感于国势的威迫,“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积极“入世”,勇敢担当。他们热切地借助报刊这种新载体,抒发言论,评议时政,以文章来为国家扶善除恶、激浊扬清,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以实现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从《循环日报》《时务报》《新民丛报》,到《生活》周刊、《大公报》,再到《观察》,时间跨越了70余年,这些报刊的“文人论政”实践,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光彩的一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报刊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尤其是报刊事业,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外国的渗入和入侵有很大关系。所以,近代新闻事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便注定和“言论救国”“新闻报国”分

不开,和“文人论政”分不开。

什么是“文人”,按《辞海》的解释,是指“读书能文的人”,亦即读书人、儒生抑或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什么是“文人论政”?方汉奇先生认为,文人论政自古有之。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①这些传统对他们当时的政治作为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后世的报人产生了深刻的示范性影响。纵观百年新闻史,“文人论政”传统的产生、存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

在我国古人的观念中,有著名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德”指的是人格、操守方面;“功”指的是事业方面;而“言”指的是学术与思想方面。近代中国不以功业而以思想、言论报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王韬为第一人。其《循环日报》部分地表达了王韬的循环史观。他坚信,中国通过变法图强,能够再度崛起。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最显著的成效之一就是创办新式政论报刊。这些报刊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将报纸作为完成政治目标的利器,作为唤起民众、统一民众思想的工具。正因为此,报刊的论政作用首次为万众所瞩目。在梁启超所创办、主持的报刊中,《时务报》使梁成为“舆论界的骄子”。《新民丛报》办得也很成功,正是这份报纸,奠定了梁启超在近代新闻出版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梁启超的文风也影响了一代人。可以说,中国的政论报刊是因“戊戌维新”而异军突起的。此后,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和留日学生掀起了创办政论报刊的热潮,这些报刊对辛亥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文人论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就是一个标志。1926

^① 《方汉奇历数香港〈大公报〉家珍》,香港《大公报》,2002-06-12.

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成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最终的办报宗旨。1926年,邹韬奋正式主持《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在他的宣传鼓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储安平是新闻科班出身,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储安平创办《观察》尽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坚定的自由主义品格,使他成为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的化身。

综上所述,笔者将在本书中着重阐述和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探讨“文人论政”传统的思想渊源、历史(含时代、新闻、政策、法规等)背景以及“文人论政”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中各个层面的体现及其历史意义等。笔者认为,近现代“文人论政”的传统。是内外思想影响和内外局势交困的结果。它既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清议”传统的影响,又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熏陶。它是在百余年来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仁人志士不断追求救国救民良方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新闻、法律制度由封闭走向开放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这一进程虽然屡受挫折,但其报刊活动和报刊表现却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爱国”“救国”。这充分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言论救国”“新闻报国”的深厚情怀。

第二,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探讨“文人论政”传统的发生、发展和嬗变过程。本书尝试着将“文人论政”传统分成五个阶段进行研究。这五个阶段分别是:发轫阶段(鸦片战争—维新运动前后),代表人物和报刊是王韬和《循环日报》;承启阶段(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前后),代表人物和报刊是梁启超和《时务报》《新民丛报》;发展阶段(民国成立—十年内战结束前后),代表人物和报刊是邹韬奋和《生活》周刊;高峰阶段(七七事变前后—抗日战争胜利),代表人物和报刊是张季鸾和《大公报》;尾声阶段(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

胜利前后),代表人物和报刊是储安平和《观察》。这个历史分期方法,主要参考了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著作。这五个阶段具体包含了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三次国人办报高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阶段。本书以“发轫:放眼世界的呼声与变法自强的前奏”“承启:‘维新’与‘革命’的鼙鼓”“发展:上下求索的呐喊”“高峰:抗日救亡的战歌”“尾声:自由主义的绝唱”等体现“文人论政”的特色。

二

“文人论政”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传统之一。虽然近现代知识分子去中心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却延续了下来。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文人论政”的主流评价,却没有脱离阶级斗争的范式。一般认为,办报文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基本上否定了“文人论政”的积极倾向和进步意义。近几年来,新闻界关于《大公报》研究的成果,对重新审视“文人论政”传统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汉奇等学者就“小骂大帮忙”等一些不准确的提法进行了澄清,明确提出“文人论政”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肯定了“文人论政”传统对于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本书研究的意义,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

具体地说,在宏观的历史观照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韬、梁启超、邹韬奋、张季鸾、储安平等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阶级立场、政治倾向、办报理念等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共有的、通过报刊实现对国家社会扶助匡导的理想,则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维新志士。他们办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救国救亡、富国强国。二是他们具有敢作敢为的风格,敢于发表

政见。他们深受儒家“威武不能屈”“成仁取义”等精神的熏陶,敢于用一支笔、一张纸向强大的旧势力宣战。三是他们大多具有深广的学识,具有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学者,如王韬、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陶行知等。他们对于政治动向和社会大势,常常能做出颇为深刻的分析和省察,对于外来的先进文化也多持“拿来”的态度。四是他们大多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较为关注民众的呼声,他们曾经提出报纸应当反映民众的活动,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等著名的观点。

但是,“文人论政”的传统并非没有历史局限性。比如,在维新变法时期,从政论思想来看,改良派内部,从右翼到左翼,虽然同在维新变法的旗帜下进行合作,但内部的分歧却是显而易见的,反映了维新派内部思想涣散,这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从政论文体表现来看,有守旧派人物的“桐城文体”,也有风靡一时的“新民体”“桐城文体”无法表达变革之激情已成为学界共识,但纵如梁启超之表现者,其文章亦存在诸多缺陷,如好说过头话,常常铺陈过度,重叠拖沓;信笔写来,立论有时前后矛盾;文字不够严谨,有时过于夸张,并且比附牵强,好走极端等。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报刊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使得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但由于忙于武装起义,忽略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这个任务却由梁启超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来完成。这一时期,革命派报刊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政论过于乐观,以为打倒清廷,民主便可到来,对民主制度的认识显得简单,对革命的前景和力量对比得不够清晰,而且对外国势力的看法过于幼稚和单纯。在办报思想上,革命派高度重视报纸的舆论工具作用,把政论视为斗争的锐利武器,但其思想却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烙印,以“先知先觉”自居,视群众为“后知后觉”。虽然其宣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总体上说,他们对资产阶级新闻学说的认识还是肤浅的。

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对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居功至伟。但其政论也在激进中沾染了片面化、极端化的毛病。其全盘西化的主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在很长时期内都不能清除。从政论的文体看,白话文的应用刚刚开始,并不熟练,读起来还比较拗口等。

抗战时期,这些报刊从抗战建国的高度出发,主动“服从国政,接受统制”。这些主张在国难当头、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是合情合理的,便于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对抗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对于服膺领袖的过于强调,削弱了其战斗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报刊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缺乏正确的认识。正是因为这些报刊没有立足中国国情的意识,“文人论政”传统成了“自由主义的绝唱”。

因此,对于王韬、梁启超、邹韬奋、张季鸾、储安平等人的报刊活动和报刊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也不能不加分析地肯定,而要批判地继承,即“扬弃”。我们要注意挖掘“文人论政”传统中最能体现其本质和精神的内涵,使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积极的舆论支持作用。

三

本书将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对“文人论政”传统进行剖析,以求广搜材料,考索源流,辨析真伪,俚释有据。文献主要包括报刊档案、学者专著、报人回忆录以及传记等。报刊档案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新闻研究资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资料选辑》、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中国新闻史文集》等。学者专著如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同类书中还有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曾建雄的《中国新闻评论发

展史》、单波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等。报人回忆录如《报人生涯》《老报人访谈录》等。传记如《清代报人研究》《张季鸾先生传》等。笔者选取了近现代以来在“文人论政”传统中有代表性的报刊和报人,逐一分析、概括了其时代背景、报刊活动、报刊思想及历史地位等。

在诸多文献中,给笔者提供了重要佐证和观点支持的资料是:王斌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舆论思想研究》、夏红娣的《文化认同和自我建构的两种方式》、宋石男的《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研究(1834—1911)》、雷蕾的《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关口》、李艳红的《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黄靖逢的《邹韬奋的媒介文化观》、孟芳的《邹韬奋期刊编辑思想研究》、张亚华的《试论邹韬奋新闻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当今的拓展》、刘江浩的《报人张季鸾办报思想研究》、施喆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的探寻与游移》、全燕的《论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变化》、王自成和郭斌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报刊》、王先孟的《论〈观察〉时期储安平的新闻思想》、郑林的《〈观察〉周刊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的自由主义文人论政》等。

在诸多文献中,笔者特别注意对于“文人论政”代表报刊的言论研究。其原因是:一方面,言论是报刊的灵魂,是体现报刊面貌的旗帜;另一方面,“言为心声”,言论特别是社论较鲜明地体现了撰者的立场和观点,较之其他新闻体裁,其更有利于我们把握撰者的倾向,从而对诸多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解释。“政”主要是指当时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政治背景;“论”主要体现在报刊言论上。王韬、梁启超、邹韬奋、张季鸾、储安平等人无疑都是名重一时的言论大师,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言论篇章。但是,在研究中笔者也发现,这些言论更多的是对时局的分析和看法,并不直接涉及其办报思想。笔者尝试着将各种题材的评论作为他们办报思想的“案例”,一方面印证其提出的办报理念及宗旨;另一方面,从这些“案例”中提炼出其办报思想的某一个方面。这样,确立了以“案例”求思想、以思

想寻“案例”的思路。笔者以“小心求证”的态度,期望能够探究其办报理念之一斑。

在诸多文献中,笔者也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台湾学者的研究资料,如赖光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及《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其他如黄天鹏校订、楼榕娇著述的《新闻文学概论》,该书从文本表述方式的不同上,把近代新闻史分成了文学时代、政论时代等,对笔者的研究颇有启发。

此外,笔者还采用了理论分析的方法,运用新闻学理论对材料进行细致分析,以达到史论结合的目的;采用了思想比较的方法,以表现“文人论政”传统的演进和发展过程。

人既生活在纵向的历史时空中,也生活在横向的自我创造的社会环境里。纵向的,是指历史在塑造着人;横向的,则是指人在创造历史,由此便构成了人生活在世上的坐标。王韬、梁启超、邹韬奋、张季鸾、储安平等人也同样如是,他们既有被历史塑造的一面,即其思想的渊源和流变;他们也有创造历史的一面,即用自己犀利、透彻的评论影响读者、影响政治、影响历史。所以,本书将主要以“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为经,对他们思想的渊源流变、宗旨、理念、编辑及管理等进行探讨;以他们具体的报刊实践为纬,通过那些能反映其思想的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评论性文章,从横向深入考察其办报思想。另外,关于他们办报思想之具体体现,笔者则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首先是办报思想的渊源,其中包括客观历史渊源和主观现实渊源;其次是办报的宗旨和理念,这是办报最为重要的思想,也是办报其他各方面的统领;最后是办报实务方面的问题,包括采、写、编、评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四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于“文人论政”传统的研究,以改革开

放为界,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前,由于政治运动迭起,“文人论政”作为资产阶级新闻活动的标志,几乎遭到了全盘否定。除梁启超因维新变法而垂史,邹韬奋因“韬奋精神”而被时赏之外,王韬在新闻史界之外几乎鲜有所闻,张季鸾则横遭“批判”。王芸生在撰写《张季鸾传记》时曾说:“我多次动念头,多少次又都放弃了,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机敏。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恰当地还一个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事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笔如何下?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①至于储安平,他于1949年奔赴解放区,加入人民新闻工作者行列。在反右运动时,他因一句“党天下”失去了一切。当时对于他的研究,几乎成为禁区。

改革开放后,由于思想界的拨乱反正,这些不正常的情况有所改变,一些误解有所消释,正常的研究活动开展起来了。对于王韬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忻平的《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海林的《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夏良才的《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谢骏的《王韬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新闻大学》2001年),洪煌的《以王韬为例看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等。

对于梁启超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张品兴等的《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喜所、元青的《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颢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瑛琦、刘宾声的《从“去塞求通”主张的提出到“言论独立”

^① 转引自王芝琛:《浅识张季鸾先生》,载《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思想的破产》(《学术交流》1996年第5期),石云艳的《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南开学报》2003年第5期)等。

对于邹韬奋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雷群明的《韬奋的编辑思想》(《出版发行研究》1991年第5期),牛聿化的《韬奋编辑思想略论》(《编辑学刊》1991年第2期),王畅的《“永远立于大众的立场”》(《编辑学刊》1994年第3期),赵晓恩的《对韬奋先生的深切怀念》(《中国出版》1995年第12期)及其《邹韬奋与抗日救国运动》(《出版发行研究》1996年第6期),梁小建的《〈生活〉周刊的改刊过程及意义研究》(《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6年)等。

对于张季鸾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三联书店出版1986年版),胡文龙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周雨的《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彬的《新闻工作六十年》(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方汉奇等的《〈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傅国涌的《“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等。

对于储安平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林元的《从〈观察〉到〈新观察〉》(《新文史料》1989年第4期),马光仁的《储安平与〈观察〉周刊》(《新闻大学》1994年第4期),宁树藩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1982年《中国新闻年鉴》),丁淦林的《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新闻大学》2004年秋季卷),冯英子的《回忆储安平先生》(《黄河》1994年第2期),黄汉的《追踪储安平的心路历程》(《新闻大学》2000年第4期),姜红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流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等。

今天,我们只要打开“百度”网页,输入“文人论政传统”几个词,就可以搜寻到相关网页记录约6710篇。故以上所录,只是关于“文

人论政”传统很少的一部分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无尽的启发。我们学步其间,深深地感觉到:历史的传承,早已让这一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中一种生生不息的因素。

余论 期待政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而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1948年12月储安平《观察》被国民党查封,这一传统绵延了至少75年。1949年是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一个旧的时代的终结。曾光耀百年中国新闻史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文人论政”传统,包含着公正、客观、理性的品质;论政、刺政而不从政,公开批评而不介入权力之争的立场;富有责任感,勇于负责的态度;常带感情的笔锋及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走入了我们的意识深处。纵然时光流逝,但这些先贤们执著的理想依然在历史的分界处闪烁着光芒。

近现代“文人论政”传统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浓厚。这从以下几点办报思想中可以看出。一是要从有利于治国的角度对待报业。具体来说,就是国家要对报纸加强管理,实施有组织的控制,并制定报纸法律。二是指出报纸对于国事具有耳目喉舌、“去塞求通”的作用。三是提出了“文人论政”的主张。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感,又据理性加以公开的建言,这是那一批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清议”传统的薪传。四是提出报纸在文风上应当浅近义明、通俗易懂。五是体现了近代报人独立的精神世界。六是提出商业经营的思想等。总之,这些报刊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报刊通过“文人论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为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为维新运动的发展,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为“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启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政论仍是中央和省市党报偏重的言论形式,如社论、短论等。它们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时,虽然“论政”的主体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但“论政”的载体形式依然得到了沿袭。特别是1956年以《人民日报》为典型的新闻工作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它使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得到了更新与解放。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冲破了教条主义和盲目迷信的束缚,指出对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经验,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而要有分析地借鉴,择其善者而从之;对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特别是中国的报刊传统,我们不能简单否定,而要批判地继承,以使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风格多样,各具特色。通过改革,广大新闻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要办好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继承优良传统并创新前进,使新闻的社会主义内容与我国的民族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①这次改革虽然为时短暂,但是它指明了方向,直接影响到“拨乱反正”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拨乱反正”前后,思想的解放、真理标准的讨论,启动了新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舆论作了充分的准备,评论充当了舆论的先锋。政论紧密结合时政的特色,以及它及时、广泛的传播特征,为它占领舆论阵地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拨乱反正”以后,思想禁锢得以解除,报刊主体评论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期望发表意见的客观需要,媒体通过开辟新的渠道来满足群众表达意见和呼声的诉求。1980年1月2日,《人民日报》再开风气,在头版开辟“今日谈”专栏,由小言论开路,在全国报刊掀起言论的高潮。今天,除《人民日报》的“今日谈”“人民论坛”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光明日报》的“今日话题”《经济日报》的“每周经济观察”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369页。

“星期话题”，《解放军报》的“集思广益”，《中国青年报》的“求实篇”，《法制日报》的“法制论坛”，CCTV 的“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等。这些栏目的开辟及其造成的权威性的、深远的社会影响，带动了评论的复兴，从而也带来了政论的复兴。

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晚报、都市报、专业报的兴起，使得政论在新的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杂文创作的再度兴起，更为这一传统增添了几分骄人的成绩。具体表现为：作者队伍多元化，既有新闻工作者，又有作家和学者，还有基层的业余工作者；思想内容多元化，只要是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都是杂文的题材，这与鲁迅当年集中在政治文化领域的论战方面不同；文体形式的多元化，随笔式的、故事化的、以议论为主的、讽刺的、阐释的、鞭挞的，异彩纷呈，不拘一格。

当前，政论的影响深度和范围较以前相比发生了更为巨大的变化。从总体上说，政论回到了求真务实的道路上，它对新时期舆论环境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受众越来越多地走向新闻论坛，参与其中，互动性增强；文体个性化，形式活泼，文风清新。在论证的方式上，语言表达有个人色彩，不再是标准件制作，不同作者各展其长，各有色彩。艺术水平提高，对读者的吸引力增强，因而使意见的传播面更广，也影响到了愈来愈多的受众。从形式上讲，政论的发展趋势呈现出立体化的新的发展态势，可将其概括为社会性、专业化和个性化等三个方面。同时，第四媒体网络评论的兴起也在冲击着传统的新闻评论，这些政论悄然地改变着传统媒体评论教导化、主体单一、滞后性和思想单一、意识形态化的弱点，呈现出主体复杂化、交互式、思想多元化和平等交流的优点，从而更能彰显民意和舆论监督的优势，因而其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其前景值得期待。

马克思认为，报刊应该是政治的因素，但不是官方的因素。^① 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9 页。

克思向往真正的报刊,希望报刊在毫无阻碍、独立自主的条件下按照自己的特点自由发展。在《莱茵报》上,他用充满着花的芳香的语言抒发了自己对这种报刊的向往:“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担当了各种罪过,并准备为它和它的荣誉忍受一切屈辱。它的报刊正在抛弃傲慢的外表以及自满和武断,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精神的玫瑰花”,“那时,每家报刊都完全会体现出真正的伦理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表现了玫瑰的特质并散发出玫瑰的芬芳一样”。^①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我们可以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为发展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方向,这必然会为政论的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第一章 发轫：放眼看世界的呼声 与变法自强的前奏

第一节 “文人论政”传统发轫的历史条件

一、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使中国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同时也将一个陌生的、色彩斑驳的外部世界呈现在昏睡已久的国人面前。伴之而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面对空前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时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从醉心科举的迷途中警醒起来，开始从故纸堆中探出头来，把眼光转向了活生生的、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学习和认识西方文化，希冀从中寻求救国之道。在巨大的危机和西方文化的示范作用下，他们意识到不自强则不能立国、不学西方则不能自强，由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社会的新气象，也开始影响到传统价值观念的变迁，传统士人开始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士开始清晰地意识到社会危机的严重性，正如奕訢所分析的，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是“外忧内患，至今以极”^①。就“内患”来说，清朝统治集团既

^① 奕訢等：《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折》，贾祜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13~2916页。

有近忧——手持洋枪洋炮的太平军依然存在,并与清军对峙;也有远虑——今后“倘山卿海隅,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心意,一旦辍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能御之?”^①同时,清廷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从而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并希望借此来维持、加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这些人有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以及冯桂芬、郑观应、马建忠、宋恕、宋育仁、薛福成等为代表的下级官员或幕僚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批人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秉承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在深刻的民族危机面前,积极主张采西学、兴洋务,寻求自强、自救之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的体用观,把思想认识从魏源等人的浅层次“技不如人”,推进到“人自不如”,^③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与不足,把“师夷”的内容从“长技”发展到学习诸国的“学”——包括“长技”和知识、观念等。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多方考察和收集西方的资料,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足进行反省,以探求“救时”良方;提出了诸多具体的“富强之术”,并指导和应用于洋务运动的具体实践。

同时,根据《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清廷被迫割让香港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并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从事传教、开设学堂和医院等活动。这使得原来一直以南洋为基地的传教活动,开始转移至中国内陆直接输送西学,从而使通商口岸变成了西学传播的基地。这六个城市,散布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半月形地带,……西学通过这一地带传播,其规模、影响与先前通过南洋飘拂而来不可同日而语。一口割让,

① 李鸿章:《致总署》,宝璜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第9页。

② 冯桂芬:《采西学》,戴扬本评注:《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③ 冯桂芬:《制洋器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五口开放,开始了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①据统计,从1843年到1860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这6个城市共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达434种,几乎与明清之际200多年间译著的西书数目相等。这也为沿海通商口岸的中国士人们提供了接触西学的途径,并引发了他们的思想变革。其中,墨海书馆可以说是近代西学东渐浪潮中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据点,在1860年以前的西学传播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从1844年墨海书馆印刷出版物开始,到1860年美华书馆在上海立足,这期间墨海书馆共出版了大约170多种书刊。

如此大规模的出版翻译活动,不是来自异域的传教士力所能及的。因为他们来华日短,汉语又繁复难学,雇佣中国文士为之笔述和润色便成为当务之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谈及江南制造局译书方法时曾言:“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之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②

傅兰雅描述的译书方法不仅适用于江南制造局,而且也适用于其他翻译机构。“西士之口,华士之手”是传教士译书中的普遍现象,参与翻译西书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王韬、李善兰、管嗣复、蒋敦复、周双庚、邓子明、邓子衡等人(洪仁玕追随传教士避祸香港期间,曾一度到上海墨海书馆,并与王韬相识,后长期待在香港,充当传教士助手,从事传教活动)。为传教士充任译书助手的中国文士是这批西书的第一读者。墨海书馆不仅造就了他们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而且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这批中国文士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传统的儒

①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② [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见《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生转变成成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一些还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

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尚处在巨大变革的前夜,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感到巨变即将到来,体验到西学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但他们毕竟还无法超越那个时代。在新旧交替、中西杂糅的转折关头,“口将言则嗫嚅,足将进则踌躇”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沿海通商口岸经济的发展,以及为了逃避战祸或迫于生计,一部分文人开始放下架子接受西人的雇佣。而类似墨海书馆的出版机构为一批传统文人提供了机会。但此时他们对西学的认识毕竟主要限于书本,仍是肤浅的、表层的,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仍是主流。他们只是从原来的轻视西学变为正视西学,看到了西学的一些长处,但尚不足以动摇他们心中的“圣人之道”。他们在超越传统而又依恋传统之间徘徊,传统的义利观、夷夏观和体用观仍左右着他们的思想。直至1859年,王韬在致友人周弢甫的信中第一次系统地表达对时政与西学的看法时,仍以“中西国情不同”,“机器夺民之利”为由反对采用机器、修筑铁路;以对外贸易“有大害于中国”而反对与西人互市通商;指斥西方立法之“大谬者有三:曰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①。他还以“道器”“本末”来概括和比较中西文化,称“形而上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西人也,以器胜”^②。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士子中最流行的看法。

19世纪60—8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兴起与发展,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在晚清这一中西文化的交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从传统型转向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又是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者。王韬游历欧洲后,对西方社会有了亲身的体察,思想上产生了重大的飞跃,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

^{①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忧国忧时的魏默深”^①。同时期的洪仁玕因避祸寓居香港4年,西方文明也深刻地冲击着他的思想,以至于有了《资政新篇》的诞生。他们代表了在感受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后,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典型士子形象。另外如伍廷芳、黄胜、容闳等人,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并有留洋经历,更是充分地认识到西方文明将对传统的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些条件,使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开阔了视野,因而能在更广泛的层面、更深的层次上对中西之学进行比较和选择。同时,由于他们不像洋务派官员那样身处高位,也没有承担洋务事业的实际任务,因而能够超脱洋务运动的局限,对洋务企业作出比较客观的评判。所以,他们在思想上又较洋务派更激进。思想上的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实践行动,他们以所学所闻所知,为中国开出自己的“药方”,寻求自强之道。在中西文化交会这一广阔背景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转型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二、近代中文报刊商业化的转型

鸦片战争前,清廷执行严格的“禁教”政策。迫于情势,传教士们创办的中文报刊大多采取的是开拓传教事业、执行对华宣传的策略,宗教报刊是传教士报刊的主体。战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量通商口岸的开辟以及自由传教权等一系列特权的获取,“禁教”的障碍不复存在,在华外报开始转型。沿海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贸易信息需求的剧增,为中文商业报刊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在这种情势下,宗教报刊逐步全面让位于商业报刊,这种现象在香港和上海最为明显。

商业报刊的发展,推动了报刊观念与业务的变化。原来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主要以传教为目的,因此为了适应中国的传统习俗,在

^① 钟叔河:《曾经沧海,放眼全球》,转引自董桥:《王韬的心情》,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很多方面没有采取西方较为成熟的报刊方式,而是依附中国传统邸报的样式,其中的新闻含量自然不高。总的态势是,传教士报刊前期以传播教义为主要内容,后期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地理、历史、政治以及收集中国的情报信息为主要内容,旨在改变中国人思想闭塞的状况和宣扬西方的先进文化。即便间有一些商业信息等,也并不很注重时效性,更类似于现代的杂志或期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报刊。

1853年,由马礼逊教育会主办的香港第一份中文宗教报刊《遐迩贯珍》创刊,上述情形才有所改变。《遐迩贯珍》虽为传教士所办,但宗教内容已经退居其次。在内容上以时事新闻为重点,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当时时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既有报道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新闻,也有反映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信息。《遐迩贯珍》无疑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的,但在报道中国内部消息时,因其地处香港,不必顾忌清廷的干涉,而能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事情的真实面貌。该刊还注重对西方文化知识的介绍,尽管明显的有炫耀西方文明、为殖民政策辩护的用意,但对中国人还是很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的,对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中国和世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新闻业务方面,《遐迩贯珍》也有了长足发展,消息、短讯、通讯、评论等近代新闻体裁已初具雏形,还出现了连续报道等新的形式。1855年,《遐迩贯珍》增出副刊《布告篇》,随报发行,专载商情及船期。《布告篇》率先在中文报刊上推出广告收费举措,标志着近代中文报刊的一个重要转型。

鸦片战争原是为抢夺中国市场而引起的,因而战后立即出现了大量舶来品向五口通商口岸倾销的局面。香港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直接控制的地区,又是海外与内地的重要中转站,因而中外贸易在此地率先发展起来并迅速走向繁荣。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中文商业报刊的孳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香港最早出现的中文商业报刊,大多是从早已成熟的英文商业报刊中脱胎的。1857年,由

孖刺报馆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创刊。该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最早的经济类报刊,所刊内容以船期、商品价格、商业行情、商业信息和广告为主。此后,《香港新闻》《中外新闻七日报》《香港华字日报》《香港中外新报》等中文商业报刊先后创刊。香港中文商业报刊的发展,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并成为全国的样板。

鸦片战争后,上海等5个沿海城市被迫对外开放。由于上海地理位置优越,又有广阔的长江流域作为腹地,因而立即成为外国侵略者的青睐之地。19世纪50年代,上海报业开始起步。与香港报业发展道路一样,上海也是先出现外报。最早的外报是1850年创办的《北华捷报》,初创时主要刊登广告、行情、船期等商业性材料。但上海外报的整体发展程度赶不上香港,至1860年仅出现了4种英文报刊。由于上海有突出的经济地位,这一时期及稍后出现的中文宗教报刊,如《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也以提供新闻信息为主,有的还带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上海后来居上。至1865年,全国对外贸易商品的一半通过上海集散,使上海逐步取代香港而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随着上海地位的日渐上升,至19世纪90年代时,上海已发展成为全国最繁荣的报业中心。

商业报刊取代宗教报刊,强化了信息观念。为了最快地获取最新信息,在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这一时期的报馆纷纷引进了先进的通讯系统,改进了采访工作等。在业务与经营模式上引入和借鉴了西方国家成熟的模式,完成了近代外报在华的商业化转型。需要指出的是,外国主办的中文报刊也非一味地照搬本国已有的模式,他们深谙只有最大限度地适应和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才能在商战中克敌制胜。他们为适应中国国情,尝试了许多改革和变化,以努力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如在报刊业务与经营上往往延请华人加入,担当主笔或编辑工作。至此,一批早期中国文人开始亲身体验“新

闻纸”的印制过程,为以后中国人创办报刊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1871年,上海《申报》的创立,是中文商业报刊的又一个里程碑——独立商业报刊开始出现。《申报》的飞速发展,标志着中文商业报刊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并成为我国商业性报刊的一个成功典范。中国的第一份自主经营的文人报刊《循环日报》就创办于这一时期。

三、国人自办报刊的开始

近代报刊作为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一项内容,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一批较多接触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实践中敏锐地发现,外报虽然给国人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世界及信息交流形式,并且拥有舆论传播功能,但外报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殖民地、附庸国的道路,而非出于促进中国的进步。因此,他们开始设想自办报刊以宣传拯救中国危局的新思想。郑观应曾说:“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而周知天下之事。”^①一批早期维新人士看到了报刊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探寻民族出路,在19世纪70年代,艾小梅、王韬、伍廷芳、陈蔼廷、容闳等开始了自办报刊的尝试。这些人士大都亲身感受了西洋文明,并长期从事洋务活动,在与传教士的深入交往中接触了现代印刷和出版事业,这些为他们日后的新闻实践活动积累了经验;同时,思想上的变动,也为他们放下传统的“贵义轻利”“农本商末”“夷夏之辨”的旧思想,选择积极投身于报业实践,实现“商战”救国的新思想作了思想和价值观上的铺垫。中国早期的新闻事业由他们发端,也就成了非常自然的事情。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在国内创办报刊前后累计约20种,创办地点集中于香港、广州、上海及其他口岸城市。办报人士一是较多

^① 《郑观应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页。

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教育、具有社会改良要求的知识分子,如王韬、伍廷芳、黄胜、容闳等;二是洋务派官员和新生官僚买办阶层,如上海知县叶廷誉、招商局总办唐景星、上海道台冯煊光等。

香港是这场报刊实验的重要发源地,“自西洋报刊输入中国,开人智慧,映入眼帘,知新人士,渐次仿行。香港为开风气之先”^①。香港成为中国自办报刊发源地并非偶然,而是政治、经济、思想等诸多因素发展的共同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建立了殖民主义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改变了香港原有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在最初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殖民主义者牢牢控制着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命脉,作为居民主体和开发香港主力的华人却备受歧视和压迫,处于上升阶段的华商、买办的经济实力此时也一时无法与洋商相抗衡。此时,报刊作为港英当局传递政府政策,广播商业信息,反映商人、市民利益等方面的一个重要工具,长期以来为英人所把持,尚没有一份华人自办报刊的问世。19世纪60年代初,随着香港华商的日益大增,他们开始逐渐超越洋商,成为香港财经的支柱。“他们约掌握了当日香港贸易总额的1/4。”^②此时,华商迫切需要一份为自己说话、为自己服务的报刊。

由于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都是依附外文报刊的中文版,这些报刊虽然与中国人和中国知识界关系密切,但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自办的报刊,而是由国人参与主持的中文报刊。1874年,王韬创刊《循环日报》,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份完全意义上的国人自主创办经营的近代报刊。

至于第一份国人自办报刊,一说是1872年在广州出版的《采新实录》。但是,这份报刊由于早已失传,具体情况又不可考,因而不为新闻史学界所认同。不少新闻事业史著仍把1873年8月8日

^① 伍廷芳:《中华民国图治刍议》,见《伍廷芳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7~608页。

^② 林友兰:《香港史话》(增订本),香港:上海印书馆1985年版,第31页。

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作为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①从《申报》提供的有限材料看,《昭文新报》系营利性质,与当时的汉口是重要的通商口岸不无关系。《昭文新报》的意义在于为中国人自己办报做了最早的尝试。在中国大地上,国人自办报刊的历史由此正式开端,表明中国人开始登上了已被在华外人垄断的报坛。

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另一个重要基地是上海。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上海的洋务活动日益频繁,官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陆续在上海兴办。随着资产阶级经济的繁荣,上海的国人自办报刊活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首先是1874年容闳创办的《汇报》。《汇报》一创刊就宣言:“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中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不必为西人讳。”^②由于该报在消息和评论中常涉及政事,因而遭到官府非议,在它出版的一年半时间里,曾三易其名,足见当时中国人办报刊之艰难。一年以后,另一份《新报》在冯焌光的主持下创办,其目的为满足“入仕经商”的需要,并借以影响在沪外国人的舆论。“窃以入仕经商,所贵周知乎时事;居无易有,必当博采乎世情。……以及岁时收成厚薄,货物行销利钝,价值高下,船只往来,或时事,或异闻,皆为仕商之切要,经营之不可少也。”^③

据统计,从1865年至1895年,上海、香港、澳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汉口、天津等主要城市创办的中文报刊有86种。^④其中国人自创的报刊虽然很少,但毕竟走出了有益尝试的第一步。这是国人在外报示范下早期新闻思想的一场实验,它们在报刊业务和经营上,为日后维新时期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兴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以后中国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参与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③ 《本馆告白》,见《新报》,1876-11-23。

④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报刊创办的国人,无论是近代知识分子还是洋务派官员或洋务商人,他们办报的出发点多是秉承传统士人的忧患意识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看到了西人创办报刊的作用和社会效应,也有意识地利用报刊实践着自己社会改良的思想,希图在国富民强中,摆脱深重的民族与社会危机。因此,他们的这些思想必然影响到他们的办报实践,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日后中国的新闻思想。

第二节 近代早期“文人论政”的特殊性之成因

一、在思想上:既源于西方,又区别于西方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一批批民营报刊和报人在困境中成长起来,在中国文化营养丰富的土壤上,生成了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影响与渗入密不可分的。因为近代报刊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邸报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具有独立的撰稿权并发表评论,而这一点又为我国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因此,客观地说,如果不是外报随着殖民主义势力的侵入,在当时严厉的封建统治下,中国是不会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的,更罔论“文人论政”了。^①

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影响和渗入中国,发挥主渠道作用的是传教士报刊。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形成之前,中国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是在华外报。据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统计,从1815年到1894年,全国除《京报》外,共计出版近代中文报刊76种,其中60%为教会方面所办。^②这些传教士报刊,除传播教义外,大多以宣传西方文化和近代科技知识为己任,在宣传策略上特别注重附会儒学。从本质上说,这些报刊都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最主

^{①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0页。

要的目的在于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最终将中国推向殖民地的深渊。但是从客观上讲,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中国固有的文化提升了一步。如马礼逊在他的报刊《论印刷自由》中声称:“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人类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③此文被中国新闻学界称作“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④。马礼逊文中宣扬的观点,如天赋人权、言论出版自由等,对几千年来处于封建禁锢下的中国民众起到了深刻的思想启蒙作用。此外,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等在《万国公报》上的许多观点、建议也对中国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向西方学习,加快了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在中国的传播。1867—1869年,王韬漫游西欧,他发现西方的报刊自由对文明国家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他以为西方所长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还在于有舆论宽松的社会环境。他游历欧西诸国后,就热切向往着有朝一日在中国大地上也能自由办报,使国内出现“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事,位至卿相”^⑤的状况。他还在国内第一个提出言论自由的主张,于是才有了处处模仿《泰晤士报》的《循环日报》的创刊,该报后来被誉为我国“文人论政”的第一个样板。他的办报实践,发扬了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中最有价值意义的民主和自由理念的部分。此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向日本学习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新闻事业也不例外。在历史提供的机遇前,中国报人通过日本辗转接受了西方的新闻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新闻是同源的。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影响,也成为我国“文人论政”传统成因的重要思想基础。但对报

^③ 马礼逊:《论印刷自由》,见《广州记录报》,1833年。

^④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⑤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5页。

刊与新闻的认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全盘接收和认同来自西方的理念,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选择,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直接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关于这一点,就连外国传教士都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的报刊特别是报刊言论,进入中国后都“本土化”了。为了便于清廷接受,他们在陈述办报理由时,不是从天赋人权、宗教宽容等出发来论证新闻自由的合理性,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用主义出发,强调报刊的沟通中外、沟通上下、富国强兵的功能,并进一步将近代的报刊比附于中国古代的谏鼓谤木。这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和国人理解的歧义,但在主观上为他们的报刊自由进入中国制造了舆论。

一种外来文化要素必须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才能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曾说,任何新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①。进口的西学,为近代中国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化提供了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没有本民族文化的接受机制和依托形式,哪怕是生命力再强的外来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安家落户、生根开花。同样,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近代新闻理念和事业,是西方的舶来品,之所以形成不同于其鼻祖的新闻理念和事业,是因为其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发生了交流、碰撞,并经过了中国人有目的、有选择地吸收并加以改造。这也是“文人论政”传统在中国得以发轫并表现突出的重要原因。

二、在宗旨上:以政论为灵魂

我国近代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我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出现的,报刊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清醒地意识到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54页。

报刊在推行政治主张方面的巨大作用。为了发挥这一作用,他们在专制体制不许可的条件下,以天下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冒着极大的风险创办报刊,在民族危亡之际,实现言论报国、文章救国的理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些报刊中,为世人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们的言论,而非具体的新闻。新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服从于言论的需要,言论特别是政论便成了这些报刊真正的灵魂。

我们知道,近代早期以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舆论还只是士大夫和知识界的意见。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素以“修、齐、治、平”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士子文人研究学问,拥有文化知识,只能附丽于政治,“仕”成为学问高深的唯一结果和标志。在这一前提下,他们的言论倾向最终都被政治功能所掩盖,成为统治阶级意志下的“舆论一律”。而现实是,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能顺利达成“入仕”的最终理想,更多的人只能失落地徘徊在官场之外,“报国无门”,于是渐入颓唐。另一方面,当时清廷的官报(通称“邸报”)、民间报刊如《辕门抄》《京报》等,也沿袭了中国历代报刊的表达方式,其内容主要是宫门抄、上谕和臣僚章奏等,其最大的“特色”是无自采新闻,亦无任何评论,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默许下的传声筒。

进入了19世纪中期,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西风东渐,势不可当。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变化是居于首位的。中文的西方外报,从开始的躲躲藏藏、欲言又止,到现在堂而皇之地在华夏登堂入室,其传播效果显而易见。传教士报刊特别是在华的外文报刊,其鲜明的言论观点,无论它站在何种立场上,都深深地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在外报的示范下,国人看到一个全新的媒介在沟通社会、反映舆情、宣传新思想、新知识上的巨大作用,发现它不像邸报一样只限于记录朝廷政事,而是通过广泛的新闻报道和比较贴近社会的时评、社论等,及时反映舆情,反映进步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呼声。这让那些仕途不顺、有才不能伸的人士找到了一条自我实现的新途径,

而报刊的社论、时评等言论栏目,成为最能反映他们政治理想以及抒发他们报国理念的载体。王韬深知报刊在西方国家的重要性。他感到,报刊除了作为一般收集传播有关各种事情消息的载体外,还应该对政治领域发挥种种批判作用。而他认定的途径,是在无法取得皇权的开明恩赐的情况下,通过报刊,通过旗帜鲜明的报刊言论,来达到他所看到的《泰晤士报》所产生的影响。“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该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并且最终在中国能够出现他理想中的“士庶”与“宰辅公侯”“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和“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事,位至卿相。国有大故事,投笔从戎,随营纪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的动人局面。^①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王韬明确提出“日报立言”的观点。他在主持《循环日报》时,仿照《泰晤士报》,在每期的首栏中亦发表一篇针对时局的“论说”,带有明显的政论色彩。他所创办的《循环日报》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亲自撰写的质高量多的政论。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的有关“洋务”的社论和著述得到了越来越多同时代人的承认,一些官吏也开始征询他的建议。同时,这些政论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成为后来维新思想家的启蒙性范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报刊政论文章的发展,为后世作出了表率,影响极为深远,也开创了“文人论政”传统的先河。从总体而言,王韬对近现代新闻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推动作用。正如吕实强所说,他表明了不做大官也能做大事。^②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5页。

② 王韬的现代评论者们往往只注意到了王韬在新闻领域所取得的地位,而忽略了他报人生涯的更深层的意义。在王韬之前,“达”在中国通常指为高官。王韬在人生早期也有这种心理,他对仕途的茫然悲叹清楚地表明其对未能进入官场的失望。但随着时光的流逝,王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19世纪70年代初起,他有关“洋务”的社论和著述得到同时代人越来越多的承认。由于一些官吏开始征询他的建议,而中国年轻的改革者也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指正,他的社会价值感自然增加了。王韬作为记者和政论家而“达”了。他从总体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事业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在实践上：以致用为目的

近代报刊的中心任务就是新闻救国、言论报国，“文人论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这一思想及由它引发的行动，像一条红线贯穿了近代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报刊活动的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经世致用”所具有的关注现实的学术精神，使得那些进步的思想家们能够看到、并承认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而去探求救世“良方”；“经世致用”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那些进步的思想家们勇于冲破传统，承认“夷人”比自己强，并且去探求强之所在；“经世致用”所包含的不同于唯理论思维的功利、功用价值观，为接纳异质文化留下了一方天地；而“经世致用”所倡导的“变易”思想，又推动思想家们不再留恋“祖宗”和成法，其思考和探索活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向前推进。正是在“经世致用”精神的导引下，一些进步思想家的文化思考和探索开始从传统跨向近代。

首先是“驭夷”问题，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遇到的首要问题。林则徐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是最早接触近代报刊的中国人之一，还是仅有的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从事译报、译书活动的晚清上层人物。林则徐与新闻的关系，始于其以两广总督身份督办禁烟事宜时。当他满怀雄心壮志来到广州时，却发现对将要打交道的夷人是完全陌生的，深感于“沿海文官武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迫切认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①因此，他把了解夷情作为当时的迫切任务。于是，他一面“指点洋商、通事、饮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②一面派人搜集当时在澳门出版的主要外国报刊，然后选译员

^① 林则徐：《东西各洋越窜外船严刑惩办片》，见《林则徐书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澳门月报》，见《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26页。

进行翻译,以了解敌情。对于组织的译报活动,他在给奕山的一封信中写道:“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知夷字,亦即不看。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①作为经世致用学派的文人,林则徐的译报活动以及对外报的接触完全服务于经世致用的目的,他把经世派传统的“通时务”扩展到“通夷务”,终于使他从蒙昧无知到追求新知,从严禁鸦片到奖励通商,从盲目的天朝自大到以外夷为师法的对象,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近代开端时期的伟大爱国者和新时代、新思想的启迪者。此后,从外国报刊和书籍中获取资料研究边防和世界历史、地理、政情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问世,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开始了更新传统知识结构的历程。

其次是政体问题,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遇到的关键问题。王韬十分崇拜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认为“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②。王韬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三种,即“君主之国”,如俄罗斯等;“民主之国”,如美利坚等;“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吉利等。^③游历英伦期间,王韬曾专门去英国国会参观:“国中遇有大政重务,宰辅公侯,荐绅士庶,群集而建议于斯,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实重地也”,“且国家大事集议于上下议院,必论定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④他多次去旁听英国下议院的会议,深受震撼:人们

^① 林则徐:《答奕山将军防御粤省六条》,见《林则徐书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③} 王韬:《重民·下》,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23~24页。

^④ 王韬:《纪英国政治》,《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第107~108页。

可以在议院中公开讨论大政重务,自由表达意见,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王韬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①由此可见他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向往。王韬对君主立宪制的兴趣,是他以后力主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动因。他意识到以地主官僚为首的“洋务运动”,不能带领中国从根本上走向富强,要想使中国富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并付诸实践。他的这些思想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先声。他主办的《循环日报》,也成为我国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公开鼓吹变法的报刊。

“经世思潮”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促使中国人的视界突破了“华夷之辨”的地理限制,但想突破根植中华大地两千余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制并非易事。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思想基础,并没有离开儒老循环变易之说,他们观察社会事物时,奉行的仍然是以治乱盛衰划分时代的历史循环论。这种历史观,限制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近代报刊社会功能的深层次认识,也成为近代早期“文人论政”在“经世致用”上的局限性。

第三节 “文人论政”传统发轫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王韬的报刊活动

王韬,江苏长洲(今吴县)人,1828年11月10日生,初名利宾,后易名瀚,字懒今。祖上起先家运昌盛,乃“有明时巨族”,“族中多有位于朝”,但经明末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之变,遂趋中落。父亲王昌桂,字肯堂,工诗善文,学问渊博,尤“邃于经学”,为县增广生员。

^① 王韬:《重民·下》,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23~24页。

母亲知书识大体,家教甚严。王韬自幼资赋聪敏,八九岁时“即通说部”,“毕读群经”,18岁时考取秀才,在当地颇有才名。后因乡试未中,遂绝意科举。1849年,在上海设馆授徒的父亲突然病故,王韬“既孤,家益落,以衣食计”^①,不得已至上海谋生。当时的上海正处于“中国和西方文化交错的边缘”,这个典型环境为他后来成为“中西交融,思路开阔,论述广泛”的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机遇。

从1849年起,王韬应英人麦都思之邀,在“华洋杂处”的上海《字林西报》附设的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和伟烈亚力、艾约瑟等外国传教士共事达13年之久。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广泛接触了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先后帮助麦都思译《圣经》,与艾约瑟、伟烈亚力等英国传教士参与编译《格致西学提要》《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刊。1857年,协助出版上海最早的中文杂志《六合丛谈》月刊,开始了办报生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1861年冬因老母病危,王韬回乡省亲,借机化名黄畹,向太平军苏州地方长官刘肇钧上书,从统筹全局的战略高度,建议太平军力争长江上游,停攻或缓攻上海。但不幸的是,这份题为《上逢天义刘大人察》的书信,很快便为清军缴获,认为此乃王韬化名所作,遂下令逮捕王韬。王韬回沪辩白无效后,在英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的帮助下,于同年8月化装乘邮轮逃亡香港。去香港后,更名韬,字仲弢,一字紫诠,自号弢园老民、天南遁叟等。

从1862年到1884年的23年间,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强烈地震撼着王韬,使他逐渐偏离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轨道,变成了一个热心倡导学习西方的进步思想家。他在香港期间,协助英国传教士、英华书院院长理雅阁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从1863年起,相继完成《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的英译工作。1865年,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弢园老民自传》,陈恒、方银儿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本段引文均出自此处。

王韬应聘《近事编录》主编。另外,他还兼任《孖刺报》中文附录的编辑工作,并任《华字日报》主笔,与陈蔼廷同心协力,为该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67—1870年,应理雅阁之邀,王韬离港赴英国,至苏格兰助译《易经》。在英国期间,王韬全方位地考察了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风俗民情以及各类新鲜事物,特别对于电报、铁路、纺织、文化教育以及城市公用事业都有较详细了解和记载。王韬的这些观感,以后被其累辑成《漫游随录》刊行于世。其时,王韬因翻译《中国经典》在英国已享有盛名,英国众多大学、教会和团体竞相邀请他前往讲学。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是王韬十分仰慕的学府,他在理雅阁的陪同下专程前往参观,并应邀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登上牛津大学的讲坛。他侃侃而谈,从孔孟之道的仁爱礼教直到中西文化的异同,口若悬河,“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之震”^①。欧洲之行,令王韬眼界大开,也增加其对西方世界研究的兴趣。之后,王韬即有《美利坚志》《俄志》《法国志略》《西古史》《西学原始考》《普法战纪》等系列介绍西方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的专著相继问世,为国人打开了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口,其思想也随之出现巨大的飞跃。

1872年,理雅阁因退休离港返英,他将他所创办的伦敦布道会香港印刷所以1万银元出让给王韬与黄胜,王、黄改办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王韬、黄胜、温清溪等集资创办我国第一份政论报刊《循环日报》。《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谏远以师长”为宗旨,以“通外情,广见闻”为己任^②,致力于传播和普及西方知识,推介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反映世界大势和时局变化,鼓吹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此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刊,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循环日报》的报

①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页。

名很特别,王韬自己说:“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①他盼望中国走变法自强之路,实现由弱变强之循环。方汉奇先生则认为,王韬所谓的“循环”是指他心目中亘古不变的“三王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政治思想。

王韬是中国最早的新闻评论家,他创办的《循环日报》以独树一帜的报刊政论名重一时。在《循环日报》,王韬亲理编务、撰写政论10年。10年间国内外发生的时政大事,他都一一加以论述,评价其措置,褒贬其得失,使报刊政论文章以战斗的姿态介入国内外政务大事之中,从而增强了报刊影响舆论的政治作用,提高了报刊的政治地位,冲破当时中国古代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樊篱,使《循环日报》成为我国第一个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讲坛。更为重要的是,王韬从事的报刊政论活动,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转变之门,拓宽了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新途径。作为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王韬尝试着文人议政新的途径和方式。他充分利用了报刊这个知识分子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进行言说,以政论文章作为利器来制造舆论,充当了一个舆论发言人的角色,在报刊中充分权衡国事,成为“文人论政”最早的尝试,也为政治家办报作了舆论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可以凭借报刊政论的强大社会影响力引导舆论,对政府、政治进行议论、监督,实现参政和议政的目的。按美国汉学家柯文的说法,“《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刊”^②。

1884年4月,获李鸿章默许,王韬返回上海定居。1885年创办弢园书局,1886年出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在此期间,他仍继续为《申报》《万国公报》等撰稿。王韬著有《遁窟谏言》《弢园文集》《翁牖余谈》《淞滨闲话》等40余种著作,其报刊政论文集汇编成《弢园

^① 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②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和晚清的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文录外编》出版。

王韬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开山人物,被誉为“中国新闻报刊之父”^①。他不仅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创者,而且是中国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人。不同于林则徐、魏源、洪仁玕、郑观应等是间接地获得对报刊的认知,王韬对报刊的认知是建立在他亲身办报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所表明报刊思想更具现实意义,对后世新闻理论的构建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更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第四节 《循环日报》及王韬报刊思想评析

一、“四方通达”的功能观

(一)通内外:“通外情,广见闻”

通内外即“通外情,广见闻”“博采群言,兼收并蓄”,这是王韬对报刊目的功能的最主要认识,也是其报刊思想中的重中之重。

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帝国主义的鸦片和枪炮打开之后,中外交涉活动便日益增多,出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情况。然而,“中国人士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②。这样,“一旦交涉事起,局促无据。或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③。他在西方看到,列国“采取舆论,探悉群情,亦即出自日报”^④。然而,不管外洋形势如何变化,中国人依然故我、援引成例,特别是清朝大员,昧于时事,鄙视洋务,“夸张粉饰,玩褐因循,蒙蔽模棱,拘墟腰固,于西国

①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Chicago, 1934, p. 11.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洋务在用其所长》,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洋务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之情昏然如隔十重廉幕”^①，以致历次中西交涉屡屡蒙辱。王韬对这种于外情茫然无知、内情又不得流传于外的情形扼腕太息，怒然忧之。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为中国的保商御侮、变法自强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

他尖锐地指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舍日报一途，将何所入门”，“中外交涉之事，时时可刊之日报中，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论其间”，^②至少也使得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勿使外人独一言”，“舆论背我”。^③

基于此，王韬在《变法自强》《洋务》《使才》《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以及给当时的一些官员的通信中，不厌其烦地论述办日报以“达内事于外”和“通外情于内”的主张，并尖锐地指出，西方在华报刊“其所立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否倒置。泰西之人只知洋文，信其所言，以为确实；如遇中外交涉之事，则有先入之言以为之主，而中国自难与之争矣”^④。王韬最早看到了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平等现象，并提出了自办西文日报与之抗衡的对策。他主张从中央到地方设立翻译外文报刊的专门机构——“译报局”，“汇观各处日报而撷取其要略译以华文，寄至总理衙门”，以便朝廷随时了解时事动态，“即遇交涉之事，胸中自具成竹”^⑤。同时，也使人们能了解外部世界的万千景象。他认为“日本效法西人，倡行西字日报”^⑥，也值得我国仿效。他进一步提出，既然西人能在中国设报，歪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杞忧生易言跋》，陈恒等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王韬：《本局日报通启》，转引自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载《历史研究》，1990（2）。

③ 转引自王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舆论思想研究》，兰州大学，2006年。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 王韬：《弢园尺牍·使才》，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 王韬：《弢园尺牍·代上黎召民观察》，中华书局1959年版。

曲事实,颠倒黑白,使“未到中国之西人从而疑我中国”,中国为何不能在西方各国设立报馆或通讯社,纠正正谬,宣扬国威,“以感远人之心,归而向我”^①。他甚至还希望把国人的高见远识代为译成西文,“刊入泰西邮报,庶知我中国人材其谋略固有高出寻常万万者,非亦柔远服人之一道哉”^②。王韬的以日报通内外的思想,不仅远胜魏源的“夷情备采”,而且是中国新闻史上关于加强对外宣传的第一声呐喊。

王韬希望《循环日报》能成为中西沟通的桥梁。《循环日报》“启事”中说道:“本局是用博采群言,兼收并蓄。凡民生之休戚、敌国之机宜、制造之工能、舟车之往来及山川风土祸福灾祥,无不朗若列眉。俾在上者知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此区区之微意也。……其有关中外者必求实录,不敢以杜撰相承。”^③当时,华文报刊对西方消息的编辑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原因是主笔者并不熟悉西方社会和文化,往往详中而略外,且对西方世界的介绍总是不能做到恰当和准确。王韬对中学造诣之深、对西学了解之广,实为沟通中西的良好条件,因此,《循环日报》认为自己可以也应该成为中西沟通的桥梁。

在这个“桥梁”上,他对“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观念提出了强烈质疑,预感到对西方文明的陌生将要带来的危害。《循环日报》有两个栏目主要是介绍西方信息的,一是“中外新闻”,二是“告白”。在这两个栏目中,王韬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作了大量的报道,对西方世界进行了超前性的全景式扫描。其中有介绍西方形势的,如《欧洲将有变局》《土胜俄不足持》《西国兵额日增》《欧洲今日不轻用兵》等;还有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如《纪英国政治》《英重通商》《英开医院》《西人论日本新政》等;又有介绍外交形势的,如《中

① 王韬:《本馆日报略论》,转引自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载《历史研究》,1990(2)。

② 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申报》,1878-02-19。

③ 王韬:《论法在因时变通》,《循环日报》,1880-05-15。

外合力防俄》《合六国以制俄》《驳日人一言取琉球有十证》《遣使亲俄》等。可以说,《循环日报》“对西方世界的介绍是全景式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声光化电,无所不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宗教、民俗、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而且做到‘随事随时译而录之者’。对西人言论也不时加以选登,以收兼听则明之效,这些做法对开通民智的作用极大”^①。

这种全景式的世界扫描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意义巨大。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后,1874年又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日本在“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后就迅速向外侵略扩张,使中外矛盾更加激化,冲突频繁,对抗尖锐。在这个时候,警醒国人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迫切。《循环日报》常发表“卧薪尝胆、化害为利”之类的言论,力劝国人弃旧图新。1874年,《循环日报》在评论西人观点时说:“西字日报云,日本用兵于台湾,久留不去,其与中国盖岌岌乎有将战之势矣。……中国必当益整其海防,倍精其兵法,将来或与欧洲诸国构衅启争。”文后的评论写道:“呜呼!外患之来适足以强我中国耳,惟西人之有此言,则我之励精图治益不可缓,此正天所以提撕替觉我也。”^②希望中国从战争中得到警示,并把战败当做上天的考验,抓住机会,学习先进,迎头赶上,把祸患化为动力,把危机转化为振作的时机。

王韬从西方报刊的内容与作用上论证了中国人办报之必要,希望通过报刊传播新知,改变当时人们“甘坐因循,罔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第拘守於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陋习,使中国人知道“大地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四书”“五经”之外尚有舆图算术等自然科学知识。^③王韬把日报看做是人们扩充见闻、转换脑子的

① 刘圣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华文报纸》,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② 王韬:《上丁中丞》,见《弢园尺牍》,第140页。

③ 王韬:《弢园尺牍·代上丁中丞书》,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重要工具。这也是当时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如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见闻多由日报而出,夫古典虽多,不合当今之务;旧闻莫罄,难为用世之资。则欲长人之见闻,以生人之思虑,……莫如宏开日报也。”^①王韬这种贯通中西的魄力,让中国报刊开始“放眼看世界”,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放眼世界。

(二)通上下:“下情上闻,仁意下达”

通上下即“下情上闻,仁意下达”,是指皇帝政府与民众舆论之间信息畅通而无隔阂。

王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日渐疏远,“堂廉高深,舆情隔阂”^②。这种上下蔽隔的直接后果便是政治腐败、民心涣散,以致中国不能自立,受制于人,他说:“其故皆由在上者,视民间之疾苦,忽不加减于心;斯在下者,视长上之作为,原非有利于己。”接着,王韬还将君民之间的关系比作人的手足与耳目:“如人之一身,其手足则麻木不仁,其耳目则冥顽不觉,而心腹溃脊,终莫知其所以然,故一举一动,悉听命于人,惟唤奈何,究不能自立也。”^③而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因为其甲兵精强、财赋富饶、物产繁庶,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上下相通。王韬以英国为例说,其之所以“雄为欧洲诸国冠”,“诸国莫敢与之颉颃”,原因就在于“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④。因此,王韬说,“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

①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4页。

② 王韬:《张园文录外编·重民下》,陈恒等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③ 王韬:《张园文录外编·达民情》(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④ 王韬:《张园文录外编·纪英国政治》,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78页。

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①。

通民情、防蔽隔本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训。王韬既继承了这一具有民本意识的思想观念,又有所创新,就是充分肯定了报刊这一新的传媒在反映民情、沟通上下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提高了当时人们对报刊这一新的传播工具的认识和重视。所以,《循环日报》把更多的笔墨投入于“下情上达”,更侧重于“济世”。因此,在报中,王韬热切地呼唤中国也要“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②。他认为:“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要去塞求通,沟通上下。“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③民为邦本,要治民而不能殃民。“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察其病瘠而煦其疾痛,民之与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则境无不治矣。”^④

王韬希望通过创设日报来达到上下沟通的目的。他说:“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报为之邮传也。”^⑤王韬主张中国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政府创办新报,“一曰知地方机宜也,雨暘之不时,盗贼之多寡,政事之利弊,民不尽报之州县,州县不尽报之上司。有新报则无不知之矣”,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达民情》(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贵民》,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页。

⑤ 王韬:《弢园尺牍·代上丁中丞书》,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稟辞出于状帅,批语出于僚幕,成狱之词出于胥吏之填砌,则曲直易淆矣。若大案所关,命采访新报之人得入衙观审,尽录两造供词及榜掠之状,则虽不参论断,而州县不敢模糊矣。”让“四方之水旱,货物之盈虚,讼狱之是非,民情之苦乐,备书其事,以动当局之听闻”。

鉴于此,王韬对民间新闻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并发表了诸多言论。这类言论大至水灾、火灾、饥荒,小至赌博、偷盗、行乞等,只要是当时社会生活中较为突出的问题,王韬都能做出反应。由于论题主要来自现实生活,这些言论的内容同一般百姓的关系更为密切,大部分都是公众关心的焦点。1883年前后,香港和广州火灾频繁,对市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循环日报》接连发表了《自来水最便于救火说》《论查禁防火》《论防火灾》等言论。文中分析失火的原因,传授灭火的方法,探讨预防的措施,及时回答了让市民担心的问题。这时的拐卖“猪仔”(偷渡客)问题,一度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该报对此多有评说,如《论查办猪仔》《论宜设法以杜拐诱》等言论,都是针对这些问题发表的新闻言论。这些言论或揭穿诱拐欺骗的伎俩,或披露受骗“猪仔”的惨状,或呼呈官宪当局查禁此事,多数言论夹叙夹议,评述结合,言辞激切,情感激愤,颇具感染力。对关系人民饥寒饱暖的社会问题,该报也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如《论弭水灾》《论直隶荒灾》《豫储米以备荒说》等文,都是专门谈论如何救灾济贫的。对于社会底层民众的苦痛,该报不但深表同情,还多次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希望能够改善其境况,如《论营兵宜体恤》《论乞丐宜分别安置》等,都可以说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言论。对于有些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物和小问题,《循环日报》也都认真对待,用心评述。1883年春节期間,该报发表了《论燃放爆竹》一文,文中对节日喜庆之时燃放鞭炮这种传统习俗提出了异议,认为爆竹是“有损无益之物”,“偶有不慎,即易成灾”,故而不宜提倡。文中还批评了那些为牟暴利而竞相销售爆竹的商贾。该

报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成为《循环日报》言论一个鲜明的特色。

王韬为了发挥报刊“通上下”的功能,在新闻报道和言论两方面孜孜以求,使二者的内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阐述各类问题时能使其有机结合,从而使当时的报刊言论在干预社会生活、传播意见信息等方面,大大超过了同时期其他中文报刊的水平,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王韬评述中外时势和鼓吹社会改良的政论,其思想水平之高,社会影响之大,并时无双。

(三)通易俗:“启民智、辅教化”

文风通俗化是中国报刊文风的关键转变,也是“启民智、辅教化”的关键转变。

《循环日报》创刊之初,王韬就在《本馆日报略论》中明确表述,他创办日报的目的之一,便是“俾众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已”^①。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历来就有“以先觉启后觉”的观念,王韬也不例外。他认为去恶扬善、开启民众是报刊的功能之一,也是《循环日报》的一项任务。他要利用《循环日报》“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俾在上者得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②。也就是说,报刊登载的内容不仅要广泛,而且要对读者有借鉴和教化作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具体怎样去做,报刊可以助你明辨是非。他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中说得更明确:“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淬其姑,甚或骨肉乖离,友朋相诈,谤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觥搯也。”^③报刊因传播范围广,其“惩创”“教化”功能远在一般舆论之上。他希望日报能够成为新的大众传播工具。当然,这种大众

^① 王韬:《本馆日报略论》,转引自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载《历史研究》,1990(2)。

^② 王韬:《本局日报通启》,转引自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载《历史研究》,1990(2)。

^③ 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申报》,1878-02-19。

化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来实现的。

我们知道,“文人论政”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共赴时艰。考虑到当时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不高,若报刊文风过于雅化,就会直接影响到报刊的宣传效果。因此,报刊在文风上必须趋向平易畅达、浅近义明、通俗易懂。在这一过程中,首倡者是王韬的《循环日报》。王韬从文体的现代性着手,以独创的现代报刊文体取代了传统文章的刻板表达手法,争取让日报赢得更多的受众,让评论价值直达社会的基本层面。

首先是语言表达上“直抒胸臆”,文风质直朴素。“俾人人知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①王韬在《淞隐漫录自序》中自我评价说:“不侈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创办《循环日报》之后,他更是清楚地认识到“夫名之曰日报,则所言者必确且详”,写文章要有史家的“直笔之义”。王韬说自己写言论“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矣”,“辄直抒胸臆,不假修饰”,反对“故弄玄虚”“隐晦曲折”和“故作惊人之语”,崇尚质直务实的文风。这些主张和他开创的报刊政论文体,为中国新闻评论的写作开了一代风气,树立了最早的榜样,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其次是篇幅大体固定。王韬的政论文一般固定在1000至1200字之间。这样固定篇幅,主要出自几个原因:一是要适应报刊固定版面的要求,太短则信息量少,太长则版面不够;二是为了适应读者的日常节奏,满足新闻的日常消费需求。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大大地拓展读者对象,并因此选择不同的表述格式,不分尊卑贵贱地面向不同阶级、阶层、身份、地位、文化、经历等的读者统一体。报刊上至统治者,下至识字平民,打破了长期以来少数统治者形成的知识言论的集权式垄断,平常公众能行使言论权。此外,古代论辩文由于传播载体的限制,其传播方式、速度和数量都有限,所以对读者

^① 王韬:《菽园文录外编·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的影响也很有限。王韬的现代文体首次借助日报这种大众传媒的威力,开辟了宣传改良变法主张的天地。

总之,报刊不仅给王韬提供了现代性思想的舞台,也有机会让他尝试现代性的表达方式。这种现代报刊政论文体,即后来的社论体,成为中国人在这一领域里最早的尝试,在中国古代论辩文体向现代政论文体转变的过程中,具有首创之功。这种专为报刊撰写的政论文体在议论和陈述之间有着强烈的修辞感染效果,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现代文体。其常常被国内其他报刊借鉴,并引发了“仿效”热潮。梁启超的“新文体”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二、“立言求变”的政论观

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由四大要素构成:新闻、评论、广告和副刊,四者缺一不可。其中,报刊评论又被喻为报刊的号角和灵魂。然而在中国新闻史上,报刊评论的出现却是十分艰难的。近代中国报刊评论产生和王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报刊评论第一人。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保罗·科恩曾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初期,报刊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明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王韬的报刊是一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①如在《循环日报》“中外新闻”栏中,王韬几乎每日有评论1篇,有时不止1篇,而且这些评论信息量大,内容丰富。

论“时事”是王韬报刊言论的首要特点。王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大,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而“立言”就是王韬认为的国人办报的目的之所在。所谓“立言”,就是必须要“博采舆评”,可以自抒胸臆、独陈己见,对时局有分析和判断的权力。他在《循环日报》上明确宣布要借“日报立言”,也就是说,借报刊这个舆论阵地来宣传他的变法自强主张。

^① 转引自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王韬作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又是爱国报人,他不讳言他的办报目的:“韬虽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讴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①他办日报是为了“立言”,希望通过办报既唤起民众抵御外国的侵略,又能向西方学习,进行维新变法。在中外时事政治评论文中,王韬激愤地揭露俄、日、英、法等国的侵略野心,明确地警示国人认识到“强邻环视,伺隙而动”的严峻局面。他的思想与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其“强中以攘外,讴远以师长”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相通,不同之处在于,王韬比较直接而深切地认识到近代报刊的巨大功能。王韬用自己的“多谈时务”的政论,实现了“借彼事端发挥胸臆”,“开悔悟于愚民”的办报思想。^②所以说,在振兴报业的过程中,王韬在业务上最大的贡献就是首创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刊。换句话说,他是从政论为武器,让报刊融于政治的第一人。

同时,王韬又是最早在国内提出言论自由要求的报人。他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这篇著名论文中系统总结了现代报馆的职能,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能自由地“直陈时事,无所忌讳,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之而已”。所谓“时事”,当然不是仅指政府之事,但政府之事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方面。他还进一步指出“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认为“其言之而可采也,则同于葑菲之不遗;其言之而无足采也,则同于刍狗之可弃,无所谓讪谤也”。^③这在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不可不谓惊世骇俗之举了。

他还进一步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舆论自由表现出了由衷的向往之情:“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勿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报》,人仰之

① 王韬:《上潘伟如中丞》,见《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6页。

② 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申报》,1878-02-19。

几如泰山北斗。”^①他向往在中国大地上有朝一日也能自由办报,以出现那种“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出现,皆以开放民主、言论自由为前提。为此,他多次提出了放宽言禁、言论自由的要求,认为清廷不应压制舆论,而应鼓励民众积极“言议政”,这才是国家“兴盛发达”的表征;并以伦敦的《泰晤士报》为例,“国家大事视其言以别”,说明如果报刊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便能影响事态的发展,有效地阻止当政者滥用权力。所以,他一再呼吁允许民间创办报刊,允许报刊“指陈时事,无所忌讳”,以便形成清议之风,使“上下之交既无隔阂,则君民之情相浹洽”。^②王韬虽然用的是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的思考方法,但毫无疑问,近代意义的报业及报刊观念,正是在王韬这些成长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向西看、把西方作为参照对象的过程中导入的。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皆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评论时事政治,鼓吹放眼看世界与变法自强,表现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一般认为,言论特别是政论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循环日报》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杰出报刊,而王韬是其报刊言论的主宰和灵魂。从1874年到1884年的10年时间,王韬用“天南遁叟”“弢园老民”“遁窟废民”等笔名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变法》上、中、下;《变法自强》上、中、下,《洋务》上、中、下,《重民》上、中、下等著名政论文章,系统宣传了他的“变法自强”的主张。具体而言,王韬的变法自强主张是由“治中”和“驭外”两部分组成的,“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已”^②。关于“治中”,王韬以为不外乎变法自强。自强首先在于“创设局厂、铸枪炮、造舟舰、遣发幼童出洋,肆习西国语言文字、器艺术而已”。在这里,王韬还特意指出“行之当无徒袭其皮毛”^③,当然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5页。

② 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申报》,1878-02-19。

②③ 王韬:《治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这还是内政的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求富。王韬以为“富强即治之本也”,“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也”。^④可见富是强的基础,富则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王韬提出了开采煤矿、大力新办纺织工业、近代交通工业、设立保险业等建议。“驭外又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⑤,王韬认为国富民强之后就应该及时开展驭外活动,以争取民族独立。故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使才》《遣使》《设领事》等文章,不但对出使人才作了一定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了简公使、设领事等独立外交的思想。

《循环日报》的言论特别是政论,看待当时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犀利眼光,明显高出同时代的一般文人。此时的上海《申报》对言论虽然也是每日必备,期间也有精辟之作,但并不以推动中国社会改革为宗旨,而是醉心于营利,这是它不能与《循环日报》相比拟的地方。《循环日报》政论的特质可用16个字来归纳,即“高屋建瓴、经世致用、讲求时效、不拘一格”,体现出大处着眼的宏观意识、注重现实的参与意识和不落俗套的开放意识。方汉奇评价说:“王韬的政论文章继承了中国历代杰出政论家的优点,同时有自己的风格。他反对‘泥古’,反对‘刻意模仿’,反对把文章写成‘千人一面’。他的政论文章深入浅出,言之有物,雄辩而富于感情,对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报刊政论有很大影响。”^⑥除了《循环日报》,王韬还为《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写作评论,社会影响十分广泛。可以说,王韬不仅要通过报刊评论来实现中国报业人士的“立言”,而且要为中华民族“立言”,体现出了近代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期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借报立言的做法,不仅是王韬基于对报刊言论的理解,而且是他“以经济相许,每期出而用世”^⑦的一种方式。王韬虽然

④ 王韬:《兴利》,《弢园文录外编》(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⑤ 王韬:《治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⑥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页。

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序》。

没有提出过“文人论政”的命题,但他的办报实践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胸怀大局、蒿目时艰、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成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前驱。

三、“通才”的新闻人才观

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两篇新闻学论文中,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即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即“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

王韬认为,所谓“通才”,不是那种只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不是那种只知“圣贤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对于“泰西之国政、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的“迂才”^①,而是那种德行艺皆优、古今事皆通,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他认为,所谓“博古通今”,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舆图算术胥统于此”。^②

报人为什么应是“博古通今之士”,王韬认为,这是由其业务本身需要决定的。报刊不仅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传播新知,而且要评论时事、直抒胸臆、开启民智。“纪事”和“述情”两个方面都要求报人具有“通才”的业务素质。“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③,说的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结构,知识储备不够,那么在办报的过程中,就不免只看到芝麻而丢了西瓜。王韬通过对西方人的接触、了解和分析,认为“西士通今而昧古,中儒爱古而薄今。苟能各矫其失,庶免彼此交讥也夫”^④。他热切地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

① 王韬:《菽园文录外编·洋务在用其所长》。

② 王韬:《菽园尺牍·上丁中丞书》。

③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见《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④ 王韬:《菽园文录外编·菽园著述总目·西中凡》。

是报人,不要总是停留在“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的状态,而要开阔胸襟,开拓视界,在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尚虚文,关心时事,成为“高才博识之士”。

王韬还从报刊的地位和作用上论证了新闻人才的品德之重要性。他说:“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① 办报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非常重大。他说,在西方,报刊和报人(特别是主笔)的地位极高,其言论足可左右局势和人心。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对报刊从业人员“不可不慎加遴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

王韬重视并强调报人的品德修养,一方面与他的人才思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对报刊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王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才思想,认为欲求事业之兴旺,须以得人为先。他说:“天下事皆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人之手。”^②而人才又以品德为先,对不同的人才应有不同的品德要求。王韬提出,报刊的主笔应该是知识广博的“通才”,“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不然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王韬对于当时新闻界“挟私汗人,自快其忿”的不道德行为,认为“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不参毁誉之私”,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旧报之通弊”。^③ 在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上,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性为新闻记者的第一

^①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第21卷,第29页。转引自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载《历史研究》,1990(2)。

^② 王韬:《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见《弢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0页。

^③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见《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172页。

要素。而王韬则是最早有这一认识的新闻学家。

其实,王韬本人在当时就称得上是学贯中西、超乎时辈的“通才”。当时,上海《字林西报》编纂主任蔡尔康评价王韬说:“博极群书,……凡铁甲船、火轮船、枪炮、飞天球之制,以及算学、化学、重学,无不融会于心。”^①同时期的《申报》也称赞他说:“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②

王韬的新闻人才观,源于他对人才问题重要性的深刻认识。王韬终其一生,几乎没间断过对人才重要性的呼喊。他常说“治国之要,曰举人才,曰固民心”^③,“国家之有才,犹人身之有精神”^④。在王韬看来,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主要是看其人才的兴衰程度。与传统的人才观相比,王韬的人才观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主要表现在:

一是多样化、专门化。王韬强调人才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他的人才观是以承认人才的多样化、专门化为前提的。他反对“今日治吏曹,明日治刑曹,未及熟其职事则又转而之他”,“今日典礼,明日典刑,虽伯夷皋陶胡能底其绩?今日治诗,明日治书,虽伏生申公不能通其义”。他认为“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⑤。而对专门人才的关注是王韬人才观的重心,强调人才的多样性与专门性是王韬人才观的一大特点。他把人才与求强求富的工商金融、军事国防、科学教育、工程技术等实际专门活动联系在一起考虑,显然,他的人才观与提倡“君子不器”的传统人才观、把是否入仕作为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截然不同的。

二是实用性、功利性。关于所要培养的人才,王韬虽然也有几

① 转引自朱维铮:见《改园文新编·导言》,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③④ 王韬:《改园文录外编》(卷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 王韬:《改园尺牍续钞》(卷三)。

分道德主义的倾向,但他最终看重的还是实用功利:“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于实用。”^①他的人才标准是“以有用之心思,施之于有用之地,日事讲求富强之效”^②,他多次对封建顽固派把迂腐虚无的道德放在首位的观点进行抨击,认为当时中国“民富国强”是社会的最大目标,一技一才的专家才是真才。在呼吁真才的过程中,他同时又把科举所取之士统斥为伪才,深刻指出社会上“名”与“实”相分离的怪现象:一方面,身居翰林、进士、举人等头衔者,位在人才之列,有治国理民的重任,但这些人除了怀抱圣贤典籍外,“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河漕兵刑财赋诸大端,亦问之而谢未遑焉”。^③另一方面,中国本来数量就十分有限的工商等真才,却处在无职无权、被人轻视,甚至连生活都朝不保夕的地位,空有报国之志而无捐躯之路。因此,王韬所强调的人才的有用性还有更深层的意思,他所希望的绝不只是怀抱利器而终生无所建树的人,而是那些能够有用武之地、一展抱负的人。

此外,王韬把人才观与改革开放思想联系起来,以世界意识和多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才问题。他既承认中国之学、中学之才,也承认西方之学、西学之才。王韬有一句名言,即“东方有圣人焉,西方有圣人焉”^④。王韬甚至认为,中国现代化急需大批实学人才,中国在国内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妨采取“取材于各国以为我用”^⑤的方针。王韬的这些人才观,在当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性,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并成为其新闻人才观的基础。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王韬:《论中国煤铁之富美国金银之富》,《万国公报》,第57期,1893年10月。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洋务在用其所长》。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见《原道》。

⑤ 王韬:《弢园尺牍》(卷九)。

四、“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舆论主权观

近代报业在我国是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我国的半殖民地化开始的,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文化侵略活动逐渐走入了中国人生活的。中国报业开始之初,报业主控权还掌握在西人手中。因为没有经济上的支撑地位,所以话语上的权力自然就被削弱了,甚至到了在自己的国度里日益失去言论阵地的地步。

据统计,从1860到1890年,基督教系统在中国境内出版的报刊已有76种之多。其创办人或主持人当然也是西人,大权都在他们手中。因而王韬等人痛感每每遇有外事交涉,西方在华报刊“迩来西人在中土通商口岸,创设日报馆,其资皆出自洋人。……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泰西之人,只识洋文,信其所言为确实,遇中外交涉之事,则有先入之言为主,而中国自难与之争矣。今我自为政,备述其颠末,而曲直自见,彼又何从以再逞其鼓簧哉”,“交构其间,颠倒其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惮中外因是失欢。然则将若何治之?曰:莫若直书中外相涉之事,自我而达之于其国中,则译华事为西文日报者,所以正内情于外也,所谓明敌情者此也”。^①基于此,他们明确提出报刊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的观点,揭露了外报的“抑中而扬外”的实质,主张不能让“外人操笔削之权”,甚至应该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办中文报刊。

在此观点之上,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循环日报》是华人资本渐厚的产物,办报的所有资本全出自华人,因为华人的独立经营让华人在利益和立场上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舆论工具。在《循环日报》创刊之初,王韬便一再地强调国人自办的独立性。他宣布:“本局创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是报之行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②并一再声明:“《循环日报》,皆系华

^① 王韬:《弢园尺牍·代上丁中丞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王韬:《本局布告》,《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人为之倡始。总司理陈蔼廷,正主笔王韬,皆由同人所公举,无非为专益华人起见。”^①王韬所言的“本局”,即此前他与黄胜等人购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而成立的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这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发表独立见解的前提。在近代中国,由中国人出资、中国人当主笔、为中国人说话的报刊的问世,是破天荒的事情。王韬办《循环日报》除得到黄胜支持外,协助办报者还有留英学习法律、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廷芳,香港著名人士何启以及广东秀才洪士伟等。原上海《申报》馆职员钱征奉命考察香港报业,滞留香港,亦成为王韬办报的有力协助者。王韬强烈地意识到了报刊独立是近代中国报业人士对国家唯一所能尽力的渠道。王韬相信,天下国家之势强弱循环极而必返,国人所能做的只是积极地投身到“变法自强”的社会大潮当中去。

接着,王韬进一步阐发了国人自办西文报刊的益处:“中国既自设西文日报,则可以拾其遗而补充其缺,纠其谬而正其讹,然后事理不至于乖错,即可泯猜贰于无形。就使西报一无错误,而我复重言以申明之,亦未始非互证旁稽之一助,此其利一也。凡中外利病所在,因革损益之所宜,或在事前,或在事后,皆得秉公论断,指陈得失,使彼知孰为不便,因以定从远之准,分取舍之途,则彼此可以免杆格不通之病,此其利二。交涉巨案,兵戎玉帛,情于是系焉。西报苟稍存左袒之心,或措辞之轻重失其宜,叙事之详略失其当,皆足以激愤而致祸,要之直道自在天壤,吾等据事直书,不以加增减否褒贬于其间,务使公是公非,灿然大白于天下,……此其利三。”^②王韬的呼声在当时是那么“前卫”,犹如空谷足音。直到多年以后,陈衍才发表《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建议中国人办外文报刊。“延访中国通人,

^① 王韬:《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六日)。

^② 王韬:《上方照轩军门书》,见《骛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

贯通中外时务者数人,为中文主笔,举所谓务材、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备筹所以整顿之法,皆实在可言可行者,广为论说,又举西人向来之欺我中国者,……皆翻译洋文,刊之报刊。”^①至此,王韬寂寞的呼声才得到响应。

由于《循环日报》打出的是“华人出资,华人操权”的牌,王韬利用这一特点,展开了一系列宣传攻势。其海报上写着:“此纸祈贴在宝号壁间为祷”,说明该报早期宣传手法不仅是免费赠送报刊,在报上大力宣传以及四处派发海报,而且还要求华人商家将海报贴在商店墙上。另外,每天还发行“行情纸”,以小张的中国土纸印刷,刊登报刊截稿以后收到的重要消息。《循环日报》在创刊第二年,一度增出月报,选择当月日报上的重要新闻和评论,汇为一册出版,单独发行。这主要是为外埠读者提供服务的。

为了保证“华人出资,华人操权”,《循环日报》广泛开展了广告业务及其它多种经营之道。但是,当时刊登在早期《循环日报》上的欧美船务公司、洋行及药局等广告,并不多见。因为它打的是“华人社会之喉舌”的旗子,所以只能期待“华人之一心一德”的支持,并以此理念招徕广告订户,劝导华人商家在此刊登广告,不断夯实“华人操权”的经济基础。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及相关书籍。另外,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还提到了其他一些经营业务,如中华印务总局继续为客户代印中英文书籍、广告、海报以及各式各样的契约书与文件等;出售书籍、字典乃至染发料及补药等各式各样的药丸与药水等;出售大中小活字版等。

此外,《循环日报》整版内容流露出浓重的商业意识。《循环日报》效仿西报的版面安排,主要体现版面编辑上:第一版全版为货价起落的商业信息;第二版是中外新闻;第三版续载第二版未刊完的

^① 陈衍:《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求是报》,1897-12-08。

新闻,余者为船期与广告等;第四版全版为广告。王韬深知最新市场价格和船期公告,对身在商业社会的香港市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经济版都编排在前面,而且篇幅比一般的消息栏多一倍。《循环日报》的第一版全版内容为“香港目下棉纱匹头杂货行情”及“各公司股份行情”的经济新闻。第三版的左上角则刊登了“香港、黄浦、澳门等处落货往各埠”的船期表。这种经营策略上的正确决策,为报刊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收益。另外,王韬认为“旧报有裨于时政,报中所登之事,无非独抒管见,以备当事者采择而已”。从栏目上看,商业经济信息占了一版和四版两个版面,新闻占了二版全版和三版半个版面,交通消息和电报占了半个版。全报 1.8 万字,商业、经济、交通信息占了 1.1 万字,新闻占了 0.7 万字。将头版全版刊登货价起落新闻,及竞相另纸刊印“行情纸”,说明即使是志在不营利的“新报”,也不能忽视商人渴求的商业信息,而不得不将之摆在首要版面,这在当时的华文报刊中是一大特色。总的来说,王韬作为有爱国抱负的报人独立办报,也必然要从经济利益角度着眼,因为他意识到一个以“船”和商业为中心的港口城市,人们对商业信息的需求将与日俱增,报刊必须通过广告的经营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华人资本、华人操权”。

第五节 王韬报刊思想的历史影响

作为划时代的新闻先驱,王韬对时人及后人的影响都是相当巨大的。

王韬借“日报立言”,首开“文人论政”的先河。“文人论政”,主要是区别于“同人办报”的旧传统。“同人办报”多是“集资千金,局居斗室,因陋就简,就可创业”^①。如此一来,仅凭理想与兴趣、纯粹

^① 潘公弼:《六十年来中国之日报事业》。

的书生意气,“同人之报”难免狭促为小圈子的俱乐部。而作为一个有着政治家风骨的新闻人,则会让自己成为一位活跃的、热情的社会活动家,参政议政,为了“超越”“发展”而努力让自己适应社会,进入主流话语圈,再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改造现实,以获取个人价值。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大量自己撰写的政论文章,向国人敲响警钟,并形成特有的“报章体”。国人自办报刊中评论的出现,终于使中国报业走出了漫长的“古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但早期改良思想家的这些远见卓识却并不为同时代人所认同。及至甲午战争后,社会形势大变,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开始重视国事,近代报刊才成为他们手中的利器。梁启超重新拾起借“日报立言”,通过《时务报》等撰写了大量的政论,谈时务、言变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其行文特色被誉为“时务体”。梁启超的成功在于不同时代所提供的不同机遇,但借报论政,其首创之功在于王韬,文人办报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王韬之后的近代民营报刊史上,“文人论政”渐渐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它的主要目的有两个:首先,文人借助报刊论政参与社会。仿照西方报刊体例,《循环日报》除星期日以外,每天出版。该报首栏每天要发表政论文章一篇。同一般性纯为牟利的报刊相比,王韬注意舆论足以影响群众的一面,《循环日报》的政论文章 1883 年曾单独结集出版。王韬之后,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政治家办报的现象,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将报刊作为完成政治目标的利器,作为唤起民众、统一民众思想的工具。自西学东渐以来,由于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及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诸公的努力,以及孙中山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目的和原则的定位,中国民营报刊在“文人论政”方面有了极大的发展。其次,报刊通过“文人论政”干预社会。近代“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浓。文人天生就有言议政事的个性,诉求抱负的决心,将报刊作为武器来影响时局是

他们的爱好也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更希冀引起国家当权者的重视。康有为就曾提出过国家设立官报局的主张,即由国家出资,官报局办报,再用公费给官员等订阅,目的是使宣传到位,有利于统一思想。官报局还要审查各省所办的报刊,对被认为“悖谬不实”的内容,要下令“纠禁”,目的是控制舆论,防止不利于国家的思想流布。

王韬等人提出的“通内外”“通上下”思想,也被以后的维新运动思想家们所继承,但他们不再局限于为君王“耳目”的“通”。数十年的洋务运动,耗用了巨大的国力和财力学习西方器艺,却换来堂堂中国被“蕞尔小夷”挫败的结局,这让满怀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他们所论的“通”,不仅通中外、通上下,而且与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议论相连相通,是较全面的对报刊“通”的传播功能的认识。但他们虽然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①他们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寄托于近代报刊,给予了近代报刊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

王韬等人提出的“新闻自由”思想,也被以后的维新运动思想家们具体政治化。王韬以中国古制为例,论证实施言论自由的必要性,“盛治之朝,唯恐民之不一,未闻以议为罪也”^②。他所描述的自由,其实是为像他这样的在野士人通过报刊为国建言罢了,其旨归非为新闻自由之本身的言论独立,而是服务于政治与国事。及后,梁启超亦提出新闻自由观,同时认为“自由与制裁二者,不惟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1页。

^② 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申报》,1878-02-19。

不相悖而已,又乃相待而成,不可须臾离”^①。他认为言论自由必须以其对社会承担的道德义务为前提,还要服从法律规定。他所认为的“自由”皆服务于其宪政的政治理想,报刊是政党代表“国群”参与国家政治的工具而已。由此,新闻自由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政治需要。这也只是在继承王韬等人报刊思想理念的具体政治化而已,“国事”才是他们新闻自由思想的最终依归。如果说王韬等早期新闻思想启蒙家所提的报刊“开民智”中的“民”,只是传统“民本”思想在近代的延伸,那么维新思想家们的“开民智”,则既是对“四万万人之民智”,更是对“民权”的一种呼吁。他们开始运用资产阶级国家思想来思考国民权利的问题,虽说并不彻底,但毕竟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

自王韬首倡“通才”办报之后,新闻记者应具高才博识的新闻人才观便逐步成为中国新闻界的共识。翻检 20 世纪中国人撰写的新闻学论著,不难发现,从徐宝璜的《新闻学》开始,几乎每一部新闻学著作在讨论“新闻记者之资格”时,都毫无例外也认同了王韬的观点。例如,徐宝璜说:“普通访员所采编之新闻,非为一方面的、纯一的,乃为各方面的、十分驳杂的,故非有各方面的知识,事事内行,观察既不能透彻,记载安望能明了? 故其知识虽不必深,但不可不广也。”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说:“新闻记者必要之常识,比诸一般常识,尤当较高一等,既于普通常识之上,又须有相当之素养。”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中说:“新闻记者要具备丰富的常识,可以说是包罗一切的常识,只有具备了丰富的常识,才能熟知一切。然后无论采访新闻、编审新闻、评论新闻,都不致有盲目之弊。”^②由此可见,王韬的“通才”办报思想成了中国新闻学界的共识。

^① 梁启超:《十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1 页。

^② 转引自徐新平:《重评王韬的新闻思想》,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9)。

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同样承认这一见解的正确性。平时,我们要求记者要做一个“杂家”或是“杂家型的专家”,其思想内涵与王韬的“通才”办报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王韬是我国至维新运动兴起前最重要的新闻思想家,他集办报实践家与学者于一身,站在中西汇通的角度上,全面阐述了对新闻事业的认识,为后世中国新闻思想的奠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了维新思想家们的办报理念及办报实践。王韬的报刊思想可贵之处在于,他用自己的报刊实践和对报刊功能的系统论述,提高了当时人们对报刊作用的认识,加速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进程。他亲手撰写的针砭时弊、倡导改革的政论,开创了“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他提倡的品性诚正、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对造就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和促进新闻工作者的自身修养,起了指路导航的作用。正如台湾新闻史研究名家赖光临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报人具有正确之报业观念,并发为言论,见之篇承,似以王氏为第一人。”^①

^①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册),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33 页。

第二章 承启：“维新”与“革命”的鼙鼓

第一节 “文人论政”传统承上启下的时代条件

一、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1897年后,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各地维新志士以极大的热情创办报刊。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准官绅士民办报诏,这更进一步促进了各地报刊的飞速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国人办报活动,在维新变法运动中走向高潮。这是“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一)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要特点

1. 数量大:我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

近代中国人自办的报刊,自1873年至1895年的20余年中,总共有30种左右。在民族危亡的局势下,中国人积蓄已久的办报渴求一下子迸发出来,全国官绅士民各界的报刊出版风起云涌。维新运动兴起以后,在短短的不到4年的时间里,全国共出版了约90种报刊,约占全部新出的中文报刊的80%。如果把外国人新办的外文报刊(包括日本在台湾所办)计算在内,也达到总数的70%左右,^①远远胜过19世纪70年代以来国人所办报刊的总和。

2. 地区广:由沿海城市延伸到内陆

以往外报绝大部分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等沿海城市,而

^① 《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此时国人报刊不仅在上海等外报基地发展,还深入长沙等内陆中小城市。这些报刊兴起于 1895 年,迅速席卷全国 20 多个城市,如杭州、温州、苏州、无锡、芜湖、桂林、成都、重庆、萍乡、开封和西安等地。由外报曾经活动的 8 省,扩至安徽、四川、广西、湖南、河南和陕西等 6 省,比原来外报活动的地区大大扩大了。以往外报往往是循着外国势力侵华的路线移动的,而此次报刊的发展是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潮流延伸的。这主要是因为国人救亡图存的运动是以中国内陆为主要舞台,那些与运动同呼吸共命运的报刊,总是在运动的周围摇旗呐喊。因此,中国报业的地区布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那种以沿海为主的失衡状况,报业重心逐步向资源丰富、腹地辽阔的内陆移动,长江流域报业的地位也有所上升。这些报刊和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更加广泛地结合起来,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3. 品种多:出现多种专门报刊

在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除了以政论见长的综合性报刊继续发展外,还出现了专业性报刊、纯商业性报刊、文艺娱乐性报刊、文摘性报刊、图画报刊、白话报刊以及以青年、妇女和儿童等各类社会群体为对象的报刊,其中不少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报刊类型。例如,1896 年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的《指南报》,是我国最早的消闲性小报;1897 年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报》、黄源澄在上海主编的《算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性科技报刊;1898 年康同薇、李蕙仙等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是我国最早的由妇女主持报务、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报刊;^①1897 年陈念护在上海创办的《集成报》,所载内容大多辑自当时出版的各种报刊,成为文摘报的发端等。另外,为了“开通民智”“作育新民”,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开始倡导运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2 页。

用白话文,传播“新学”“新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①当时出现了几家主要的白话报,如《蒙学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

(二)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旋律是宣传维新变法

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流,始终是维新派主办、以宣传维新变法为主旋律的政论性报刊。甲午战败,彻底打破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迷梦。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人的劫难不是单纯进行“器用改革”所能挽救的,其根源在于封建制度,因而提出了变法图强和“体制革新”的观点。^②而这种认识的宣传和传播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只有通过报刊进行,并以此来广泛影响朝廷官员和平民百姓,从而促使后期办报高潮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的著名报人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严复、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比较有名的报刊主要有《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和《国闻报》等。

从《万国公报》到《中外纪闻》,再到《强学报》,虽然很快就被清廷扼杀,但它们的影响却是扼杀不了的。它们的出版使士大夫知识分子“渐知新法之益”,出现了“识议一变”的生动局面。^③强学会的成立,标志着酝酿了几十年的变法维新已由思想宣传转变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更是冲破了封建“言禁”的束缚,为即将到来的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

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影响最大的是1896年8月9日创办的《时务报》。《时务报》由黄遵宪带头筹划,梁启超任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其中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使“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上

^① 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② 曾实明、黄月琴:《近代报刊与中国现代化意识的交互关系》,载《湖北大学学报》,2002(2)。

^③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①知识界人士竞相阅读该报。这种情形和第一份由国人创办的报纸《昭文新报》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当时人们还以读报为耻,知识分子对它采取的是“不屑”的态度;而到了《时务报》出现时,读报却成了一种时尚。一年后,该报发行量就达到1.7万份,创造了当时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后,该报转为封建官报,失去了报纸引领时代潮流的先锋作用。^②

这一时期出现的维新派主办的政论性报刊,又以澳门的《知新报》、长沙的《湘学新报》和《湘报》、天津的《国闻报》等最为有名。《知新报》是维新运动在华南地区重要的舆论阵地,也是第一次办报高潮中出版时间最长的报刊。该报于1897年在康有为亲自策划下创刊于澳门,到1901年才停刊。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戊戌政变后到《清议报》创刊前3个月,它是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的唯一报刊。《湘学新报》是维新运动在华中地区重要的舆论阵地,湖南是当时维新运动中“最富朝气的—个省”,创办于湖南长沙的《湘学新报》自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配合日益高涨的维新运动,维新派人士还在长沙办了一份日报《湘报》,谭嗣同是主要撰稿人。《国闻报》是维新运动在华北地区重要的舆论阵地,也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其主要创办人是严复。该报尤重外报选译和采访工作,“以通外情为要务”。严复翻译的著名的《天演论》,最早就是在《国闻报》上发表的,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国人。该报注意斗争方式,戊戌政变后,因顶着日商招牌继续出版,报道了“戊戌六君子”的殉难过程,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资料。

(三)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对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

1. 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

①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47页。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91页。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控制和垄断新闻媒介,禁止言论出版自由。有清一代,更是变本加厉。直至1896年《时务报》创刊,才在事实上冲破封建“言禁”。这些维新派报刊在宣传维新的同时,猛烈地抨击了“禁著私书,禁谈国事,禁上直言,禁倡清议”和“严巷议之诛,立腹诽之律”的专制政策。“百日维新”期间,在康有为等维新派大臣的呼吁下,光绪帝颁准官绅士民办报诏,允许报纸“据实倡言,不必心存忌讳”,并要求各地给办报以免税的待遇。其间“报禁”一度解除,“言禁”一度放松,“新闻法”的制定也一度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维新派多年来争取报刊出版自由的重大胜利,也是对中国新闻事业的重大贡献。^①

2. 成长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报人

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些有志之士通过对西方的学习与研究,思想比较先进、活跃。他们开始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融入自己的报刊宣传活动之中,利用报刊宣传现代文化,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主要的思想先进人物,通过办报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报刊则成为他们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强有力的武器,也成为他们思想认识不断得到锻炼的有利途径。这些先进人物将民族命运与报刊紧密联系起来,报刊的言论直接引起了社会政治力量的改变,使维新改良成为社会的主流。这一时期培养与锻炼的一批有思想、有知识的报人,为以后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3. 取代了外报在中国新闻舆论界的主导地位

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认为,大众传播在发展中起到了“伟大的倍增器”的作用,能够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态度传播得更快更远。^② 这一时期,报纸的传播作用开始得到重视,从早期王韬等人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04页。

^② [美] 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创办的一批具有改良思想的报刊,到康、梁创办的系列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报刊已经成为上至朝廷下至一般士大夫所不可缺少的读物。1895年,梁启超编辑了我国第一份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万国公报》。在它的宣传下,清廷大批官员参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成立的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加之后来《时务报》的言论大胆新颖,各地官宦督抚形成了读维新派报刊的风尚。这些报刊打破了外报在中国新闻舆论界的垄断地位,使中国人的报刊首次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

4. 开创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

在早期报纸诞生的初期,知识分子依旧醉心于科举,追求功名利禄。从事新闻事业的报人,大多是落魄文人、疏狂学子,办报的目的或者是为养家糊口,或者是为抒发抑郁之情。所以,当时报刊大抵“沪滨冠盖”“祝融肆虐”“惊散鸳鸯”等字样填满纸面,千篇一律。^①一般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多视办报为不务正业,视报纸为文坛垃圾,报人地位之低可见一斑。自从康有为、梁启超等投身报界后,他们以思维敏捷、笔锋犀利、知识渊博的政治活动家气势,一扫落魄文人的陈腐气息,开我国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他们还积极呼吁提升报人的地位,为报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打下了基础。加上他们的办报理念,以往知识分子耻于从事新闻事业的局面得到了改变。从1898年起,一批报刊阅览室在各地应运而生,报刊越来越受重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

5. 创造了报章新文体

所谓“报章文体”,是指出现于报刊之上、不同于桐城派古文的一种比较通俗浅近的文体。王韬首用于《循环日报》,但不成气候,我国多数报刊仍然流行用桐城派古文。甲午战败后,中国社会酝酿着巨大的变革,桐城派古文再也无法表达变革的激情,亦无法介绍

^① 梁启超:《清议报》第100期,1901-12-21。

西方的新知新学,于是一种新的文体应运而生,其中作出卓越贡献的要数梁启超。从19世纪90年代起,梁启超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评论,这些文章大多刊载在《时务报》和《新民丛报》上,故这种文体被称为“时务体”或“新民体”。这种“新文体”,半文半白,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①。新文体的出现,风行一时,影响了一代文风,成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一种过渡,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开了先河。

二、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

1901年,清廷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宣布推行“新政”,于是“报禁”“言禁”逐步解除,我国民族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推出了《大清报律》等一批有关新闻事业的法律、法令,国民初步获得了言论、出版自由的合法权利。自1901年至1911年,特别是在1906年新闻法制建设起步后,全国官绅士民积极创办各类报刊,新办报刊数量与月俱增。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1908年为118种,1909年为116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为209种。办报地点也已遍布全国,计有上海、北京、天津乃至伊犁、西藏等60多个城市或地区。^②这是“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

(一)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要表现

1. 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

在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保皇派报刊,而且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革命派报刊大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② 史和、姚福申、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力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大多数报馆还是革命党人策划武装起义的指挥机关和联络机关。上海、武汉和港穗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三大办报基地。在上海创办的报刊著名的有《中国女报》《神州日报》、“竖三民”报等;在武汉创办的报刊著名的有《楚报》《商务报》《大江报》等;在港穗创办的报刊著名的有《中国日报》《可报》《时事画报》等。

2. 新现象:立宪派报刊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有为立即宣布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帝国)宪政会,全力鼓吹君主立宪,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的立宪宣传运动。参加立宪宣传的报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立宪派分子创办的个人报刊,如《政论》周刊、《国风报》、《国民公报》等;另一类是立宪派团体创办的机关报刊,如《预备立宪公报》《蜀报》《广东自治研究录》等。

3. 发展:清廷主办的官报

自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廷地方政府开始创办官报,以控制新闻舆论,抵制民办报刊的社会影响,如《北洋官报》《南洋官报》等。后经朝廷倡导,各省纷纷根据自己的政务繁简和经济力量大办官报,如《山西官报》《湖北官报》等。1906年“预备立宪”后,中央政府的一些部门也开始创办机关官报,进入官报制度化阶段,如《商务官报》《学务官报》等。这些官报一般要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核,经批准出版后又往往成为这些主管部门宣达政令的喉舌。1907年,清廷正式设立官报局,着手筹办中央级官报,如《政治官报》《内阁官报》等。这些官报的主要内容是公布法律、命令、文案等,大多免费发至各级衙门,与一般读者无缘,并没有真正起到左右舆论的作用。

4. 改进:新闻业务

在内容上,报纸已具备新闻、评论、副刊和广告四大要素,新闻报道成为主角。报道量大大增加,覆盖面也相应扩大,体裁日益增多。作为新闻体裁的通讯也开始出现,标题出现大字题和主题、眉

题、肩题、副题等多行题。为提高时效性,一些报纸开始发行号外。摄影图片被广泛运用,新闻照片作为一种新闻手段登上报坛。“时评”的创立、“编者按”的广泛运用等表明评论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在形式上,摆脱了书册、杂志式,揭开了我国报纸版面革新的序幕。“综合编辑法”被广泛采用,这一方法将重要新闻放在版面的显著位置,并充分利用大字、通栏标题、加框、加花边、设专栏、配图片等编辑手段,使报纸的特点和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二)保皇派报刊的发展和革命派报刊的兴起与发展

这一时期,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继续在海外办报。他们除攻击“逆后贼臣”之外,继续进行思想启蒙、介绍西学、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宣传,在一定范围内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这是戊戌政变后保皇派在海外创设的第一个舆论机关。《清议报》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所谓“主持清议”,就是猛烈抨击慈禧、荣禄等“逆后贼臣”,拥戴“明君圣主”光绪复位。所谓“开发民智”,主要是宣传爱国救亡、伸张民权以及破除封建传统束缚等思想,以唤醒民族觉醒,激励国人奋发图强。这份报纸美化光绪皇帝,维护封建制度,是维新派人士转向保皇的一个转折。但在新闻业务上却有所发展,如它改革了言论写法,把新闻和评论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后来报纸经常使用的“时评”的起源。该报还最先使用了“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名词,后来都被沿用下来了。

1902年,梁启超又于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这是他一生中创办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梁声称要将其办成“中国报界前此未有”“足与东西方各报相颉颃”的报刊。^①在宣布办报宗旨时,梁启超强调“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务采中西道德”“以教育为主脑”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等,就是要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对人们开展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这是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时,在宣传内容上有别于其他刊物的一个很大特色。^① 这种思想,在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代表作《新民说》中表现得最为完整、充分。在宣传方向上,该报在总体上倾向保皇立宪,但前后有别。前期曾高谈革命,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大受欢迎;后期“柔声细语,形同妇妾”,江河日下。这份报纸主观上是为鼓吹社会改良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客观上却对当时广大的热血沸腾的爱国知识青年起到了启蒙作用。

这一时期,特别是清廷宣布举办“新政”后,在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的报刊也乘势而起,重新在国内各地出现。这些倾向改良主义的报刊,大多数是由各地君宪派人士创办的,少数是由流亡海外的康有为领导的保皇派人士回国创办的。

由各地君宪派人士创办的报刊,影响较大的有《大公报》《京话日报》和《东方杂志》等。《大公报》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报纸之一,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于天津。其主要政治倾向是宣传保皇立宪,以“敢言”、报风严肃和“替劳苦大众说话”见重于时。^②《京话时报》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份销数逾万的报纸。该报于1904年由彭翼仲创办于北京,在政治上倾向于保皇立宪。该报以中下层市民为对象,用通俗的北京话出版,目的是“开民智”。该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大胆揭露官府积弊,勇于为下层民众鸣不平。为扩大影响,该报在京城菜馆设讲报处,在街巷设阅报牌,后被清廷以“莫须有”罪名查封。《东方杂志》是清末时一份大型文摘月刊,后来发展成综合性杂志,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该刊以“启导”国民为宗旨,主张“和平改革”,分门别类地摘选国内外报刊的新闻、言论和资料。而保皇派人士回国创办的影响最大的报刊是《时报》。《时报》是康

^① 梁启超:《本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梁保皇会在国内的重要喉舌,于1904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参与筹办和撰稿,由狄楚青主持。该报主张君主立宪。为和《申报》竞争,该报在新闻业务上锐意革新,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受到知识阶层的欢迎,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报纸。

这一时期,已经认识到办报宣传之重要作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积极在国内开展了办报与宣传活动,并成为国人第二次办报高潮的主流。其中著名的有《中国日报》《中国女报》《神州日报》“竖三民”报及《大江报》等。

《中国日报》是孙中山领导、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兴中会的机关报,也是中国第一份资产阶级革命报纸。其于1900年创刊于香港,由陈少白主持。该报早期宣传爱国救亡,后期大力宣传三民主义。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在港重要的舆论阵地,也是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场所。《中国女报》是1907年由秋瑾在上海创办的通俗月刊。该报把提倡女权和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结合起来,仅出两期就因秋瑾被捕就义而停刊。《神州日报》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现代化大型日报,1907年由于右任等人创办于上海。该报较为注重宣传策略,对清廷的抨击多采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借口“有闻必录”,大量报道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它成为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上海光复前,始终被认为是革命派的言论机关。

“竖三民”报是同盟会成立后于右任创办的几家报纸的统称。1909年,于右任在上海租界创办《民呼日报》。该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革命色彩鲜明,内容以报道灾荒为重点,大量揭露清廷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事实,出版92天后被封。20余天后,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吁日报》,因盛赞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出版一个月后被封。一年后,于右任创立《民立报》,他在《民立报》发刊词中凛然宣告:“是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权,有独立之民

权,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①他认为只有有了“独立之言论”,才能产生“独立之民族”,进而才能保卫“独立之国家”。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独立是彼此依存的。正因为如此,《民立报》得到了孙中山的大力支持,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纸。从“民呼”“民吁”到“民立”,于右任绝不因挫折、失败而气馁,他百折不挠地争取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对言论报国的理想忠贞不渝,和他的朋友一起开创了知识分子言论报国的新局面。

《大江报》创办于1911年,前身为《大江白话报》。由詹大悲投资创办并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为文学社机关报。该报有两个特色:一是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二是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该报发表过何海鸣、黄侃的两篇振聋发聩的评论《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鄂督极为震恐,立即查封报馆并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闻讯后自动投案,引发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②此事件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哗然,许多新军士兵都来到报馆表示声援。当局慑于民情,对詹等人只好从轻发落。虽然《大江报》从创刊到被封,只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武昌首义的成功跟该报在新军士兵中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正所谓“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③。时人对它的赞颂之辞,是当之无愧的。

说到这一时期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就必须提到著名的“《苏报案》”。《苏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所掌握的第一份报纸,经历了三发展个阶段:1896年6月26日由胡璋创办于上海,打着日商招牌出版发行,内容多是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文字低劣,难以为继;1899年被退职官员陈范买下,作为“主持清议”的舆论机

① 于右任:《中国万岁!民主万岁!》,《民立报》创刊号,1910-10-11。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③ 《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关,开始一度被认为是亲保皇党报;1902年,《苏报》与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合作,成为一家影响巨大的革命报纸;1903年5月,邹容《革命军》出版后,《苏报》连续发表文章,介绍《革命军》的内容,称赞该书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同年6月底,该报又刊登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氏之关系》。《苏报》毫无忌惮地鼓吹革命,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震动。清廷极为惶恐,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发表的第二天,便请租界当局查封了《苏报》。章太炎等人被捕后,清廷要求引渡,遭到租界当局拒绝。在这场以洋人做法官,清廷为原告,《苏报》为被告的奇特诉讼中,章太炎、邹容分别被判监禁3年和2年,《苏报》永久停刊。在这场斗争中,章太炎、邹容驳斥清廷指控,慨然陈述革命观点,把法庭变为宣传革命的讲坛,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情操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尊敬。这次官司历时10个多月,国内外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极大地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此后,革命党人又在上海创办了多家革命报刊。

(三)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要特点

与维新运动时期形成的第一次办报高潮相较,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政党报刊在报业中占突出地位。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内部的两大党派——立宪派和革命派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纷纷在海内外创办自己的党报,两党之间也展开了长期的论战。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取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办报的主角。戊戌变法前后很长一段时间,海内外舆论阵地基本上被改良派所控制。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报刊在海外大批涌现,不仅数量上超过了改良报刊,而且在舆论上占到了主导地位。三是政论的战斗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外各种矛盾激化,各种政治力量都广泛利用报刊政论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同时对敌进行思想斗争。四是办报地区、读者对象日益扩大。辛亥革命时期的办报活动先由海外转

向国内,再由腹地向东北、西北、西南边远地区延伸。读者已扩大到新军、会党、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等。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报刊的一些基本认识与改良派大体一致。但是,革命派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政治代表,他们的办报思想更倾向于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内涵,更具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具体表现在:一是高度评价报纸的政治斗争工具的作用,把报纸视为革命的锐利武器。郑贯公曾将报纸称为“笔枪”。二是承认报刊的党派性,主张利用报刊宣传革命的纲领、政见,公开承认其报纸为“党报”和“机关报”。三是认为报纸是国民的代表,特别是平民的代表,坚信其报纸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四是重视报刊制造舆论的作用,指出要革命就必须造革命之舆论,而造革命之舆论必须靠报纸。孙中山更将报纸视为“舆论之母”。此外,革命派报刊还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重视报纸“开民智”的作用,认为报刊宣传应与武装斗争紧密配合,主张以通俗的语言向“下等社会”宣传革命等。因此在总体上,他们都重视报纸的舆论工具作用,在坚持把武装斗争放在首位的同时,做了大量的报刊宣传工作,对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些观点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办报口号,作了富有斗争精神的解释和补充。但是,他们的办报思想始终打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英雄史观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低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对于西方新闻学的吸收和理解也较为肤浅,从而使其办报思想内容很单薄。

三、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大论战

辛亥革命前夕,在美洲、日本和南洋等地区,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发生了三次大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派的转变。保皇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初步的传播;继而保皇派气势一落千丈,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这些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一)同盟会成立前,以美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大论战

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国外,从变法维新转向保皇。1899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随后在世界各地设立了170多个分支机构,会众以数十万计。仅美洲就建立了78个分支机构,旧金山一地就有近万名会员,占当地华侨总人数的1/3。^①各地保皇会都把创办报刊作为重要任务,进行保皇立宪宣传。保皇派的主要骨干几乎都参加了办报活动,仅美洲地区,保皇派就新办和控制了近30家华文报刊。其主要报刊有1899年改组的旧金山《文兴报》,1900年创刊于檀香山的《新中国报》,创刊于旧金山的《金港日报》等。这些报刊都以歌颂清帝变政为宗旨,鼓吹要救出传出“衣带诏”“舍位忘身而变法”的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大张旗鼓地进行保皇和政治改良的宣传,维护清朝皇帝和封建君主制度。

在保皇派的报刊宣传呈“一时之盛”的形势下,为了打破其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革命派向保皇派发起了反击,从而引发了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的第一次大论战。

1903年10月,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将兴中会会员程蔚南、许直臣等创办的《隆记报》改组为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更名为《檀山新报》,使其成为最先倾向于革命的一份华侨报纸。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党报》《敬告同乡书》两篇著名文章,驳斥了《新中国报》鼓吹的“先立宪君主后民主”“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的保皇言论,戳穿保皇党人“爱国”的假面具。《新中国报》撰文反击,从而开始了两派之间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文章中力言“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并尖锐地指出革命与保皇是决然对立的两码事,从而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线,并论述

^① 桂栖鹏、赵晓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两次大论战》,载《出版科学》,2003(1)。

了革命后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孙中山为了将论战进行到底,还从香港《中国日报》抽调了一些革命派骨干充实《檀山新报》,担任该报的主笔等职务。为了营造更大的声势,他还号召上海、香港、日本等地的革命党人“遥作声援”“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

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来到美国的旧金山,继续与当地的保皇派展开斗争。在檀香山时,孙中山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他利用这一关系,与美国的洪门致公堂取得联系。当时,革命派在美国大陆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而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办有《大同日报》。该报由爱国华侨唐琼昌、朱三进等创办。唐琼昌是第一个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他曾大胆地提出:“要使祖国进步,惟有革新政治,而政治要进步,必须先推翻满清帝制。”但该报当时以欧榘甲为主笔,为保皇派所控制。孙中山利用他与洪门的特殊关系,在唐琼昌等人的帮助下,对《大同日报》进行了彻底改组,赶走了欧榘甲,改由革命党人刘成禹任主编,使《大同日报》“旗垒为之一新”,这就是有名的“《大同日报》易帜事件”。易帜后的《大同日报》,宣布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致公堂新章程,刊登了孙中山在美国几十个城市向洪门会众发表的反清革命演说,大大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①。一些华侨报刊也开始向革命转变,如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派革命党人陈少白、郑贯公为该报驻香港记者,并免费为孙中山翻印了一万多册《革命军》,供他在华侨中分发。

这一时期,两派斗争的主战场在美洲,但在南洋也时常发生激烈的斗争。1899年创刊于新加坡的《天南新报》,创刊于马尼拉的《益友新报》等,是这一时期保皇派在南洋的主要舆论工具;1903年

^①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创刊于缅甸仰光的《仰光日报》，1904年创刊于新加坡的《图南日报》等，是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南洋的主要舆论工具。二者之间笔战频繁。此外，两派之间特别是保皇派对革命派报刊的拉拢、分化也时有发生，如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为革命派所创，但保皇派唆使投资该报的部分侨商“拆股”，使该报成为保皇派的机关报。在曼谷，革命派报刊《湄南日报》改组，保皇派趁机夺得部分产权，以此作资创办了保皇派的《启南日报》。

总的来说，经过1904年在檀香山和旧金山两地革命派报刊对保皇派报刊进行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派的转变，保皇派对华侨思想的禁锢和影响开始削弱，民主革命思想在美洲和南洋华侨中得到了初步的传播。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完全消除保皇派在美洲和南洋的影响，他们仍然掌握着许多有影响的报刊，不少革命派报刊创办不久即遭到保皇派破坏，在两派力量的消长和舆论阵地的争夺上时有反复。为了彻底打退保皇派报刊的进攻，革命派报刊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从而引发了两派报刊之间的第二次大论战。

（二）同盟会成立前后，以日本为主战场的第二次大论战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革命派与保皇派在国内外就展开了一定规模的笔战。1901年《国民报》刊载了章大炎的《正仇满论》，这是革命派射向改良派的第一箭；1902年改良派《岭海报》攻击广州起义，《中国日报》立即批驳，这是革命派与保皇派的第一次对阵交锋；1903年后论战趋繁，如《中国日报》《苏报》对康有为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等观点进行了批驳。但从本质上说，此时这些论战只是零星的、分散的，还未对保皇派从政治上、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清算。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会议推选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该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即清算保皇派思想影响，扫除革命发展障碍，扩大革命

阵营。该报一创刊,即以主帅身份投入到与保皇派最有影响的报刊《新民丛报》的论战中。首先,创刊号上载有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三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驳君主立宪主张。《新民丛报》在梁启超的主持下起而论战,先后发表 20 多篇文章,向革命派提出了各种驳难。特别是将其《开明专制论》等文章,汇成一册,广为散发,反驳革命。接着,《民报》把论战矛头直指《新民丛报》。汪精卫的《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成为第一篇系统批评《新民丛报》的文章,另胡汉民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重大分歧列为 12 条,分类驳斥,论战由此全面展开。归结起来,两报论战主要围绕四项内容展开:

其一,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新民丛报》认为满人入关已经 200 多年,早已与汉族同化相安,不再存在什么民族问题;排满必然引起民族仇杀,造成天下大乱。它还抓住“革命排满”的口号大做文章,主张拥戴光绪皇帝,推动清廷自上而下改革。《民报》则认为,清廷早已沦落为帝国主义的“守土长官”,要想救国就必须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廷。关于“革命排满”,孙中山指出:“所谓民族革命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①章太炎也说:“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②这就是说,他们攻击的目标不是一般的满族群众,而是由少数满洲贵族把持的清政权,这在大方向上是符合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要求的。

其二,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新民丛报》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不具备共和国公民的资格,因此在中国只能实现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这也是保皇派极力反对“种族革命”而热衷于“政治革命”的根本原因。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还反复申说: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见《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74 页。

^② 章太炎:《排满评议》,《民报》,第 21 卷第 8 号,1908 年 6 月。

“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①《民报》则认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秩序和人民权益均无保证,中国人民完全有民权立宪的能力,主张顺应历史趋势,废除君主,建立民主共和国。关于《新民丛报》的“政治革命”,《民报》尖锐地指出,保皇派作为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与封建土地占有制有直接的关系,当他们喧嚷“政治革命”的时候,总想与封建势力相妥协。因此,他们极力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就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三,要不要土地国有,平均地权。《新民丛报》认为,中国不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没有必要实行平均地权,实行土地国有对农业生产不利。《民报》则认为,中国确实存在着“豪右”与“细民”的差别,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才能发展生产,才能解决民生问题。《新民丛报》所持的观点,自然与其一贯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和传统士绅利益、反对“下等社会”翻身的立场分不开,但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即梁启超把推行民生主义所可能出现的某些后果,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和帝国主义资本的汹涌侵入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彼大资本既占势力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庾死于其脚下,永无复苏生之一日。”^②这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警醒。

其四,革命会不会导致帝国主义干涉、瓜分中国。《新民丛报》认为,革命是暴烈的行动,必然会引起社会动乱,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中国就会被瓜分。《民报》则认为,革命只是推翻清朝政府,并不排外。如果不革命,中国越来越弱,就会导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应当说,《新民丛报》的看法是有一定根据和道理的,但耽于干涉,就不敢革命或反对革命,这是错误的。而《民报》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包

^①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9页。

^② 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40~342页。

围之中,仍然高倡革命,这种勇气是极为可贵的。但它又对帝国主义心存幻想,这是不切实际的,其实是放过了压迫中华民族的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

在这场论战中,开始梁启超以百炼成钢的气势,单骑奋战,四面出击,气势颇盛。随着论战的深入,逐渐力不能支。1906年7月,保皇派感到对革命派的攻击有点招架不住,主动求和,曾在《新民丛报》第83期上登了一篇《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而《民报》的一批小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由于真理在手,愈战愈勇。至1907冬,论战以《民报》大获全胜而告终。经过这场大论战,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划清了界限。从此,君主立宪主义的市场大为缩小。论战前,保皇会在世界各地有170余处分会,遍布五大洲,会众数10万,而兴中会等革命派会党相比之下小得可怜;论战后,保皇派声势大减,许多人要求退出保皇会,加入革命党。据《民报》记载,自1904年到1906年,退出保皇会加入革命党者数以千计,世界各地保皇党人也纷纷退会,有的保皇派报刊主笔也宣布接受“革命真理”,同保皇派一刀两断。更有甚者,保皇派报刊的旗帜《新民丛报》,在此次大论战中也落得个不得不黯然停刊的下场。这是同盟会成立前后,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大论战,一场引导民众从改良主义迷雾中醒悟过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大推进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蓬勃发展。

(三)同盟会成立后,以南洋的新加坡为主战场的第三次大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在南洋,革命派报刊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地。至辛亥革命前夕,这一地区的革命派报刊主要有新加坡的《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马来亚的《吉隆坡日报》《光华日报》《四州周报》等,印度尼西亚的《泗滨日报》《民铎报》《苏门答腊报》等,暹罗的《华暹日报》《同侨报》等,缅甸的《光华日报》(1910年改名《进化报》)等。这次论战的主战场是新加坡,对垒的报刊,一方是革命派

的《中兴日报》，另一方是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的主要人物，革命派方面有田桐、居正、胡汉民、汪精卫、周杜鹃、林时爽和陶成章等，保皇派方面有徐勤、欧榘甲、黎研诰、伍宪子和梁伯鸣等。

这次论战由《南洋总汇报》于1906年首先发难。开始，由于保皇派的欧榘甲、伍宪子等人来新加坡主战，革命派又忙于建立同盟会组织，因此在言论上，革命派暂时居于下风。1907年7月12日，同盟会创立《中兴日报》，对《南洋总汇报》展开了猛烈的反击。革命派首先对梁启超在东京发表的“政闻社”政纲宣言予以驳斥讥刺，题为“驳政闻社宣言书”，连载8天，畅快淋漓。1908年，保皇派从美洲召来徐勤，徐勤于6月底至7月初，用“亦布”笔名于《南洋总汇报》上发表了《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等文，指出“孙某”（孙中山）之革命将招来列强瓜分中国之祸，并指斥“孙某”之所为，如“洪杨之乱”“拳匪之乱”，乃祸国殃民之“罪行”。9月，《南洋总汇报》记者以“平实”的笔名，发表了题为《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的文章，提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以及革命足以招来列强瓜分中国的看法。期间或稍后，该报还先后发表了《革命召瓜分论》《满洲本我同种论》《论今日时局止可立宪救国万无可革命之理》等评论文章，继续散布其保皇立宪主张。

对于保皇派报刊的谬论，《中兴日报》则撰文一一反驳，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大声疾呼。自7月起至10月间，《中兴日报》连续发表《申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精卫）、《革命可以杜瓜分之实据》（精卫）、《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南洋小学生——孙中山笔名）、《驳总汇报惧瓜分之说》（汉民）等。每篇一刊七八天或十几天，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如狂涛怒潮，沛然莫之能御。其文字都非常浅白，就事论事。这些文章，一方面驳斥了《南洋总汇报》的谬论，另一方面开导侨众。这些文章入情入理，让大家清楚地认识到了保皇派甘为奴隶之可耻。胡汉民后来回忆那次论战说：“保皇党在星洲不敌，则急由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

数续,不能终篇,托故他去。保皇党既墨,华侨乃趋于革命旗帜之下。”^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场论战中,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中兴日报》上先后发表了多篇旗帜鲜明的文章,对保皇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中,孙中山引土耳其、摩洛哥为证,指出革命绝不会招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论战辨明了真理,最终就连新加坡保皇分会会长、侨商中向保皇党捐钱最多的邱菽园也与保皇党脱离了关系,并在报上批评康有为。在9月中旬教训《南洋总汇报》记者平实的文章中,孙中山发表《平实开口便错》《平实尚不肯认错》等文,斥他把“时势”当作为“自然”之幼稚,指出:“时势者,纯乎人事之变迁也;革命者,大圣人大英雄能为,常人亦能为。”^②

此外,居正以“药石”的笔名发表了《论国会兴国民之利害》,把民主宪法、国民之权力义务进行分析比较,以教导侨胞。胡汉民的许多短文,如《总汇报词穷之可怜》《斥总汇报之谬妄》等文,幽默犀利,切中肯綮,竟使《南洋总汇报》无力招架。他还发出“呜呼!满洲所谓宪法大纲”的喟叹,把清廷企图以立宪把戏,阻止革命运动之阴谋加以揭发,使华侨更坚信了非革命无以救国的道理。

除新加坡外,南洋、美洲的其他报刊也投入了这场论战。在加拿大,革命派的《大汉日报》与保皇派的《日新报》之间,进行了大小论战200多次。在美国,檀香山的革命派报刊《自由新报》与保皇派报刊《新中国报》,从1907年到1911年,几乎每天都在辩论,而且常常闹到法庭;旧金山的革命派报刊《少年中国晨报》与保皇派报刊《世界日报》、革命派报刊《大同日报》与保皇派报刊《文兴报》的论战也十分激烈。此外,泰国的革命派报刊《华暹新报》与保皇派报刊

^① 彭松涛:《新加坡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贡献》(续),民革中央委员会, <http://buy.invest.china.cn/chinese/pplevo/13538.htm>, 2008-01-26.

^② 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

《启南新报》，缅甸的革命派报刊《光华报》与保皇派报刊《商务报》之间，在1907年至1910年间，就革命与改良等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一场持续了三四年之久的大论战，其规模之大、问题之多、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灿烂的一页。经过这次论战，保皇派气势锐减，保皇党之登报退会者相继不绝。一些原来支持保皇派的华侨，转而支持革命派；一些原来持保守立场的报刊，也转而采取同情革命的立场。与之相反，革命派力量却获得空前的发展。第一，革命派报刊越办越多。1905年8月前，革命派刊物不到30种，报纸10多种；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刊物达到40多种，报纸则增加到60多种。第二，革命组织迅猛发展。在檀香山《自由新报》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一晚上就有100多人要求加入同盟会，与几年前美洲、南洋一带“还没有革命派组织，当地侨胞咸视革命党如蛇蝎，革命党人不敢以真面目向人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①。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各地华侨积极参加革命，他们在经济上提供了大力支持，许多华侨还直接投入中国国内的武装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次论战的胜利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第二节 “文人论政”传统承上启下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23日生，字卓如，号任公，笔名有小伙子江、任甫、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哀时客等40余个。两岁时，母亲就教他认字，四五岁时，祖父教他读四书、诗经，才华早露。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岁晋京会试，落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2~473页。

榜而归。遂师从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学习4年,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体系,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3月,梁启超再赴北京参加会试。为反对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由康有为发起,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公车上书”,开始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同年8月,出版《万国公报》双日刊,“只有论说一篇,别无纪事”,刊印千余份,委托《京报》代递,“分送朝士,不收报费”。^①11月中旬,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推举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编撰由《万国公报》改组的《中外纪闻》,增刊新闻、西书译稿等栏目,于1895年12月在北京出版,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1896年1月,《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后,梁启超的衣服、用具、书籍均被没收,“流浪于萧寺中数月”,而“办报之心益切”。^②

1896年8月,应黄遵宪之邀,梁启超赴上海任《时务报》总主笔,共发表60余篇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变法通议》,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到了濒临覆灭的边缘,当前的情况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与其被别人强迫“变”,不如自己主动“变”。主动变法,“变之权操诸己”;被迫变法,“变之权操诸人”。与其被人“变”,不如自己“变”。这篇文章在《时务报》上连载了43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系统地宣传了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轰动一时。《时务报》的言论震动朝野,所译外报文章又使读者大开眼界。尤其是梁启超写的文章,骈散合一,笔端常带感情,气势磅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以致湖广总督李鸿章、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等封疆大吏都通札推广。《时务报》的发行量也与日俱增,创造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成为维新派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机关报。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② 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1897年11月,梁启超应邀去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和《湘学报》《湘报》董事,并为两报撰稿。在此前后,他还曾去澳门参与创办《知新报》,担任该报撰述,“遥领”该报“诸事”,并积极支持上海《农学报》《萃报》《蒙学报》《演义白话报》的出版。“百日维新”期间,他积极参与各项维新活动,并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1898年“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1900年4月在美国夏威夷创办《新中国报》,为第一任主笔。1902年2月、10月,又在日本横滨先后创办与主编《新民丛报》《新小说》,鼓吹“斥后保皇”,主张君主立宪;介绍西方学术文化,进行启蒙思想宣传,成为当时舆论界的“骄子”。1904年6月,他化名潜回上海,参与创办《时报》。1905年11月后,与革命派在东京出版的《民报》展开“保皇还是革命”的激烈论战。

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期间,梁启超于1907年10月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1910年2月领导在上海创办的《国风报》,每期稿件在日本编定后寄出;同年7月又支持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继续鼓吹君主立宪。

1912年11月,他从日本返回北京,12月在天津创办《庸言》月刊。1915年1月在上海创办《大中华》月刊,自任总撰述,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讨袁檄文,反对帝制。1917年参与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的领导工作。1918年底,赴欧洲游历。1920年3月回国,参与主编《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并改名《改造》月刊,鼓吹东方文化。1922年9月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与学术著述,历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

纵观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我们不难发现,一是其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他是清末民初20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

社会教育的先河。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用报刊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在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在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新闻学体系便肇始于此。

二是其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其活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至1907年,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任职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颌德的进化论以及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至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至1928年间,引进了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

三是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辩证体现。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到保皇,又从保皇到立宪。这些转变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美国汉学家约瑟夫·阿·列文森说,从1898年戊戌维新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成为中国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①而其理论成果的大部分,是通过其所办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首先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梁启超56年的生命历程中,有27年在从事与报业有关的活动,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的报刊达到17种之多,所撰文字约有1400万字。这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他牢牢掌握社会的神经中枢——舆论的传媒话语权力,把办报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有力手段。他不仅是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报人,而且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新闻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第三节 《时务报》《新民丛报》 及梁启超新闻思想评析

一、以“爱国”“救国”为核心的报刊价值观

梁启超报刊活动是同他的政治思想密不可分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他晚年表白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②作为一个才华横溢、仕途有望的年轻人,梁启超选择当时为世人所鄙弃的报业为其效命之所,正是这一宗旨的体现。

(一)报刊的价值目标:救中国

梁启超的价值目标是“主体相对稳定的指向目标”,“有明确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有鲜明的指向性”。^③“救国”是贯穿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思想,正如徐佛苏在总结梁启超40年经历时所说:“先生

① 列文森:《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② 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③ 杨义银:《梁启超改造国民性构想之评说》,载《河北学刊》,1994(6)。

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①在 20 余年的报业生涯中,梁启超不断撰文论证报人应有的价值追求。1896 年他主笔《时务报》时,即昌言报馆之尊荣与报人之地位,也殷殷于报人“救国”之念的唤起:“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他强调报人承担“天下兴亡”之责:“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也有责焉已”,他赞誉《萃报》创办者朱强父为“真能忧时之人哉”。1898 年变法失败,其又为“我国民竭忠尽虑,扶持国体”,而“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②1910 年,梁启超创办《国风》,昌言构筑“健全之舆论”,因为“立宪时代之舆论,常立于主动之地位,一有不当而影响直波及于国家耳”。^③

从上述分析可知,“救国”不仅是梁启超办报最根本的追求,也是他希望报人树立的最高价值追求。正是因为梁启超将“救国”作为其价值的根本追求,他才能够不避嫌言,不畏时议,在“众皆言革命”时,倡言“君主立宪”。虽然他在私人感情上痛恨袁世凯,但仍然扶持袁世凯,在众皆噤声时能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时流倡导“西化”之时,又独独转向东方文化,甚至转向自己师从康有为后就弃之如敝屣的乾嘉学派。也正是“国者为何”“何以救国”的观念演变,才导致梁启超对报人的价值信念和报人人才观的流变。“救国”不仅是梁启超的报人价值目标观,也是其报刊价值观的核心构件和灵魂。

“救国”可说是当时所有先进报人的共同价值追求。但同时代许多人并无梁启超这样丰富的阅历,也缺乏他对真理孜孜以求的勤勉。所以,从对“救国”这一内涵的把握深度来说,以及从“救国”理

① 李德顺:《价值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1 页。

② 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19 页。

念的真诚度来说,梁启超的新闻职业价值目标观对后世是有诸多教益的。

(二)报刊的价值标准:兴民权

所谓“价值标准”,是对人和现象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标准”。梁启超以“救国”为报人最高的价值追求,而“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所以尊重国民之全体而不敢亵,即所以巩固国家之基础而勿使坏也”^①。

要救国,就必须兴民权,这是梁启超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自从东渡日本、国民思想成熟之后,办报馆能否有利于兴民权,已经成为梁启超评价报馆和报人的最高价值尺度,也就是价值标准。梁启超晚年对国民素质更趋失望,因而转向希望在报上倡导文化运动,以养成国民。这从表面上看来是与“兴民权”这一价值尺度偏离了,但其实是希望“曲线救国”,教导国民,以使国民具有行使民主的资格。有了资格,就能兴民权;而民权既兴,国本则固。

早在维新时期,梁启超就有了朦胧的民权思想。当时他指出报馆的作用在“去塞求通”,曾以“耳目喉舌”喻之,来痛陈“雍塞”之苦:“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诉之君。”^②希望给臣民安上嘴巴,让他们也有权利倾吐自己的心声。流亡海外后,他的民权思想逐渐成熟,“救国”与民权变成“两位一体”。他指出:“《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我国,吾党弗措也。”^③这也表明《清议报》是一份党性极强的维新派报纸。虽然他将《清议报》定义为“在党报与国报之间”,标榜它公正无私,“不涉一党派之私言”,但他又表示“联合同志共兴《清

^① 《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6页。

^② 王玉樑:《价值哲学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③④}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1901-12-21。

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③。同时，“第四等级”说已开始影响到他的新闻观念。他说：“《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④在梁启超谈及报馆责任及报人准则之时，“国民”的利益成为其核心词语。针对国内一些报馆“吾将为政府之顾问焉，吾将为政府之拾遗补阙焉”的定位，梁启超予以有力地驳斥：“谓吾职而尽于是焉，非我等之所以自处也。……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针对“牟利亦宗旨也，媚权贵亦宗旨也，悦市人亦宗旨也”的报界现状，他由衷地感叹：“若为报者能以国民大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斯可谓真善良之宗旨焉矣。”^④在《新民丛报章程》中，梁启超明确“本报……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他认为舆论之所以可贵，“谓其能为国家求多福而捍御其患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不利于国民者，则去之当如鹰之逐鸟雀也”。

梁启超的国民思想和民权观念，无疑是当时先进报人的代表性思想。当时的革命党人将“排满”作为革命要义，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希望通过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拯救国家。而对于办报的价值尺度，执著于“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的“先知先觉之天职”，希望能将“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②辛亥革命后的党人又急于争夺权利，或重建民主政权，对“民权”的宣传则置于末位。但梁启超却始终身体力行，从1900年《清议报》阶段大量刊载传播西方民主学说的文章，到《改造杂志》1922年终刊，诸多内容均立足于培养国民精神。而且，梁启超“兴民权”这一价值尺度的确立，也早于其他同时

^③ 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1册第1页，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④②}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页。

代报人。1903年8月发行的《国民日报》《发刊词》，较好地体现了梁启超“国民”观念和“民权”的思想。总之，梁启超的报刊价值观以“爱国”“救国”为核心，形成了影响到中国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报刊价值观，对当时及后世的报刊价值观念的确立，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历久弥新，是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二、以认识健全舆论和非健全舆论为核心的报刊舆论观

梁启超对报刊舆论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国风报叙例》一文中。他区分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专制制度下舆论的差别，认为资产阶级宪政制度下社会健全舆论将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力促报刊要担当好舆论的制造者和把关者的角色，发挥引导健全舆论的作用。

（一）“舆论”是多数人公开表达的真实意见

梁启超是我国第一个将舆论作为专题来论述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对舆论的概念作出了明确界定的学者。他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①“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公表于外者也。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为舆论”，“夫舆论者，非能以一二人而成立者也，必赖多人；而多人又非威劫势胁以结集者也，而各凭其良知之所信者而发表之；必多数人诚见其如此，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② 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对舆论的论述已经涉及舆论产生的三大要素，即梁启超认为舆论的主体是寻常人，是平民大众；舆论的客体为寻常人之所见，也就是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舆论是多数人自发表达的意见、态度和信念，即舆论的本体。梁启超的论述与现代舆论的界定是基本相符的。同时其论述还反映出舆论的三个重

^① 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海感言》，《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7页。

^②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1页。

要因素:一是多数人所持有的意见,即舆论的公众性;二是对这种意见要公开表达,即舆论的公开性;三是意见的表达是自觉自愿的,即舆论的自发性。梁启超的论述与现代舆论的属性是基本相符的。

(二)舆论可分为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

梁启超认为,舆论可分为消极舆论(不健全舆论)与积极舆论(健全舆论)两类。他指出封建专制下是消极舆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下应该是积极舆论。他认为消极舆论会把社会引上歧途,足以达到亡国的地步,“盖以瞽相瞽,无补于颠仆,以狂监狂,只益其号呶。俗论妄论之误人国,中外古今,数见不鲜矣”^①。“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②。对于这种误国的“妄论”,应该群起而攻之,对之进行鞭笞。他认为,舆论之足以为重于天下,“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在他看来,“夫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意见之结合,而有统一性、连续性者也。健全之舆论,无论何种政体,皆所不可缺”。积极舆论的发生,应该“尊重人人独立之意见,而导之使堂堂正正以公表于外”^③。不是多数人的意见,不能称为舆论,非统一、连续、公开的意见,不足以谓健全。虽然梁启超关于消极舆论与积极舆论的界定,因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流于简单、不科学,但他关于舆论的分类还是有现实的进步意义,而且为后来者研究舆论提供了思路。

(三)健全舆论的产生需要报馆的引导

梁启超认为,“凡能成舆论者,必其论之衷于正理而适于时者也。顾此虽有能成为舆论之资格,然所以成之者,恒存乎其人”^④。

①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1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③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见《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13页。

④ 王玉樑:《价值哲学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

他指出,要解决如何制造健全舆论的问题,必须从报纸本身着手。梁启超在多处明确提到,报馆是舆论机关,代表舆论发挥作用:“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①，“夫舆论之所自出,虽不一途,而报馆则其造之机关之最有力者也”。报馆要造成健全的舆论,则必须在出刊立论时做到“五本”“八德”。“五本”是“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八德”则是“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②“五本”“八德”说的核心是强调议论的发出者和传播者的社会责任,要求以国家利益为重,反映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在中国的舆论研究中,梁启超是第一个认识到舆论的正负效应问题,并对此加以全面论述的人。舆论是一柄双刃剑,黑格尔说:“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发现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③近代中国更是充斥着混乱、疾病、贫穷、战争……,能够有着清醒头脑的人并不多。梁启超认识到舆论的不同性质,是他对当时时势认识的结果,也是其舆论观具有相当理性的表现。

(四)舆论与政治关系的交错性

梁启超认为舆论与公益之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舆论是公众对于公共事物的看法,但由于特定条件下民众的认识能力有限,“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健全舆论当然可以代表公益,而非健全舆论一般来说都不能代表公益。公益有的时候只能由少数人的不能称之为舆论的意见代表。梁启超指明了这少数人是高于一般民众的“英雄”群体。“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英雄豪杰有高于一般民众所具有的或所代表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69页。

② 《国风报叙例》,《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13页。

③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3页。

的思想,因此,这些豪杰与舆论的关系,是“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①。这就很鲜明地指出了政治领袖和舆论的关系,要经历“敌、母、仆”三部曲,这三者看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其实是一个紧密的系统。梁启超所论述的是政治家所代表的积极舆论,它一经产生便与消极舆论产生矛盾,接着就是要培育自己的舆论群体,最后就是要遵从舆论并将受舆论的左右,而不可独断专行。

(五) 舆论具有反映和监督的功能

早期改良派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报刊具有“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的反映功能,梁启超把它们抽象为“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主要是针对报刊反映和提供信息的功能而言的。报刊可以集中和发散信息,让大众知晓事态的发展和变化,报刊提供信息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从而形成舆论,反映舆论。舆论具有监督功能,从本质上来说,舆论监督即名誉监督。与法律和宗教相比,“名誉监督者,不能如前两者之使人服从、使人信仰、使人畏惮,然隐然示人曰:‘尔必当如此,尔必不可如彼。苟不尔者,则尔将不见容于社会,而于尔之乐利有所损’”^②。舆论的监督力量是巨大的,梁启超说:“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舆论一成,则虽有雷霆万钧之威,亦敛莫敢发。”它是一种社会制裁力,这种制裁力“能使人不敢为真小人,……则其功用已不可谓不伟”。^③ 所以,如果反抗舆论,必不能成事。梁启超认为,舆论在当时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吾国前途之最大希望,实唯舆论势力,而可持之

^① 梁启超:《舆论之主与舆论之仆》,见《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页。

^②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页。

以为中国不亡之券。”^①

三、以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为核心的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对舆论之重视延续到报刊功能观中,他提出了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第一个在国内提出了报刊“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说。梁启超还认识到,报刊除了是一种政治宣传工具外,还是一种社会传媒,具有多种功能。

(一)“去塞求通”“耳目喉舌”的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对报刊之“通”的功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梁启超认为,“上下不通”“内外不通”是中国贫弱之病根所在,中国要想不再受侮,必须“求通”：“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反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求通”必须除弊,必须把“求通”与除弊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同时进行,不能偏颇;报刊可以说是“去塞求通”的特殊工具,“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因为报刊有如耳目一般,能告知人们中外之事,使人们能及时地采取正确的对策。报刊也是“喉舌”,能使上面的措施喻之于民,使下面的苦患告之于君。若无报刊,则比邻之事而吾不知,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下之情不通,“则有喉舌而无喉舌”,无耳目、无喉舌,是为废疾,废疾之人,焉能强身自立。梁启超认为报馆有益于国事:“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②

^① 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海感言》,见《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9页。

^{②②}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如何才能“去塞求通”，成为国家的“耳目喉舌”，梁启超从维新运动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四项任务：一是“广译五洲近事”，二是“详录各省新政”，三是“博搜交涉要案”，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梁启超认为，只要通过办报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思想与科学技术，推而广之，坚持下去，中国就可以“风气渐开，百废渐新，国体渐立，人才渐出”^②。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主要是针对信息的流通而言的。两年后，他在《清议报叙例》中，明确提出报馆要成为“国民之耳目”“维新之喉舌”。虽然他还是用“耳目喉舌”的概念，其含义已有所改变，更加突出了喉舌的作用，先前那种模糊的“耳目喉舌”的主体概念具体化了，报刊的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二）“向导国民”“监督政府”的功能

1902年，《新民丛报》第10期刊载了《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梁启超在该文中明确提出“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向导国民”“监督政府”是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报刊功能的总结，体现出他对报刊功能认识的提升。

报刊向导国民的功能是梁启超引以为重的。梁启超一向重视国民教育，将国民精神即“国风”看作国家兴衰的关键：“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他自述其志说：“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①

“新民”理念贯穿他整个办报生涯。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100期祝辞中写道：“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能使人专读报纸数种，而可以尽知古今天下之政治学问

^①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见《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8页。

风俗事迹,吸纳全世界之新空气于其脑中”。梁启超认为:“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他强调报馆和史家一样,也可以而且应该用相当于“春秋笔法”的方式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①。

梁启超后期的办报生涯,更是以锻造国民精神、养育国民心智为主要目的。《国风报》即“以输进常识为一最重要之宗旨”^②,《大中华》将“既未尝从社会方面培养,适于今世政务之人才”作为政治“终无根本改良之望”的缘故,表示“本报同人不敢,窃愿尽其力所能逮,日有所贡献,以赞助我国民从事个人事业、社会事业于万一”,“此则本报发行之职志也”。^③ 1920年,他发表《解放与改造发刊词》,鼓吹“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并反对“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宝贵之一部分遗产”,而宣称办刊目的就是“欲借本刊为公开研究之一机关”,希望国人能够加入讨论,信奉《解放与改造》所传播的文化观。^④ 就在梁启超退居清华大学、埋首学术之后,他仍钟情于报纸“向导国民”之义,在为戈公振译著《新闻学撮要》所作序言中,他赞誉道:“夫新闻事业,……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无匹。”^⑤表现了梁启超对这一价值实践的充分看重。

由于梁启超政治观念的变化和思想认识的深化,他对“向导国民”的内涵认识也有一些差异:维新时期是将新的智识带给国人,让国人明白维新的必要性;改良时期注重用西方的文明来改造国人的“脑质”,造就国人“国民”的人格;立宪时期直至1918年欧游前,注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页。

②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8页。

③ 梁启超:《大中华》,见《宣言书》,1915-01-20。

④ 梁启超:《解放与改造》发刊词,1920-09-15。

⑤ 梁启超:戈公振《新闻学撮要》序言,上海记者联欢会出版,1925年。

重造就国民近代的政治意识,以使国民具有“民主”之资格;欧游归来,则复归东方文明,希望通过“文化运动”,综合西方科学的精神和东方文明的精髓,来改造国民性,使国家真正能独立、能富强。

报刊监督政府的功能同样为梁启超所倚重。梁启超认为,政府权力只有受到监督,才可能保障人民的权利不被侵犯。监督的方式不一,法律、宗教监督都是有力的方式,但梁启超认为,舆论虽然无形却是最根本的方式,所以报刊要担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

报刊为什么能够监督政府?梁启超认为,报馆与政府应是平等的地位,“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①。报馆为什么能够代表国民发表公意?这是因为“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③。东渡之初,梁启超接受西方思想,将报馆称作“第四种族”,认为其有“裁判官”“救世主”等职能,是“传播文明的三利器(学校、报纸、演说)”之一。因此,梁启超指出:“报馆者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冑也。”^④

报刊应该怎样监督政府?梁启超认为:“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②梁启超认为用这种善意的规劝方式,就不用担心政府不接受监督。而造成国家对报馆之信赖,实现报馆对国家的监督,也是报人对国家尽一份责任的前提。梁启超还强调,报馆监督政府“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当纠政府之大局,当“监督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应拘泥于细枝末节。^②这一方针贯彻到了他办报的具体实践中,如1903年《新民丛报》改版时就特设‘批评’一栏。我们看到,梁启超

①③④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969、969页。

②②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页。

确实是把这份天职时刻放在心上的。

报馆监督政府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梁启超指出，报馆是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产物，没有这三大自由，也就不可能有报馆。他进一步解释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③由此可见，梁启超新闻舆论监督思想的理论根据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认为，自由是一项人生而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行使这项权利时，人们并不需要担负任何责任和义务。梁启超却认为，绝对新闻自由理论自身存在着缺陷，“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④。梁启超主张，自由和义务密切相连，报刊的言论自由必须以其对社会承担的道德义务为前提，言论自由还要服从法律的规定，这种见解与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兴起的报刊社会责任理论相吻合。言论自由的提出是梁启超新闻理论的一大飞跃，其监督政府的功能成为以后报人努力实践的准则，也是国内新闻自由观念的初始。民国初年，政府颁布的政令明确规定言论自由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从此处发源的。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梁启超报刊监督政府的内涵也随时势发生着变化。1905年之前，梁启超持“保皇”的政治立场，希望敦促清廷维新改良，强调报刊的“教导”之责，所谓“严父督子”。1905年以后，由于清廷实施“预备立宪”，梁启超作为立宪派的领袖之一，认为报社与政府的关系应有一定的变化，对政府之责是“改造政府”，即推动建立“政治上之监督机关”，“必当使其权力之渊源在人民，而不在君主”。^⑤到1910年创办《国风》时，梁启超提出造“健全之舆论”，指出报馆对于政府，一是“忠告”，二是“向导”。1911年前

③ 王玉樑：《价值哲学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

④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1912年第1卷第1号。

⑤ 《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页。

后,由于立宪运动失败,梁启超对清廷彻底失望,“匡正政治,监督政府”的内涵也转向“督责”,希望能“推翻恶政府”。从1912年归国到1918年告别政治生涯赴欧考察,梁启超“匡正政治”“监督政府”主张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变化,他不再以“改造政府”为任。辛亥革命之后一段时间,他成立共和党,又组建进步党,希望能“独立不倚”地监督各派政治势力,并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己言”成为其中的中心内容。1915年前后,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并积极推动倒袁运动。这一时期梁启超认为的“匡正政治”,是维持现在之国体,以舆论阻扼“帝制复辟”,并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梁启超还认识到,报刊除了是一种政治宣传工具外,还是一种社会传媒,它与公众的联系非常密切,具有教育大众、提供娱乐、传播信息等功能。以上这些梁启超没有详细阐述过,只是略微提到。因为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中最主要的是注重报刊的政治宣传功能,这是他办报的目的之所在。娱乐功能和信息功能对于梁启超来说,都只是处于附属地位,其出发点也是为实现其政治功能服务的。

四、以报人独立和报馆对社会承担责任为核心的报刊自律观

梁启超以一个政治家和报人的双重身份对报人的行为准则和报馆的责任作了规范。梁启超结合自己办报的经历,站在一个使报刊对社会有益的角度,一个报刊对人民启迪的角度,用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和责任感阐发了报人报馆的行为准则。

(一)对报人素养的要求

梁启超认为,报人要认识到加强自身修养的必要性。他十分羡慕西方“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或“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而明日为主笔”的西方政治家办报的风气。但在中国,报人地位低下,报业发展迟缓。梁启超总结其原因时认为,有一

部分原因是报人素质低下,“……由于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见识迂愚,人才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①。正因为如此,报业在社会上地位低下,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加入这一行业。他认为,要提高报业和报人的地位,报人就必须具备以下素质:

首先,报人必须敬业坚忍。梁启超以举人之身从事报业,已是不易。而在从业过程中,他本有多次就仕的机会,但都一一辞却。自《时务报》开办,他即将心血之大半付诸报业,固然是欲“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但他“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②梁启超以天纵之奇才,从事维新前所谓的“末业”,这种对职业投入的情感,确实令人感佩。梁启超还将“勇毅坚韧”视为报人应有之义。他认为:“求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③报人须以勇毅之精神,唤起健全之舆论。梁启超还具体论述了勇毅坚忍实现的操作艺术,他认为要影响舆论,必须用“强聒”“主一”“浸润”等法,希望报人有恒心、有耐心、有主见。因此,梁启超所谓的“笃于所职”,既是对报人职业情感的呼唤,也是对报人素质的要求。

其次,报人必须勤奋工作。梁启超本人撰文就十分刻苦。他自述《时务报》初期工作情形时说:“每期报中论说的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文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文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十二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挥汗执笔,日不遐食,夜不逞息。”^④真正地一个人干了七八个人的工作。《新民丛报》初办,他独力担任全部编辑工作,而撰作则“每

①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

②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1912年第1卷第1号。

③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1页。

④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缘委纪》,《时务报》,1896年。

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1902年一年中,他发表于《新民丛报》的文章达45万余字。办《国风》期间,梁启超虽然生活困窘,仍然“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殊不以为苦。文大率以夜间作”,“今者《国风》每号之文,弟所作过半,实更无可以旁及”。^①

最后,报人必须努力学习。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屡屡谈到“学问上之自修自进”的重要性,认为欲自立,欲进步,欲自治,欲养成国民之精神,必须勤于学习,务于精进。^②梁启超本人就是一个勤学不辍的典范。尽管年轻时他即已学识渊博,名扬全国,但他终生没有停止对救国真理的探讨和对学问的追求。46岁在出国途中,梁启超还学习法语,他以能“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而自豪,认为“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③梁启超对报人“务于精进”之志是颇为看重的,他认为西方报馆之所以发达,与报人的“奋勉励励,日求进步”不无关系。因此,他希望报人“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报人能具相当之常识,然后有以“旁通”。“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④

(二)对报馆言论独立的要求

梁启超认为,报馆的言论独立是对社会尽责的前提。处身政党之中的梁启超,却一直推崇“独立”的精神,认为“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国而不能独立,时曰庸庸”。只有凭独立的精神,世界才能“长不灭而日进化”,而独立之人,“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510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二册,第十五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41页。

④④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第478~480页。

者也,故能与旧风气战而终胜之者”。^③早在《清议报》时期,由于西方报业和报学的影响,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已萌生。他接受了西方关于报人是“第四种族”之说,认为报纸对于政府应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能“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④。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更是鲜明地举起了言论独立的大旗,力主报刊成为社会的公言。他在《庸言》“特别启事”中说,希望报馆能“极力保持言论独立精神,与一切个人关系及党派无涉”^④。梁启超后期的新闻活动与《时事新报》有密切的联系。他盛赞《时事新报》能够忍受如寡妇守节般的苦楚,在各党各派和军阀政客争斗的漩涡内,不惮嫌疑,虽然两头不讨好,但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梁启超认识到:“报馆待广告费以维持其生命,此为天下通议。”^⑤他看到西方报刊业的情形后,认可了这种做法,并希望在中国同样实现这唯一可以确保言论独立自由的做法。但他很快也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限,用广告来支撑整个报馆之经营是不现实的:“在产业幼稚之中国,欲恃广告所入以供一种完善报纸之设备,在势既已不可能,而后起之报为尤甚。”即使如此,他仍坚持“吾济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已滋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济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之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个吾济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梁启超明知这一点但仍坚持而为,这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即使在《新民丛报》停刊前面临经济的巨大困难时,他仍持“办

^③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独立论》,《清议报》第33册,1899-12-23。

^④ 梁启超:《本报特别启事》,1914年《庸言》25、26期合刊号,见《中国新闻传播学说的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⑤ 梁启超:《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8页。本段以下没注引处的引文均引自该文。

报固为开通社会起见,亦必须求经济可以独立维持”^①的信条而停办《新民丛报》。《时事新报》经费十分困难,“十年间,盖无一日不感受此种痛苦。力竭声嘶,不能支而思舍去者,不知几何次矣。”^②梁启超也要坚持到底。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一团火,要靠自己的努力来筹划和安排,言论之出于独立是其内心不可动摇的信念,他把它作为报纸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和言论可信性的最本质要求。

坚持报刊言论独立的要求还在于它是引导健全舆论的前提,梁启超认识到,健全舆论是要完全依赖于言论自由和独立的,失去了独立的品格,报刊言论就失去了起码的立论之本,当然谈不上可信与不可信,更毋论引导和造成健全舆论了。因此,言论独立性是作为报刊和报馆存在的首要条件而存在的。

五、以“完美报业”理想为核心的报刊编辑观

梁启超的报刊编辑观主要涉及编辑理论方针、报刊业务改进两个方面。梁启超认为,要办好一份报刊,编辑工作必须有一个确定、高远的指导思想和报馆编辑立言的基本规范,只有贯彻执行好这个思想,才能保证所办的刊物不偏离方向。除此之外,编辑工作还应有一个明确的业务指导思想。他的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等文中。

(一)编辑理论思想

一是提出著名的“完美报章”四大准则,即“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速而确”。^③这四大准则是其报刊编辑思想的核心内容。

“宗旨定而高”,即办报宗旨必须明确而高远。梁启超认为:“凡行一事,著一书,皆不可无宗旨,惟报亦然”^④,“为报馆者,不可不以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

② 梁启超:《本报五千号纪念辞》,《时事新报》,1921-12-10。

③④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热诚慧眼,注定一最高之宗旨而守之”^④。报刊的宗旨不应该定位为牟利、媚权和媚俗,而是“若为报者能以国民大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斯可谓真善良之宗旨焉矣”^④。这种报馆应该为多数国人服务的思想,在他创办或主编的许多报刊中皆有所体现。这条原则既是对当时报界不正之风的否定和批判,也是对自己所办报刊的要求和激励。他说,报业如预言者,可“讴国民之命运”;报业如裁判官,可“断国民之疑惑”;报业如立法家,可“制定律令”;报业如大哲学家,可“教育国民”;报业如大圣贤,可“弹劾国民之罪恶”;报业如救世主,可“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予以救济之途”。他还批评当时报界不正之风的内容“陈陈相接”,体例“无一足取”,这是因为当时全国上下皆无政治思想、无世界眼光所致。由此可见,梁启超鼓励报纸为国民灌输新思想,追求国民大多数的利益,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这无疑是对封建专制思想提出的挑战,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具有进步意义。

“思想新而正”,即报刊所宣传的思想要新颖、正确。他说办报“思想不可以不新”,“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要达到这一点,只能用带给读者全新的事物和认识的方式来完成。他又说:“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他主张向国民灌输新思想,以新思想来引导国民。除了“新”的要求之外,梁启超还注重报刊宣传的新思想是否对国家、对人民“有利而无病”,认为要“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而知以何种思想为最有利而无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⑤。中国旧俗不可以全舍,西方学识也不可以不察,只有适合中国国情的事物才能够得上“正”,才是编辑报刊应首选的

^④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13页。

^⑤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477页。

内容。当时,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士大夫和知识界在对待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上,或顽固保守,拒不接受,或不加筛选,全盘吸收。因此,梁启超强调应站在客观的角度,理智地、与时俱进地选择有利而无害的、适合中国社会的思想进行宣传介绍,这个思想对于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材料富而当”,即报刊发表的文章必须全面丰富并经过严格选择。他强调:“凡真善良之报,能使人读其报,而全世界之智识,无一不具备焉。”^①所以,报刊上应该刊载各种各样的知识、材料。这一点已涉及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功能问题。当今时代,厚报风行,少则4版,多则200余版。梁启超百年前的预判竟成事实,可谓远见。

“报事速而确”,即新闻报道必须准确无误,迅速及时。这在理论上揭示了报刊的真实性与时效性的原则。梁启超通过实践考察,指出报业虚假、陈旧的弊端。他明确指出:“报之所以惠人不一端,知今为最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②新闻准确无误,是报纸取信于读者的前提;报道迅速及时,是报纸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而梁启超在当时就提出了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原则,可谓极具远见,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最后他总结道,能符合上面四个准则的就是好报章,否则就是糟糕之报章,所谓“若是者良,反是则劣”。

二是制定“五本八德”的编辑道德规范。报馆造成健全舆论是其首要的任务,梁启超说,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八德”“欲使舆论之性质具此五者,亦曰造舆论之人先以此五者自勉”。^③“五本

^①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②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③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见《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13页。

八德”，既是对报刊健全舆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活动的要求。

“五本”是：“一曰常识”。报人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即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重大现象以及原理、原则的知识；本国及世界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时事热点等。这些都是普通常识，需要掌握。“二曰真诚”。报人应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一定不能从个人利益出发，而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凭其良知发表观点，这样才有助于健全舆论的形成；“三曰直道”。报人必须具有不畏强权、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四曰公心”。报人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是非善恶或怀有党派偏见，而是要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超越党派之外，要以公众利益为评判标准来发表议论。“五曰节制”。报人一定要控制舆论的范围和强度，要有所节制，防止因炒作而造成狂热至极，以免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八德”是：“一曰忠告”，即报馆不能对政府“不轨于正道，不适于势者”视而不见，应苦口婆心地规劝之。报馆进行舆论宣传，一定要做到一视同仁，宣传对象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二曰浸润”，即报馆的宣传要注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浸润与煽动相反”，浸润收效缓但更持久，“如积壤泰华，阅世愈坚”。“三曰向导”，即教养国民应该“循序渐进，使积跬步以致千里”。“四曰强聒”，即不能期望对于民众之惰性用一二言就能去除，而是要不厌其烦地“反复以谏”，以达到规劝成功的目的。“五曰见大”，即报馆需对国家之“大者、远者”之事举纲张目，不就一些琐碎之小事纠缠不已；“六曰主一”。即“凡所论述，百变而不离其宗，然后入人者深，而相孚者笃也”。宣传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宣传的宗旨一定要一以贯之，这样才能令人信服。“七曰旁通”，即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广泛收集资料，给普通民众以丰富的精神食粮，帮助民众形成正确的判断。“八曰下逮”，即报刊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梁启超十分推崇“五本”与“八德”的作用：“吾窃尝怀此理想，谓国中苟有多数报馆，能谨彼‘五本’而修此‘八德’者，则必能造成一

国健全之舆论,使上而政府大臣及一切官吏,下而有参政权之国民,皆得所相助,得所指导。”梁启超殚思竭虑,探寻实现健全舆论的种种途径,他最终将关注的重心投向了新闻从业人员自身。

三是强调论说要“公要周适”,纪事要“博速确直正”。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了办报的论说四条、纪事五条的要求。

论说四条是:“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偏见;“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论说之,而不能尽找一些小事来误导读者;“周”,就是要分清主次,对大问题或论说予以批评,以达到着重强调之作用;“适”,就是所论说的理论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勸,必度可行者乃言之”^①。

纪事五条是:“博”,就是要广博,全世界各地都要在其视野之中,“务使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知天下”;“速”,就是要时效。“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之快”;“确”,就是要准确,“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若有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直”,就是要直书,不能隐讳;“正”,就是要正直,“凡攻计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②。这实际上揭示了新闻报道的广泛性、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等多种性质。此观点与现代新闻学的学者们的认识相比,并不逊色多少。

(二) 编辑业务思想

梁启超提出,办报要注意版面条理清楚,大胆改革报刊版式编排,尽可能地运用最新、最合理的编排方式,不能拘泥于陈旧的做法。

要注意版面条理清楚。梁启超批评当时的外报说:“非剿说陈

^{①②} 梁启超:《时报》发刊词,《时报》,1904-06-12。

言,则翻译外论,其纪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①他在办《中外纪闻》时,按要求写编者按,用“曰”等字作提示。通常附在所载译文的后边,少则几十字,多则几千字,发表自己的看法。办《时务报》时,他也力图使版面“面目清楚,条理井然”^②。

要积极运用新式页码和标点编排。梁启超在办《新民丛报》时,充分吸取了西洋书编页的长处,改进编页方式,采用每页两个号码的编码方式,即每篇文章单独编页和整本期刊总编页两种方法相结合,突破了之前因没有总编页而造成的检索困难。办《时报》时,他已用点号分段,字体用小楷字,并用不同的字号和圈号来区分内容的重要程度,并且提高其标题的醒目程度,使《时报》栏目多种多样,标题意思切合内容,时评、时事新闻画与新闻栏目相映衬,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时报》印成对开报纸,两面印刷,一纸分为四大页,即成为今日通行的形式,从此报纸和杂志完全分开。

要勇于创新报刊编辑体例和合理设置栏目。梁启超在编辑《中外纪闻》时就开创了“一事一议”的短评栏。后来办《时务报》时每月有四五千字的言论,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他把这种论说文尽量发挥,且这一做法一直被他和他的同人延续下来。除大的社论外,梁启超还创造了各种短评和杂文,《新民丛报》的“国闻短评”是第一个时评栏目。其他报刊纷纷仿效,以致当时报刊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短评。梁启超主张栏目设置应丰富多样,如在《清议报》时,除保留传统的“本馆论说”“外国近事”“本国近事”等栏目外,还增添了“汗漫录”“猛醒录”等发表专论和短评的新栏目。《新民丛报》更是在第一年设立了25个栏目。另外,还设立专门栏目专刊诗词小说之类的作品,附在报末,这是现代报纸副刊的雏形。

梁启超还把处处为读者着想作为报刊编辑的方针之一,以尽可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② 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能地满足客观现实和读者的需要。他在《编辑〈清议报〉全编缘起及凡例》中说,“初时同人怂恿将原文依样排印”^①,但想到原文有的连载数十册,文气隔断,读者不方便,还有一些纪事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因此,他决定将《清议报》上的文章再经过一次重新编辑,长文刊成一整篇,不再有价值的删去,使“断者连之,缺者补之,无用者删之,大率删去者十”^②,并免费送给长期订户。

六、以浅显畅达的表现形式为核心的报刊文体观

近代新闻报刊是由外报发端的,这一点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新闻工作者都承认的。新闻文体随着近代报刊的改革而不断有所进步,外报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一开始,外报的文体也十分笼统,论说是大量的语录体,引用《论语》中的语句,语言与旧式文言不分,撰写新闻与文学作品、历史小说不分,有的特意效仿中国古体小说的写法,迎合国人谈玄说鬼的喜好;报纸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奇形怪状的文章,令人不忍卒读。近代早期报人王韬等在报刊上开始尝试写短小的言论,出现了中国人自己报刊上的政论文。到《万国公报》《申报》出版时,他们主张要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代替难懂的文言,从而加速了报章文体的形成进程。

梁启超初涉报坛时就广泛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纲领,用得最多的便是政论,因此,他对于报刊文体改革的必要性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且认识到其重要性与急迫性。与当时严复等人不同,梁启超认为,报刊文章是给尽可能广的人看的,不能求典雅而让广大民众望而却步,而应该尽可能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用语丰富而笔调自由,笔端多带感情,以情动人。梁启超坚持自己的新文体,他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

^{①②} 《编辑〈清议报〉全编缘起及凡例》,《清议报全编》(第一册),日本横滨新报社1902年版。

竟效之,号新文体。老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朱虚白在《梁启超的报业生涯》中说:“报刊新文体倡始人梁启超,清末言论界巨擘。……其学术勋业举世所推崇,尤以提倡浅显的报刊文体,畅达而富于感情,更为一大革新。”^①他用这种文体写作,将许多政论文章发表在《时务报》和后来的《新民丛报》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文体被人们称为“时务文体”或“新民体”。

梁启超对新文体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其一,读者的文化水平不高,需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唤醒民众。“犹恐文义太贻,不能尽人而解。”^②“我支那之民不识字者,十人而六,其仅识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③他在为《湘学报》所作序中,极力称赞他们所办的报刊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小学教愚民”,他甚至主张用这种白话文章作为幼学教科书,列入课表,请教师每日为学生说解。其二,这是政论的需要。政论需要把道理讲清楚透彻,用这种文体是实际工作的要求。

概括起来,梁启超的新文体是其“文界革命”的成果。他在1902年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他认为,中国在20世纪初正是处于各方均需要实行变革的关键时期,而要完成变革,文体变革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在《夏威夷游记》中说,读到有关日本政治家德富苏峰的著作时,认为“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

^① 朱虚白:《梁启超的报业生涯》,《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十二,《新闻学论集》,第505页。

^②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③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点于是也”^①。但与其提出的“诗界革命”相比,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要“新意境,新语句”;不同之处在于诗界革命还需套用“风格”,而“文界革命”则尽可能地用白话语言。

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的新文体的核心仍是为了表达内容的需要,即立足于“革其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梁启超整个新闻思想政治化诉求特征的表现方式。

梁启超的这种文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也得益于这种简便通俗易懂的文体,使其鼓吹的政见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郑振铎先生说:“当时大家知道倍(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诸人,不是由于严复几个翻译原著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译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这原因有一半是由于梁氏文章的明白易晓,叙述又简易无难解之处,也有一小半因为梁氏的著作流传的范围极广。”^②现代著名新闻学者李良荣先生也总结说:“梁启超的时务文章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风靡一时,创一代文风,影响一代青年,从邹韬奋到张季鸾,从邹韬奋到郭沫若、陈独秀、毛泽东,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无一不有一段崇拜梁启超的时期。”^③

第四节 梁启超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的历史影响

梁启超报刊活动是同他的政治思想密不可分的,他的报刊思想理所当然地与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相连,成为他政治思想的另一种表白。他的报刊活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有效途径和有力工具,在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加速清王朝垮台及思想启

^①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9页。

^②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转见《追忆梁启超》,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③ 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蒙解放等方面,皆起过巨大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梁启超通过报刊宣传促使清末的维新变法与立宪运动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进程。近代中国社会仍然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封闭,风气不开,民众思想保守落后。而梁启超仿效西方,以报刊为利器来广开言路,为变革造舆论,促使了公共舆论的形成,使变法革新成为社会共识。他主编的《时务报》以鼓吹变法图存为主旨,在《变法通议》一文中,发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呐喊。其后,还发表了如《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一批宣传变法的政论文,使《时务报》“风行海内,自是谈变法自强者,成为风气”^①,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日益高涨。他在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期间,虽曾一度力倡破坏性革命,但在1903年后,最终放弃了排满共和论而重尚君主立宪主张。他在《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中国专制政体进化论》等文中,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大力鼓吹自由、民主及民权,提倡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所著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即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②,从而促成了20世纪初中国立宪思潮的形成与出现。

其次,梁启超主办的报刊对清廷黑暗腐朽统治的抨击,对民族危机的剖析,及对封建当权者立宪骗局的揭露,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客观上为革命派推倒清廷专制制造了舆论,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梁启超自从创办《时务报》起,就著文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黑暗。到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等报刊时,他公开抨击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撰文剖析列强侵华所造成

① 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9年版,第150页。

的民族危机,发出了救亡的呼喊。这对于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风潮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启导作用。当时的革命派人士都承认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萌发时期的代言人。后来,学者李剑农在《中国近代百年政治史》中说,梁启超在1903年以前的言论具有“唤起青年趋于打破现状的效力”,而1903年以后的言论也间接助成了革命。张荫麟则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之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说:“革命学说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风靡全国者,实因维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缚,故解第二重束缚自易也。”^①况且,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对清室的不遗余力的抨击,又“无意见助成革命之一端”,也就是说,对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具有促成之功。所以,梁启超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成功时也得意地说:“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然则谓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②

最后,为了寻求救国之路,梁启超不仅自己长期努力学习和接纳西学理论,而且还尽力广泛传播它。他将传播西学、批判旧学与开民智、救亡图存结合起来,具有浓重的政治热情和厚重的使命感,从而在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思想界掀起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影响了当时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影响广阔而深远。早在主编《中外纪闻》时,梁启超就开始关注西方的新学说,常就外国政事发些议论。在任《时务报》总主笔期间,他将输入西学新思想定为报纸的任务之一。在日本主办《清议报》时,他又对西学作了较全面的初步介绍与宣传,其中专门介绍西学方面的“新书译编”“外论汇译”“中外纪事”等约占该报的近半篇幅。在《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对西学的介绍和传播更为全面而系统化,从欧洲资产阶级的古典著作到现代资产阶级的专门著作,乃至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

① 康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学衡》第67期。

②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1912年第1卷第1号。

都被他一一地介绍进来,涉及领域之广、介绍西人之众及其影响之大,皆居当时报人之首。多年后,胡适曾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①梁漱溟也感受深切地说:“《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又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②邹韬奋在回忆中学一位老师借给他《新民丛报》时感触地说:“我就一时看入了迷,这也是鼓励我要作新闻记者的一个要素。”^③

毛泽东同志也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他说:“当时(1909年),我正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④从中可以看出《新民丛报》在思想启蒙领域客观上起了多大的作用,它启迪和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这是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在近代报刊史上的主要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总的来说,就是忽视对新闻学本身和新

① 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④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美国)花园城出版公司1939年版。

闻规律的探索,具体表现在对报纸舆论价值的夸大、新闻自由思想凸显实用主义和空想主义色彩、对读者的定位分析与心态上存在偏差、报刊活动与报刊思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等。这些缺陷我们可以用政党报刊的缺陷加以说明,如忽视对新闻的采写等。新闻本来应该是报纸的主体,西方新闻业跨越政党报刊的发展阶段以后,回到了正常的以新闻采写为主的事业模式,这是新闻学科发展的较高阶段,它强调对新闻本体的新闻价值的追求,而事实上这是新闻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梁启超活动的年代,西方的新闻主体也已经发展到了大众商业报刊的阶段。但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尚处于中国的政党报刊时期,其政治功利性掩盖了对新闻本体的关注,自然对中国的新闻学科的建设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 响。

此外,对于一般读者,除了要对其进行引导和说服外,梁启超几乎没有把他们作为读者的需要考虑在内。梁启超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都具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他认为读者都是需要被他们唤醒和启蒙的群体。因此,对于传播效果没有予以太多的考虑。这主要是因时代的局限和梁启超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局限所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出现诸多曲折的一个原因。诸如此类,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在中国百年新闻事业史上,梁启超的报刊思想一直都是一种主流思潮,他开辟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这一思路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一根红线。梁启超不光是 19 世纪末资产阶级第一次办报高潮的核心人物,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第二次办报高潮,实际上也是梁启超报刊思想的继续和延伸。他所提出的多方面的报刊思想,构成了五四运动前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主干。政治家办报的原则延至今日,凝聚了新闻事业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是激励新闻工作者的强大动力。因此,梁启超不仅应占据五四运动前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理论代表的位置——报刊作为为政治服务的手段,作为为政党服务的工具,是整个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根基和本源,而且还

可以被称为这一代报人的精神领袖,他的思想引导着同时代人和后人继续这项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救亡与兴盛贡献力量。

第三章 发展：上下求索的呐喊

第一节 “文人论政”传统发展的主要原因及体现

一、民国初年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

被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推崇为“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的言论出版自由,从19世纪中叶起,就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理想和追求。

(一)自由新闻体制发展的回顾

早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王韬等人就发出过要求解除言禁、允许私人办报的呼吁,清廷未予理睬。“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又提出了“纵民开设”报馆的要求,也未得到皇帝的首肯。直到“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才以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谕形式,正式承认官报、民报的合法地位。

1898年7月26日,光绪皇帝就孙家鼐奏准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发布的上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宣告开放“报禁”的法令,标志着文化专制主义的“言禁”“报禁”藩篱被首次突破。期间,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请定中国报律折》中,首次提出了报律的制定问题;同日,光绪帝就发布了有关制定报律的上谕。惜政变发生,制定报律的设想未及付诸实践就夭折了,维新运动期间松开的“言禁”“报禁”罗网又被重新收紧。

1901年,清廷被迫实行“新政”,允许民间办报,这在事实上承认了近代报刊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朝廷还正式允许朝政信息的公

开传布,部分开放了“言禁”。1902年,清廷特谕内阁修订法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新报业因“报禁”“言禁”的逐步开放而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全国一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报刊。但旧的文化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并未废止,危害统治的报刊将受严惩,1903年著名的“苏报案”就是一例。

至1906年,清廷下令“预备仿行宪政”,宣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①。此后,随着清廷修律活动的加速,新闻出版立法工作也正式启动。清末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除《钦定宪法大纲》的相关条款外,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印刷物律、著作权律”,主要有《资政院奏准著作权律折》《著作权章程》《大清印刷物专律》等。第二类是“出版法”,主要有《学部第一次审定教科书凡例》《学部奏简易识字课本编竣折》等。第三类是“新闻法”,主要有《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钦定报律》等。其中1908年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在其所附的“臣民权利义务”一节中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②1910年颁行的《钦定报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新闻法律,它的颁行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初步法制化。

1906年至1911年,清廷先后制定了一大批法律与法令。这些法律与法令的创制与颁行,特别是《大清报律》等一批专门适用于新闻事业的法律、法令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法律制度在清末初步完成。这些法律制度虽然吸收了不少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成分,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是,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社会条件以及新闻事业需求的反映。晚清政府的专制本质,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给予国民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

^①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2~113页。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即使争取到的这点微乎其微的自由,也会受到皇权的制约和限制。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文化专制传统的国家,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第一次在宪法性文件和各种专门性律令中给予明确的规定,其意义还是非常巨大的,是中国自由新闻体制发展历程的开端。

(二)自由新闻体制在民国初年的实现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自19世纪中叶起,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理想的言论出版自由,终于成为现实。

首先,独立各省新建立的政权机关,都在所颁布的纲领性法令中,列入了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文。武昌起义胜利后,军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鄂州约法》就明确规定:“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①随后独立的省份,也仿照湖北颁布了类似的法规,如《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西临时约法》等,都无一例外地载有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通过立法手段,建立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1912年3月11日,临时政府制颁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其第2章第6条第4款庄严地宣告:“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②与此同时,临时政府还废除了清廷的一切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旧法律法规,颁发了促进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法令。这些法令,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为公众维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

其次,独立各省的新政权和领导人,尤其是革命党人掌握政权的地区,在实际行动方面,也大体实践和维护了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对报刊出版持鼓励态度。如老同盟会员、沪军都督陈其美就很尊重当地的报刊工作,优礼报馆和报人,多次欢迎报刊对军政府的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第2页,1912-03-11。

“箴规”，“庶足以保言论自由，俾为政者得闻其失”。他认为“当此民族意识时代，报馆愈多愈好”。都督府还经常邀请各报开座谈会，“共同讨论、商榷政策之进行”^①。江西都督李烈钧，也很尊重报界，聘请当地革命报刊的主笔担任顾问，支持设立“报界俱乐部”，定期与报界接触沟通。即使在一些由立宪派和旧官僚掌权的地区，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尊重新闻界，如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所颁行的《独立协定》中规定：“巡警不得干涉报馆。”^②四川都督府政务处每次开会时，还在旁听席上用红布围成一个女记者室，以便于女记者旁听采访。省外往来电报可以发表的，也都油印得清清楚楚，分送报馆。

孙中山先生对于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给予了高度的尊重和关注。他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恪守言论出版自由原则，认真接受报刊和舆论的监督。他还经常参加报界的会议，热情鼓励报刊在共和国的建设中发挥舆论监督与指导作用。卸任后，他还一再鼓励报刊担负起舆论监督的责任，他指出：“今民国成立，尤赖报界有言责诸君，示政府以建国之方针，促国民一致之进行，而建设始可收美满之效果。故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鼓吹更不可少。是以今日有言责诸君所荷之责任更重。”^③

此后的北京政府时期，在原有报刊法制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新闻电报章程》《电信条例》《著作权法》等新闻出版法律，进一步规范了报刊以外的其他舆论载体。虽然历届北洋政府为了追求专制独裁，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对言论出版自由予以变相限制，但是由于舆论监督和言论出版自由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潮流，所以北京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未敢否认言论出版自由原则。近代新闻法律体系的建立，已成为自由新闻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① 《民立报》，1912-12-11。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5页。

(三)“暂行报律”风波

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鉴于清亡后报界无章可循的现状,颁布了一个简略法令《暂行报律》,同新闻界约法三章: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到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令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号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公诉,讯明得酌量科罚。^①

此令一出,全国哗然。中国报界俱进会和上海的许多著名报刊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各地,反对《暂行报律》的颁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名通电上,于右任主持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也名列其间。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就在当天,上海各报均对此文破例转载。章太炎的文章对《暂行报律》三条逐一加以批驳,而且言辞甚为激烈。孙中山得知此事后,于1912年3月9日发布大总统令:“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绎三章条文,或为出版法所必载,或为国宪所应稽,无所特立报律,反形裂缺。民国此后应否设置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民议会议决,勿遽亟亟可也。”^②取消了《暂行报律》后,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民国初年发生的报律风波,折射出丰富的历史信息。从表面上看,报界关注更多的是法治方面的问题,而深入观察,则可以明确报界关注法治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其真正的意图在于向临时政府

^① 《临时政府公报》,第30号,第1页,1912-03-06。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第1页,1912-03-09。

争取言论自由。从更深的层次上讲,暂行报律风波是“言论自由”与“舆论控制”之间的一场不对称较量,并且最终言论自由在这场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普遍以为,只要有了言论自由,国家很多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中国也就可以成为独立强盛的国家。这就使得他们对言论自由抱有特别大的幻想。马君武在革命之后就发了专文倡导言论自由,章太炎也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①临时政府的《对外宣言书》,也慨然宣称:“天赋自由,萦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忱,久而莫达”,“今日之日,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页,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盛会也。”^②革命党人对自由的向往和钟爱在宣言中溢于言表。

应该说,言论自由是革命追求的目标之一,具有崇高的价值。但是,在革命还没有完全成功的情况下,为保证革命的彻底进行,需要有集中统一的意志,因此必须对舆论进行必要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派中的居正等人“见上海报刊语杂言庞,思有以轨物”^③,于是颁行《暂行报律》。这说明他们是针对舆论“绝对自由”“语杂言庞”的。但是,在许多革命党人中,包括孙中山、马君武、章太炎和于右任等,对“言论自由”抱有严重幻想的情况下,这种试图对舆论有所控制做法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暂行报律”风波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后来北洋军阀政府之所以在运用法律手段钳制言论出版自由时不得不有所顾忌,实源于此。但在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和立宪党人极力破坏革命,并在新闻出版界还拥有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的时候,革命政权放弃了对新闻事业必要的管理与约束,结果只能是给敌对的政治力量利用报刊破

① 姜义华、朱维铮:《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页。

③ 罗福慧:《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4页。

坏革命提供方便。革命追求的目标之一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这对革命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迷思。

总之,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顷刻之间,新涌现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迎风怒长。有人把武昌起义后的半年称为“中国报界的黄金时代”。据戈公振先生《中国报学史》记载,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由 100 多家陡增至 500 多家,总销数达 4200 万份,均超过了过去的历史最高纪录。^①

报刊的急剧增多,反映了人们对新闻的渴求,这是社会大变动时期独特的现象。一条新闻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足见社会动荡之际就是新闻传播活跃之时。同时,报刊的大量涌现和人们对新闻的迫切需求,更加深刻地改变了记者的社会地位。民国初年记者徐彬彬后来回忆道:“辛亥革命,大振民权,有冠皇帝大限告终,无冠皇帝纷然并起,报社如林,报章如雨,高谈雄辩,扬厉铺张,当道虚席,社会侧目,炙手熏天,此为一盛。”^②报馆和报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报界言论飞扬锋利,报界团体活动频繁。其中,中国报界俱进会在 1912 年 6 月的上海特别大会上,还讨论了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不承认有报律,自办造纸厂、新闻学校、通讯社、广告社,设立记者俱乐部等问题。和清末比较起来,民国初年的整个新闻界确实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困境中的执著与发展:著名报人及其报刊活动

(一)困境:袁世凯及继任者对新闻界的严酷统制

1912 年 3 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袁上台之初,由于民主共和的思想和言论出版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新闻界十分活跃。刚平息的“暂行报律”之争,反映了当时新闻界的强烈意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1 页。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88 页。

愿,还显示了新闻界的强大力量。因此,袁不得不故作尊重新闻自由的姿态,推出一些保护新闻自由的举措。在其统治地位稍稍巩固之后,他便以总统、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钳制新闻事业;以防止揭露外交军事机密为借口,宣告由陆军部派员对各报的新闻稿实行预检,违者军法从事,公然将已废止的亡清《钦定报律》重新搬回民国的报坛。“报界的黄金时代”也随之戛然而止。

1913年3月20日,袁派人暗杀宋教仁。这直接导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认清了袁世凯的嘴脸,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爆发后,袁政府颁发的新闻禁令更是一个接一个,并要求全国所有的报刊重新登记注册。“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政府借军事胜利之淫威,指斥国民党为“乱党”,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以及其他异己报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和打压。凡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一律被扣上“乱党报刊”的罪名而加以查封。国民党“新闻团分子逃亡者半,遭显戮者半。京中言论界稍带民党彩色之报纸,从此无片影之留”^①。据统计,在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间,全国报刊至少有71家被查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军警捣毁,新闻记者中至少有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特别是在1912年初到1913年底出现的“癸丑报灾”,导致全国继续出版的报刊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少了2/3。^②此后,全国报刊总数始终维持在130家至150家,形成了持续四年之久的新闻事业低潮。

袁之后,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等继任者先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轮流执政,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中国近现代历史进入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们无不运用其窃取的政权力量,通过法律手段对孙中山确立

① 《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民国日报》,1919年9月。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11页。

的自由新闻体制进行大肆扭曲和破坏,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全为其封建军阀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制度,因而更加加重了中国政坛和新闻界的混乱。

(二) 执著:“文人论政”传统的发展

面对言论的禁锢和严峻的局面,素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报人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斗争,中国的新闻事业在逆境中发展。

这一时期的前期(五四运动之前),全国时局不宁,社会日益动荡,这自然引起了人们对变幻莫测的政局的关注,以及对新闻报道及信息的强烈需求。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批以采写新闻出名的新闻记者应运而生,并形成了民国初年的著名新闻记者群体。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被誉为“报界奇才”的黄远生——他引领了报界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变,以自己卓越的新闻采访活动能力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①有被誉为“报界怪杰”的刘少少——他为各报所写的文章“庄谐杂出”“务出己意”“时有新思”,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②有与黄远生、刘少少合称“民初三大记者”的徐彬彬——他介绍我国文物、典章制度和历史掌故时,如数家珍,成为文史掌故方面的巨擘。^③有被誉为“报界全才”的邵飘萍——他“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为唯一嗜好,以“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为终生信条,为新闻事业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心血甚至生命。毛泽东同志后来称赞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④有被誉为“白话报人”的林白水——他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对白话文的倡导与应用。他曾经如此评价自己:“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报刊来做革命的宣传,

①③ 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265页。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③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7页。

恐怕我是第一人了。”^①有被誉为“报界名人”的胡政之——他是我国新闻史上不会被忘记的人物。在动荡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开明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报界巨子。他们的出现及贡献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②

这一时期的后期(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他们的实力削弱了。这种状况使得军阀势力对于新闻界的控制,不可能像袁、段执政时那样稳定和有力。中国民营新闻事业,就在军阀矛盾的缝隙里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加之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影响,“文人论政”的传统再次与中国新闻界对接,成为报刊言论的主导力量。

当时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私营报刊有《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京报》《时报》《东方杂志》《世界日报》《新民报》《生活》周刊等,出现了史量才、汪汉溪、李大钊、胡适、傅斯年、陶行知、邹韬奋、成舍我、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范长江、赵超构等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编辑、记者和经营大家,蔚为一时之选。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更加关注时务,以笔为武器、以报章为载体批评时政,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社会理想。

1912年,史量才在盘进《申报》时,抱定了“为社会、历史办一较有权威的言论机关”的宗旨,要将申报作为史书留给后人。我们知道,报刊言论往往是报刊的心声,反映了报刊的立场和态度。史量才改革言论,首先改革“温吞水、太上感应”式的“时评”。新的时评写作班子由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组成。他们集思广益,讨论、搜集材料,撰写成一篇篇切中时弊的檄文。十年内战时期,著名的三论之一《论剿匪与造匪》,就公然指出“所谓的匪是黑暗政治所造成的”,是“受政治经济双重压迫铤而走险之良民百姓”,喊出了民众的心声,大长了共产党人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③此时《申报》已

① 傅国涌:《一代报人林白水之死》,载《文史精华》,2004(167)。

② 方汉奇:《一代报人胡政之》,载《新闻与写作》,2005(1)。

③ 庞荣棣:《史量才——报业巨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一改昔日欲言又止、躲躲闪闪的作风,以“文人论政”的战斗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了。

“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最为坚定的信念。辛亥革命后,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坚持《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抨击最高当局,为民众呐喊;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使北洋军阀望而生畏。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有主义有主张,真诚革命,数十年如一日,毫不含糊之中山先生”,“绝对不排外也不媚外之中山先生”。邵飘萍的这些态度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① 难怪冯玉祥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1925年,成舍我创刊《世界日报》时就标榜“超党派”,做大众的喉舌。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世界日报》从3月19日至3月23日,每天都在头版全版刊登惨案情况和惨案照片,并发表社论,要求段祺瑞政府辞职,为爱国学生伸张正义。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其血腥屠杀大大激怒了中国人民,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反日高潮。《世界日报》以《日本将为人类公敌》之标题为文,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胡适从15岁时开始参与《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他新闻思想的核心。强烈的道德关怀意识,鲜明地体现在他一生的报刊活动中。他对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新闻事业”多有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6页。

批评。他说：“我觉得不要以为自己党来办报、政府来办报，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持，没有这回事。”^①他还认为报刊的独立是负责任的前提。一个人也好，一家报刊也好，如果处处受制于人，不能独立地做出一种判断，他们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年，为了监督政府，开启民智，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弊政，揭露黑暗，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价值。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自由主义精神。1935年4月，《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在著名的西北采访旅行之前，《大公报》总编胡政之把手而言：“新闻事业是国家的公器，……新闻记者最需要有责任心，不但发表意见，言必由衷。便是报告新闻，也须有真知灼见，否则对职务为不忠，对社会为不信，对报国为不义。”^②1936年，他记载西北之行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书中第一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范长江又赴内蒙古、绥远等地采访，对日寇觊觎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作了考察。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直赴事变中心，对周恩来进行了采访；接着他又进入延安，与毛泽东同志作了通宵达旦的畅谈。陕北之行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③。回到上海，《大公报》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发表了他访问延安的系列报道和通讯，震动朝野。蒋介石大骂张季鸾，但《大公报》却销量猛增。

三、《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中的“三大论战”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继续陷入黑暗之中，中国的政治思想界

① 《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方蒙：《范长江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沉闷局面。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在经过沉痛的思考之后,认为他们数十年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政体,之所以能任凭封建官僚政客玩弄操纵、名存实亡,是因为中国广大国民思想上还不能觉悟,还没有摆脱数千年封建文化的思想牢笼。因此,当前的问题不是继续进行过去的那种政党运动,而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向着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文化发动猛烈的总攻击,以“改造国民性”。他们认为,这才是巩固民主共和的“根本之图”。

(一)《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宣传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开展批孔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发动文学革命运动。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三大主义”,即推翻贵族、古典、山林的文学,建立国民、写实、社会的文学。他把革新政治与革新文学联系起来,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①。1919年,李大钊把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向读者推荐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

为配合《新青年》的宣传,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重在批评事实”,把思想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结合起来,成为新的报刊宣传阵线中最有影响的报刊,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1918年起,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和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全国各地大批报刊,经过几

^①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98页。

^②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

年反封建文化的民主与科学运动的洗礼,相继站到了新文化运动这一边。在《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当时全国各地曾相继出版了一批和它类似的时事评述性周报,如湖南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浙江的《钱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李大钊评论《湘江评论》是“全国见解最深、最有见地”的刊物,读者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全国学生会报之冠”^①。

五四运动后,据统计,全国各地的革命报刊一年内新出版的就达到400种之多。而政治思想评论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和主要宣传方式。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185页。

(二)新旧思潮大激战;新文化力量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纵深发展,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恐慌和仇恨。1918下半年至1919上半年,在报刊上引发了新旧思潮大激战。

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重要人物有林琴南、辜鸿铭、刘师培等,代表刊物有《国故》《新申报》《公言报》等,其中《国故》是刘师培等专为抵制新文化运动而创办的,以“倡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号召,反对白话文,提倡文言文;反对新思想,提倡旧思想。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大肆诬蔑、攻击,视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报刊为“洪水猛兽”,称陈等新文化战士为“过激派”,认为五四运动是“铲伦常、履孔孟”的“恶果”。

林琴南在这批封建顽固文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新申报》上发表蓄意编造的小说《荆生》,以田其美、金心异、狄莫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三人聚议主张“废古文、行白话、非孔学”。忽有“伟丈夫”荆生(顽固派化身)徒出责骂:“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一顿拳打脚踢,得胜而去,反映了封建顽固派的意图和动向。与此相呼应,安福国会中的议员们要挟教育总长,要他解聘主张新文化的北大诸教授。《荆生》一发表,立刻遭到了新文化战士的重视和反击。《每周评论》转载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该文正气凛然地指出:“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①,反击并正告顽固派。林琴南还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蔡逐一批驳,并申明他办大学的主张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实际上也就庇护了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论战中,社会舆论更是倒向新文化运动一边,仅从《每周评论》两次辑录的《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看,全国至少有15家报刊发表的

^① 《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27 篇评论支持《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载文称：“《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世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①一些报刊主张要继续革新思想，《浙江教育周刊》载文希望革新者“自觉其责任之重，知旧势力之大。力与奋斗，百折不挠，具独立之志趣，有牺牲之精神，真理所在，生死以之”^②。

针对封建顽固势力的攻击与责难，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③这既是对责难的回答，也是对新文化运动宣传的总结，体现了新文化战士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精神。他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上的一切黑暗。因此，为了宣传民主与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④。

这场被称为“新旧思潮大激战”的斗争，将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充满了对中国旧传统的批判精神，并且洋溢着充沛的战斗激情，实际上是新文化力量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斗争。事实表明，反封建的新文化已深入人心，并成为新闻舆论界共同追求的倾向，这是不可逆转的。这场斗争唤醒了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为五四运动的到来做了思想准备。而伟大的五四运动，宣告了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三）三大论战：激进与保守的决绝

新文化运动因为其批判的是旧思想，引入的是西方文化，所以引起的争论最为广泛。中西、新旧、问题与主义之争共有三次论战。其

^{①②} 转引自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③ 陈独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④ 陈独秀：《新青年》，第6卷第1号。

中,中西文化论战和问题与主义之争直到现在仍在探讨。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历史面临转折的时期,当时的文化论争与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制度变革交织在一起。由于激进主义更适应中国的需要,文化激进主义势力得以形成和发展。激进主义者反封建的彻底性,使其对文化保守主义采取了一种决绝的态度。陈独秀就认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中国文化的出路已经不能渐进式解决,它必须以彻底的、坚决的法子去解决。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中,从政治习惯、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方面比较了东西文化的差异,认为西洋文明则为近代文明,它“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①。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由于带有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带有明显的落伍倾向,因而无法战胜激进主义。如章士钊提出的“新旧调和论”,不仅在于阐明新旧文化之间的继承性,更重要的在于说明中国文化不需要破除。《新青年》《新潮》《晨报》《觉悟》等刊物纷纷发表文章对其进行回击。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尖锐地说:“试问德莫克拉西是什么?纲常名教是什么?两下里折中调和起来是什么?”^②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竭力赞扬儒家文化的高明之处,力图达到复兴儒学的目的。但他们明显夸大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明显落后于时代大潮,其观点除了学理上的意义外,已经缺少政治和历史的进步意义了。

从论战各方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深层思考看,在这场论战中,人们的思想表现了与时俱进的特征。即使是守旧人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随历史的发展而前进,他们也不绝对否认

^①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② 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4页。

西方文化的长处和完全回避东方文化的缺陷。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就专以新思想而论，因为解放的结果，种种思想同时从各方面迸发出来，都带几分矛盾性。”这些矛盾“消灭是消灭不了，调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为此”^①。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看，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东西文化论争的展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过程。其中，文化论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这场论争为人们接受新思想扫清了道路；同时，“中体西用”学说的“中体”终于让位于“西体”。保守势力以欧战的后果作为判断西方文化的标准，虽失之偏颇，但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使人们的视线向社会主义方向转移。再加上受传统“大同”理想等因素影响，各派人物比较认同社会主义。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指出，西方文化“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者，是也”^②。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冲突。五四运动以来，两种思想谱系分别以不同的变形进行着思想上的交锋。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演绎出来的思想史命题来看，今天的学术立意不应该总是停留在孰胜孰负的判别上。作为启蒙思想史的一桩公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思想史上一次双赢的典型个案。

从论争的内容来看，二者都有将“主义”与“问题”作为并立互补之思想资源的理性思考。“交相为用”“并行不悖”（李大钊）、“二者缺一不可”（陈独秀）是他们的共识。

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看，问题注重的是方法或说“现实”，“主义”注重的是目的或说“理想”。分庭抗礼的双方通过论争，加深了

①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4~725页。

②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各自对自我体系残缺的体悟,最终在手段与目的、理想与现实的自我缺憾中表达了取长补短的愿望,从而形成了思想史上难得的学术争鸣、思想互补与宽容对方的局面。

从今天我们面对的社会改革来看,胡适那种实验主义认知的态度还是值得借鉴的。它通过论争告诉人们,“主义”会流于“空谈”,从而也会助长中国传统本来固有的“空疏”“骄器”学风。他强调的“不要迷信(一种)学理”,“任何学理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以及采取怀疑、求证、实验的态度去寻求真理和改造社会良方的思想路径,有着恒久的意义。

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图式来看,新文化运动是从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到政治变革(百日维新)再到文化改革的全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致力于对旧思想和旧文化的批判,致力于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引进,要革除陈规陋习,造就新的国民性格。尽管“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其目的还是正如陈独秀所说的:“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①中国有两千余年的专制传统,个性主义一直被视为异端加以压制。近代以来,先进思想家逐渐认识到,是否承认个性主义的价值是中西文化最本质的区别之一。个性主义是健全社会必不可少的元素,是一国国民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关键。尽管这一点在近代中国长期未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承认,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个性主义最终被认同并得到逐步发扬,乃是必然趋势。

总之,新文化运动为刚刚完成的辛亥革命进行了一场文化革命的补课。它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从巩固共和制度入手,抓住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以批判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致力于培养现代

^①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公民,推进人的独立与解放。新文化运动真正掀起了人本主义、个性解放的大潮。此时,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说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启蒙思想家的价值重建工作,落到了人的解放与个性解放的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气势、规模和深度方面远远超过了维新时期,影响也更为深远。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使自由主义成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观。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迅速发展。其中,作为擎旗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认为“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①。它提醒人们要学会尊重自己,要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要自觉地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要造就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个人,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必须破除“特别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神圣性,使人知道传统并非神圣不可改变的。中国人虽然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但并非命里注定要永远做奴隶。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告诉人们,在这个新生的国家里,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都有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

^① 转引自王兴国:《“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易白沙》,载《求索》,1983(2)。

第二节 “文人论政”传统的衰退与再度兴起

一、民初：“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转变

从王韬的《循环日报》到辛亥革命的政党报刊近 40 年的发展中国,我国报刊逐渐进入了“政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报刊被视为“国之利器”,政论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文人论政”也成为我国报刊的优良传统。我们看到,有重大影响的报刊无一不是由这些著名的政治家们创办或主编的,著名报人无一不是著名的政治家。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进行新闻采写与报道,而是如何利用报刊言论鼓吹政治改良或革命,用他们的报刊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民国成立后,由于自由新闻体制的推动,我国新闻事业曾经出现过空前的繁荣。但为时甚短,1913 年“二次革命”后,即遭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官僚们的残酷压制。多数报刊因担心言论罹祸,开始少发或者干脆取消社论和论说,而大量刊登电讯和通讯。政论从繁荣到凋敝,是民国初期新闻事业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我国报刊从“政论时代”转向“新闻时代”的重要标志。这个转变和当时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堕落。我们知道,在国人的两次办报高潮中,均以政党报刊为主。政党报刊以宣传为重的特色,似乎决定了它和新闻真实性的某种背离。民国建立之后,在炫目的资产阶级政治口号下,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结党结社的风气,在短时间里全国骤然出现了 300 多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团体。这些政党除了有名无实、昙花一现的“特点”外,都竞相利用报刊来为自己宣传。如果说辛亥革命前的政党报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报刊还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到了民国初期,革命的任务似乎完成了,它们之间的争论就集中到了本党要在议会中占去多少席位、争取到多少权利等这些利益之争、权力之争上。这样一

个局面直接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是报刊低级庸俗。首先是对事实的不尊重。当时政党报刊分成了两大派系,这两派报刊彼此对立,互相攻歼,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没有多少严肃的政治争论和原则是非,只不过是乌烟瘴气的党同伐异而已。这种现象突出地反映在新闻报道方面,往往明明是同一个事件,却会出现不同的说法。有人回忆说:“同一件事,甲乙记载,比迥然相反。故阅报,即知其属于某党,至记载之孰真孰伪,社会不辨也。”^①其次,当时的政党报刊在争论之余,还相互进行人身攻击,以至不少报刊“纯以谩骂为事,不知报纸原则之何在”^②。甚至人身攻击都不足以让他们发泄私愤,最后发展到施用暴力手段,经常会出现殴打报人、捣毁报馆的情况,甚至发展到“各记者出入时,均带手枪一支”^③的状况。

另一方面是报人品格低下。民国成立后,随着对新闻事业管制的放宽,办报的门槛降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报业发展的手段,如降低邮电费等。这就使办报成了部分资产阶级营私牟利的手段,谁给钱就给谁帮腔,“有奶便是娘”“人尽可夫”等都是当时形容这些品格低下的办报者的一些尖锐言辞。有些人滥用手中的言论权,进行敲诈勒索,甚至作为自己仕途的垫脚石。还有一些报人仅仅为了牟利,并不认真办报,只靠剪辑拼凑的新闻和低级趣味的文字来敷衍差事,剪刀、红墨水、浆糊是他们办报刊的素材。这种东拼西凑的“鬼报”,毫无价值可言。^④

此外,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和政客常以出钱办报和给报刊津贴等方式贿赂报人、报刊来为自己作鼓吹。如袁世凯一上台,就着手创办和收买报刊。在北京,他先后出资创办了《国权报》《金刚报》和《亚细亚日报》;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他又

①② 《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民国日报》,1919年9月。

③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④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接办了《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华国报》等。据不完全统计,袁执政期间直接或间接收买的报刊有125家以上。这些报刊丧失了最基本的报格,谁给钱就替谁说话,成为反动军阀、官僚和政客玩弄权术、愚弄民众的帮凶。有的报人甚至将办报作为跻身政界的捷径,攀龙附凤,进行政治投机,以求混得一官半职,这种人更为舆论界所不齿。这种局面完全背离了新闻规律,也是政党报刊走向灭亡的标志。由于政党报刊的声誉不佳,一些正直的、有事业心的报人开始致力于发展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新闻事业。这是促使我国新闻事业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转变的主要原因。

二是读者新闻需求的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间接地影响到了我国新闻事业的转变。它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商业信息的需求。我们知道,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原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我国进行侵略上的帝国主义,此时却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因此,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以在这个空闲中有所发展。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们对于新闻信息需求的增加,报刊的商业化倾向和经济报道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所加强。

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自然无法摆脱其影响,再加上这个时候国内的局势也一直动荡不安,国内外的局面唤起了人们对时局的关注和对新闻报道的需求。为了适应读者的这种需要,报刊上的通讯普遍得到加强。而且,由于对于所发生的事情需要做深入的了解才能够把握住它的性质,也就是说,只描述表面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因此,关于政界要人的动态、言论以及各派政治势力台前幕后活动的采写,尤其是一些内幕、独家的新闻报道,在这个时候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重视。一些能够以采写这类新闻著称的名记者,也就应运而生。

二、五四运动时期:政论传统的再度兴起

(一) 政论传统的再次兴起

《新青年》从创刊起,坚持紧密联系现实、自觉服务思想政治斗

争的办刊方向,充分发挥了报刊舆论的引导作用。《每周评论》的创办,更是大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时事报道评述。其栏目设置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一看就是以政论为主的小型的政治性栏目。

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陈独秀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他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不仅让人们人们对巴黎和会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且动员人民起来进行“直接解决”,并且解决的对象不是举国上下矛头所指的曹、陆、章三个卖国贼,指出他们不过是造成罪恶的“一种机械”,真正应该解决的是造成“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的政府。陈独秀清醒地认识到,正是腐败的卖国政府才使帝国主义敢于为所欲为。在整个运动中,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山东问题想到了“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民族自卫,就是进行战争也不怕。如果政府再敢断送国家权利,“国民是万万不能再恕的了”。经过陈独秀的引导和形势的发展,人们从外交的失败看到了内政的腐败,看到了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也看到了他们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敌人。从此,五四运动开始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反动当局,使运动具有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

受其影响,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办了新民学会,探索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并创办了与《每周评论》内容版式几乎一致的《湘江评论》。发刊词以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宣告了新思想的威力。其中应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二、三、四期连载的《民众大联合》的文章,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真正的革命力量,影响较大。这一时期的政论家不胜枚举,单是《新青年》就有一个作者群落,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邵飘萍、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

五四运动是划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报界在反帝反

封建上空前一致,表现了新闻界经受新文化运动后的不断进步。同时,也正是因为新闻界的大力报道、评论,有力地促成了这一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五四运动打破了民国以来报刊万马齐喑的局面,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复兴。

(二)现代新闻评论的发端

《新青年》一开始着重于政论,全部使用文言文。但很快钱玄同就建议将文体改为白话文。从第4卷起,白话文迅速增多,到第6卷几乎完全采用白话文了。在其带动下,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报刊纷纷采用白话文。同时,《新青年》又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从而给中国的新闻政论带来了较大的改变,使新闻评论进入了大众时代,为政论进入现代打下了基础。

述评和杂文的兴起,增加了新闻言论的种类。述评是政论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创新形式,夹叙夹议,有深度,很适合于周刊使用,很快就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杂文作为一种文艺性论文,既包含了政论的因素,又包含了文艺的因素,有人说它是政论与艺术的结合。《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发表的短小锋利的时评,就是一种杂文,它是一种“匕首”“投枪”式的评论文体,新闻性强,针砭时弊,匡正是非,语言幽默,尖锐泼辣。此外,《新青年》《每周评论》在进行学理思想讨论过程中,把不同观点的文章全文或摘要同时编发,让读者比较、讨论。这种做法,使报刊充分发挥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可以帮助读者认清是非。《新青年》还设置了“通信”“读者论坛”“讨论”“书报介绍”等专栏,通过这些栏目联系读者、作者,开展自由讨论,进行不同观点的交流与辨析,从而促成了思想的大解放。

这段时期的革命报刊,大多由个人或团体创办,发言比较自由。当时的军阀统治下,新闻法规虽然存在,但不具有权威性,执行者普遍存在不严肃对待、以意为法的做法。加之附加法规很多,报刊出版管理混乱,这反而给报刊出版者以一定的自由。但革命者为争取这种自由,也遭受了种种非难,甚至付出了生命。在严峻的现实面

前,他们丝毫都没有退缩,陈独秀表示“一息尚存,寸心不懈”^①,李大钊说“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②,充分展示了革命的政论家们救国救民的执著追求和宣扬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三、“九一八”事变前后:《申报》《生活》周刊的转变

“谈旧中国报刊必谈《申报》,谈《申报》必谈史量才。”^③1912年,史量才刚接手《申报》时,正值国内军阀混战之际,对于一张商业报刊,只有超然中立,才能在新闻界立稳脚跟。《申报》素以“公正报道,不偏不倚”自诩,表现为“国家人事很少触及,专谈小问题,而且文笔曲折,兜圈子,耍笔头,不伤脾胃,不管痛痒,有人比之为太上感应篇”^④。

这一时期,史量才对史家办报思想推崇备至,认为“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出史部之刊物也”,主张记者应“负直系通史之任务”,“同人则以史自役”,^⑤完全用史家的职责和道德要求记者。要想忠实地以历史学家的态度和视角记录历史,他认为,报馆应有“独立精神”。为了使报刊不被政党在经济上、政治上控制,史量才把自己主持的报刊看做按照商业原则经营的独立事业。要做到这一点,他强调报刊必须走近代化企业的道路。因此,他重视报刊的发行及广告收入,着力于更新设备等基础建设,使《申报》的出版能力不断提高。此外,在“以报传史”思想的指导下,史量才接手《申报》之初,便做了一件对后世功德无量的事情:他花费巨资,从一名老读者手中收购保存了完整的前40年的旧《申报》。这为以后的新闻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这一时期,《申报》虽然在言论上比较谨慎,但其新闻报道始终

① 《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0页。

② 《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③ 董婉苏、史敏杰:《史量才对〈申报〉发展的贡献》,载《新闻与写作》,2006(1)。

④ 庞荣棣:《史量才——报业巨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史量才:《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申报》,1932-04-28。

是中国各大报中最为出色的。史量才不惜花巨资建立起遍及国内的新闻网,还在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等大城市组织特约记者和通讯员队伍,1931年更在南京、汉口等29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馆。强大的采访、报道能力,使《申报》被誉为“旧中国的《泰晤士报》”。正如胡太春所言:“他的办报思想是中国儒家史学工作者传统的民主意识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糅合,在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①

“九一八”事件前后,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史量才保持了一个爱国报人的清醒头脑和坚定立场。他迅速调整了报刊的指导方针,用手中的报刊为武器,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用革命人士的妙手所著之文章来担当救亡图存的道义。这一转变对于《申报》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改革后的《申报》有了不少明显的变化:首先是言论态度鲜明,加强了政治时事评论。1932年,《申报》连发了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鲜明地反对内战。其次,革新副刊《自由谈》,聘请青年作家黎烈文任主编,改变了长期庸俗的趣味主义编辑方针,主张文艺的进步与近代化。使《自由谈》成为反文化“围剿”的进步文化阵地,成为时代性的思想文化园地。最后,聘请李公朴等主持开展社会文化服务事业,相继举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等,团结培养了大批青年并使之走向进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此外,创办了俞颂华主编的《申报》月刊,发行《申报年鉴》等。这一系列改革既服务了社会,又增强了报刊的声誉,促进了报刊的销路。

“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的思想,使《申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性大报。“九一八”事变后,《申报》的变化为社会所注目。而在国民党当局看来,这些变化意味着脱离它的

^① 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控制,这是不能被允许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企图控制《申报》的言论,史量才坚持爱国立场,与蒋针锋相对。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有一百万兵!”史回答说“我有一百万读者!”于是,为自由与真理服务的史量才终被盛怒之下的蒋介石派特务暗杀,成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用极端手段维护其新闻统制、严防失控的一个案例。^①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正式开始新闻出版生涯。“九一八”事变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改良主义转变为鲜明的抗日救国立场和社会主义倾向。有关韬奋和《生活》周刊,下一节将专门论述,这里不再展开。

第三节 “文人论政”传统发展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邹韬奋的报刊活动

邹韬奋,祖籍江西余江,1895年生于福建永安,原名恩润,笔名韬奋。1919年由南洋大学转入圣约翰大学学习文科,毕业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并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主编“职业教育丛书”,同时兼任中华职业学校和海澜英文专门学校的英文教员。

1926年10月,韬奋接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周刊,正式开始了他少年时就向往的新闻记者生涯。《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它的宗旨是进行“职业指导”“职业教育”。韬奋从纯正的办报目的出发,不断改进《生活》周刊的内容和形式,使《生活》周刊愈来愈受读者的欢迎。接办三四年后,《生活》周刊的发行数就由初时的每期2000余份增至8万份。

^① 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表现出了鲜明的抗日救国立场和社会主义思想倾向。“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生活》周刊全力支持爱国军民的英勇战斗,出版了《紧急临时增刊》、号外、画刊等,及时报道、评论战况。韬奋和《生活》周刊的同事们还积极参加后方服务,为前线征集军用品,捐款开办伤兵医院。《生活》周刊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拥护。1931年底,《生活》周刊发行量每期增至12万份,一年后又猛增到15.5万份以上,打破了当时全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蒋介石把《生活》周刊视为眼中钉,先是多方设法企图收买韬奋,要他改变态度,还示意要派人进入《生活》周刊社,“指导”言论。在这些做法遭到韬奋义正词严的拒绝后,他们改而采用强压手段,于1932年7月密令禁止邮寄《生活》周刊。10月,韬奋依靠读者集资筹办的《生活日报》,也由于环境的险恶而被扼死腹中。

1932年,韬奋创办生活书店。该店相继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分店,大量编印发行抗日救亡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1933年初,韬奋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这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韬奋亦被列入黑名单,被迫于7月“出国暂避”。韬奋在流亡国外的两年中,撰写的海外见闻通讯先后在《生活》周刊、《新生》《世界知识》上发表,后来辑成《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本通讯报告集,共57万多字。这批国外通讯不仅内容充实,材料真确,爱憎鲜明,而且文笔生动,明快有力;有时情景交融,有时议论风生,尤以热情洋溢和轻松幽默而吸引人,一时风行海内外。读者赞美它是“充满着爱与力的新游记”^①。

1933年底,国民党政府终于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周刊。最后一期《生活》周刊发表了早在一年多前韬奋就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该文坚定地宣告: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页。

“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与读者从实际方面努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①《生活》周刊出至8卷50期刊，共出版417期。

1935年8月，韬奋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主编《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全力报道，成为这个青年爱国运动有力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每期发行量高达20万份。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查封；同年3月，韬奋被迫再次流亡香港；6月，在香港创办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生活日报》。香港一般大报日销最多五六千份，《生活日报》竟达2万多份。7月31日，《生活日报》出版55天后自动停刊；8月迁上海，在复刊受阻的情况下，韬奋只好将日报的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出版，为实现《生活日报》的目标继续奋斗。1936年1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逮捕了韬奋和沈钧儒、沙千里等7位“救国会”的负责人。在狱中8个月，韬奋写下了《经历》《读书偶译》等著作，坚持用笔战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韬奋获释，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1938年，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各地生活书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他辞去了参政员职务，出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抨击国民党的内外政策；5月，协助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1月离开香港到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10月，经上海奔赴苏北解放区。

1944年，韬奋因病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宋庆龄在韬奋的追悼大会上，亲题“精神爱国”的挽词。1949年，宋庆龄在上海市纪念韬奋逝世五周年大会上致词，赞扬“韬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战士。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

^① 邹韬奋：《与读者诸君告别》，《生活》第八卷第五十期，1933-12-16。

榜样”。宋庆龄指出：“在我和韬奋先生几年工作接触的中间，他所发挥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特点，一直受到大家的敬仰。他完全舍己为公，凡是人民革命的利益所在，总是竭尽全力以赴；对于任何反人民、反民主的恶势力，他绝不肯作丝毫的片刻的妥协”，“韬奋先生的一支笔，曾经鼓动了中国无数万爱国民众走上争取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的道路”。^① 1981年，宋庆龄应邹韬奋纪念馆的要求，为《韬奋手迹》一书题写了书名。

邹韬奋的主要著作收入《韬奋文集》。

第四节 《生活》周刊及“韬奋精神”核心内涵评析

韬奋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卓越的文化旗手，被誉为“人民的喉舌”。他一生对新闻事业情有独钟，自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他克服重重困难，共主办过6刊1报，经历了1次入狱、3次流亡。他既是主编，又是作者，还管经营，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办报主张，形成了著名的“韬奋精神”。

什么是“韬奋精神”？毛泽东同志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也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们的地方。”^②由于体现了这种精神，他办的报刊，受到了人民大众的欢迎。而且，在他亲身体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报刊思想，是一种切合中国实际的人民报刊理论。结合韬奋的报刊实践，笔者认为，“韬奋精神”的核心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的解放为目的，以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要

^① 常君实：《邹韬奋——经历：红色出版家人生传奇》，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求等方面。这种精神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永久的价值。

一、以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的解放为目的

以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的解放为目的,是韬奋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是与韬奋思想的发展与转变分不开的,贯穿于他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的解放就像一条鲜明的红线,在韬奋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他所主办的报刊,得到了生动和鲜明的体现。

1930年以前,韬奋属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早在1928年,他在回答“《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这一问题时就说:“《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①那时,他关心的是“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问题,提出的口号是“力求政治清明”与“实业振兴”。^②1930年,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我们的立场》指出:“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②并要“在振兴中国民族改进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努力中”^③贡献一份责任。此时,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所宣传的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7月,韬奋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基本上克服了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的信仰。面对日寇的大举入侵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迅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在《生活》周刊的政论中,抛弃了改良主义和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认识到只有广大民众才是抗日救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②③ 邹韬奋:《我们的立场》,《生活》周刊,1932-12-13。

亡的主力,中国的希望在于广大民众之中。“我深信只有大众有伟大的力量,只有始终忠实于大众的工作才有真正的远大效果”^④。1932年上半年,面对更加严峻的现实,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我们最近思想和态度》《我们最近的趋向》两篇文章,这标志着韬奋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我们最近思想和态度》一文中,韬奋公开声明:“我们所信守的正义,是反对少数特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动民众的不平行为”,“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⑤。经过斗争的洗礼,他表现出了鲜明的抗日救国立场和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从1933年7月至1935年8月,韬奋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飞跃发展。期间,他被迫出国流亡并实地考察欧美诸国,始终带着世界大势如何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何在两大问题,着重访问和考察了德、意、英、法、苏联和美国,以他的亲历和在英国图书馆的系统学习,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了圆满的答案,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有关中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认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决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⑥，“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获致。而且也必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⑦。

④ 马仲扬、苏克尘:《邹韬奋传记》,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⑤ 邹韬奋:《我们最近思想和态度》,《生活》周刊,第7卷第1期。

⑥ 邹韬奋:《萍踪寄语三集·弁言》,见《韬奋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 徐永煊:《韬奋的共产主义思想》,《世界知识》,第20卷第4期,1949-07-08。

从1935年8月至1944年7月,韬奋的思想进入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这集中反映在他积极主动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自觉地跟着共产党走,并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工作和行动上。1935年8月回国后,他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创办《大众生活》,提出了“实现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克服个人主义”^①三大目标,并向读者宣布他办的刊物是实现“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大目标的“一种工具”^④。1936年,他宣布《生活日报》是“人民的报刊”,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他要求《生活日报》的“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他认为,中国非进行彻底变革不可,报刊应该在促进这种变革中发挥作用。在《生活日报》创办不到半个月,他就响亮地提出:“只有在新中国,才能有理想的《生活日报》。”^②同时他又说,现在的《生活日报》要为新中国的早日实现而奋斗。1937年1月,他在《经历》一书中更是写道:“我要肩着这枝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③

周恩来同志曾指出:“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④这是对韬奋一生精辟的科学的概括。为了实现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解放的“大目标”,韬奋一直高举着正义的旗帜,让真理的火炬熊熊燃烧。正因如此,他赢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敬仰。

二、以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

以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是韬奋从事新闻出版事业重要的立场观。韬奋在长期的新闻出版实践中,继承了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他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办报刊首先要有正确、坚定的立场,

①④ 邹韬奋:《我们的灯塔》,《生活》周刊,1935-11-16。

② 邹韬奋:《发刊词》,《生活日报》,1936-06-07。

③ 《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④ 《韬奋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卷首插页。

这样才能给大众提供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脱离了大众立场而只图私利的报刊是没有生命力的。为此,他一直努力将报刊办成反映“大众的意志和要求”的舆论机关。

韬奋新闻思想中的大众立场观,并非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长期的新闻出版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的。1927年初,韬奋在接办《生活》周刊后不久,就在《本刊与民众》一文中郑重提出:“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今后仍本此旨,努力进行。”他还指出:“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都是本刊已刊载过的材料,也就是本刊替民众里面最苦的部分,对于社会的呼吁。”^①虽然邹韬奋此时还不具备明显的阶级观念,但他能从朴素的大众立场出发,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第一次昂然引入中国的新闻殿堂,这表明他的大众新闻立场观已初步确立。

1928年,韬奋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办这个周刊,心目中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机关。”它“不是替任何个人培植势力,不是替任何机关培植势力,是要借此机会尽我们的心力为社会服务,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尤其注意的是要从种种方面引起服务社会的心愿,服务所应具有的精神及德性”。《生活》周刊是属于“社会”的。^②1930年,他又在《我们的立场》一文中指明:“我们是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对于能爱护中国民族而肯赤心忠诚为中国民族谋幸福者,我们都抱着热诚赞助的态度。”^③作为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这些观点表明他的大众新闻立场观进一步趋向坚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韬奋逐渐完成了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后来在《经历》一书中回忆:“《生活》周刊

① 《韬奋全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② 《韬奋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③ 邹韬奋:《我们的立场》,《生活》周刊,1932-12-13。

既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作出发点,……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了。”^①从“个人”到“集体”,表明了他的大众新闻立场观发生了转化。1930年至1932年,韬奋在《生活》周刊先后发表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最近的思想 and 态度》《我们最近的趋向》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韬奋反复阐述了自己办刊的立场、信仰和态度。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②这表明他的大众新闻立场观实现了阶级性飞跃并最终确立,具有鲜明的战斗色彩和时代内容。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韬奋在自己的报刊生涯中,特别重视言论工作,言论就是他的大众新闻立场观的重要体现。我们知道,言论是报刊的旗帜和灵魂,是体现报刊政治面目和阶级立场的重要载体。从《生活》周刊的“小言论”到《大众生活》的“星期评坛”“漫笔”,再到《抗战》三日刊的“时评”及《全民抗战》的“每周评坛”等,他“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反动派不敢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③,立场鲜明,慷慨凌厉,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言论,首先要解决作者的立场问题,即“为什么人服务”“替谁说话”的问题。^④韬奋始终坚持大众立场,立志做大众的代言人,认为文化必须为大众服务。韬奋的言论思想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立场。从这种思想出发,韬奋把“最费心血”的小言论的着眼点始终放在“为民前驱”上。他一方面将极大的同情与关怀投向劳苦大众,另一方面将极大的愤怒与不满投向当局的错误行径和社会的

① 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51页。

② 邹韬奋:《我们的立场》,《生活》周刊,1932-12-13。

③ 俞润生:《邹韬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

④④ 俞润生:《邹韬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78页。

丑恶现象。“倾听大众呼声,鸣唱大众心曲”^④,成为他终生恪守的人生信条和行事准则,也闪烁着其大众新闻立场观的真理光辉。

1937年1月,韬奋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写道:“我在20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20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着这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①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成为韬奋大众新闻立场观的最好注脚。

三、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要求

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要求,是韬奋从事新闻出版事业重要的民众观,也是韬奋报刊思想的核心内容。大凡对韬奋的报刊思想有所了解的人,都能认识到韬奋先生的报刊思想中有一种强烈的民众意识。他要求时时处处以民众为主体,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必须考虑和体现民众的利益与需要。

1936年6月28日,韬奋在《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一文中明确指出:“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②这里,他把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提出来,作为发展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足以表明其为大众服务的思想及其准则。“容受性”事实上就是民众的利益,就是他们容纳什么、排斥什么,接受什么、反对什么,欣赏什么、厌恶什么,感激什么、鄙弃什么,需要什么、不要什么等。总之,民众的一切健康、正当的要求,均在其中有所体现。报刊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大到编辑思想、服务精神、编辑业务、职业道德、经营管理,小到言论的撰写、读者来信的处理、广告的刊登、遣词、造句、修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② 邹韬奋:《大众文化的基本立场》,《大众生活》,1936-06-28。

辞等,都必须以体现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要求。

(一)服务精神

1. 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是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的精华

早在1925年,他就提出了“服务上之彻底精神”^①的要求。他主张办报要为大众利益服务,强调办报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要照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②称读者的参与是报刊的“维他命”^③,要以读者为师,“且做且学、且学且做”^④。报刊要替群众说话,成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⑤,进而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报刊”^⑥。他认为“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⑦。韬奋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之所以能够始终不渝地坚守为大众服务的目标,就在于他较早地确立了为大众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可以说,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新闻记者要树立群众意识的问题。

2. 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始终统帅着韬奋的新闻出版事业

在筹办《生活日报》时,他说:“本报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⑧在编辑报刊的服务对象上,韬奋的着眼点也逐渐从市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城市其他劳动者,把自己的服务对象扩大到除汉奸、卖国贼之外

① 《韬奋全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② 《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③ 《韬奋全集》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④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⑤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⑥ 《韬奋全集》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页。

⑦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页。

⑧ 钱小柏、雷群明:《韬奋与出版》,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4页。

的“最大多数的群众”。他主办的报刊都是以“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们的服务精神”服务于大众和读者的，^①典型的例子是《全民抗战》，在尽力通俗化的前提下，另出了“战地版”“通俗版”，充分体现了邹韬奋对供应大众精神食粮的高度重视。韬奋还采用低廉的价格和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不轻易提高报刊的售价，尽力以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读者分享到精神食粮；主张《生活日报》采用中型纸或小型纸，便于读者保存、携带、检阅；宣称《生活日报》要冲破“中国人民大众，教育不普及，购买力极低”，“许多人不能看报刊，许多人能看报刊而买不起报刊”等难关，深入最广大的群众。^②

3. 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是韬奋新闻出版工作努力的原则之一

譬如读者来信，韬奋把看读者来信当做“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他往往“把读者的事看作是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③。办《生活》周刊期间，韬奋每天要收到 100 多封读者来信。最初，每封来信他都自己拆阅和答复，后来来信实在是太多了，他才确定几个人专门负责处理来信。他为读者提供信息，与读者交流思想，组织读者参加社会活动，为他们代购东西，并风趣地称采购的同志为“马路巡阅使”。韬奋对读者的无限热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和信任。他成为读者的“好朋友”，读者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广大读者把刊物看成是自己的刊物，不但自己订阅，还要传给下一代；不但自己受到教育，还用报刊上的道德去教育别人。

（二）编辑业务

1. 努力创办各种报刊，满足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

^① 邹韬奋：《患难余生记》，见《韬奋全集》第 10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37 页。

^② 邹韬奋：《正在积极筹备中的生活日报》，《生活》周刊，第 7 卷第 13 期。

^③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0 页。

在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下,韬奋认为报刊一定要成为对读者“有益的精神食粮”,成为读者“常在进步途上的益友”。^①在韬奋的指导下,生活书店一方面出版比较专门的学术著作,如《世界文库》《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百科小译丛》等,以满足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大量出版适合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阅读的书刊,如《青年自学丛书》《新知识初步丛刊》《少年文库》等,这些书刊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提供了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抗战爆发后,为了配合形势发展,生活书店又以广大军民为对象,出版了大量抗战文化书刊,如著名的《救亡丛刊》《战时教育丛书》等,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大大推动了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

2. 办报刊要有创造精神,形成报刊的个性与特色

还在《生活》周刊创办之初,韬奋就提出:“我们深信天下无十全的东西,最要紧的是有常常力求进步的心愿。”^②后来在《经历》一书中,他又总结了办报刊的经验,认为办报刊“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精神”。他反对雷同和模仿,把这类刊物称作“尾巴主义的刊物”。他说:“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③他选取稿件的标准是“有价值和有趣味”^④,既反对老生常谈,也反对滑头面孔,提倡把有益、有趣结合起来,寓教育于趣味之中。同时,邹韬奋在编排刊物时注意研究化(帮助读者了解新闻背景和前因后果)、思想的统一性(言论、新闻和副刊采取一致的思想态度)、内容的广泛性(反映民众多方面的生活)等。韬奋还力求照片和插图的醒目,这些都受到了读者的赞许。韬奋曾说创造的益处“就是我们

① 《韬奋全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② 徐新平:《邹韬奋大众新闻思想述论》,载《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

③ 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2页。

④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可以独出心裁,想出新的办法来适合我们实际上的需要,使我们进步得更快,使我们得到更圆满的结果”^①。

3. 文字和内容上力求大众化,文风要“明显畅快”

1927年3月,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之初,就在《本刊与民众》中郑重提出:“本刊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②1936年,韬奋在《生活日报》上提出:“它的内容应该力求大众化,应该极力接近大众,使大众看得懂这个报;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对于他们的知识、经验以及一切日常的生活,都有益处;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是他们的生活里不能离开的一件东西。”^③他办报刊的目的在于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孩子、农夫、工友们、妇女们,都能够看得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大众的生活反映到报刊上面来;只有这样,《生活日报》才是大多数人的报刊,而不是少数人的报刊。”^④在当时的中国报界,完全用语体文来写新闻的报刊还没有,邹韬奋能适时提出这种观点并且创办了《生活日报》,可谓大胆尝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重视言论

韬奋所主办的所有刊物,每期都有他所写的言论,如社论、笔谈、短评和小言论等。这类文字,“切合于当前所注意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⑤。他认为,言论的写作,一是要为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说话;二是除社论外,还要有各种专门问题的论文;三是短小精悍;四是语言通俗;五是为群众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不要公式化的空洞文章。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有正确的立场。而他“每周最费心血的”是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针对广大读者最关心和最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页。

② 《人民的喉舌》,见《韬奋论报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③④ 《韬奋全集》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652页。

⑤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焦虑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语言简洁通俗,文笔犀利,因此,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发生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这栏的文字。正如陈毅评价的那样,这些“小言论”,“竖旗文坛,横扫千军,刺透反动派的肺肝,尽了大众喉舌的光荣职务”^①。

5. 提出理想编辑的四个条件

在《征求一位同志》的文章中,他还谈到了他心目中编辑的四个条件:一是品性“大公无私”。韬奋认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言论方面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认为编辑的动机要绝对的纯洁,绝对不能夹杂私的爱憎、私的利害在里面,绝对要秉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私人的情面而作违心的言论。二是“敏锐的观察与卓越的识见”。编辑遇着一件事或一个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要运用自己的脑子深入地思考一下。三是“文笔畅达”。编辑不仅要能改稿,还要能写稿,心中想的东西能在笔下表达出来。四是“至少须精通一种外国文”。编辑要注意“搜集材料,贮蓄思想”,必须在平时多阅读中外书报,所以要求至少精通一种外国文。^②

此外,他提出编辑要甘做“小花匠”“垫脚石”、傻瓜和无名小卒,没有甘当无名英雄的品质,就绝对不可能做好“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工作。为了编好报刊,他强调新闻报道要快,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消息“捉”到手。^③他“取稿凭质不凭名”。他说:“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④他还强调校对工作,不

① 陈毅:《纪念邹韬奋》,《韬奋的道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页。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③ 叶同春:《邹韬奋,身体力行“三贴近”》,载《新闻前哨》,2005(11)。

④ 邹韬奋:《聚精会神的工作》,见宋应离等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辑》第3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

允许刊物上有一个错字。对于准备发表的文稿,他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他所不懂或不称心的。他还经常征求读者的意见,倾听群众呼声,不断改进编辑工作。这些都是韬奋编辑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思想。

(三) 职业道德

1. 大公无私

“大公无私”是韬奋高尚职业道德观的思想基石。韬奋曾说:“《生活》周刊的生命,就是由完全大公无我的对社会服务的精神组成的。”^①所谓“大公无我”,就是视事业如生命,真诚服务,无私奉献。他认为:“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②他在《经历》中进一步诠释道:“我服务于言论界者十几年,当然有我的主张和立场。我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③

正因为如此,他把大公无私作为对新闻出版工作者提出的四条要求的第一条。无论是撰述言论、接受稿件还是对人对事,韬奋都能出以公心,决不讲情面、循私情。他认为,大公无私并不难做到,只须立志做去,用不着什么特殊本领,是人人应该会的。原因在于他做事情是为了新闻出版事业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为了社会公共事业去奉献,人生便有价值,便觉值得奋勉,便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倘若我们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个人的地位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干,是为着社会的或大众的福利干”^④,所以,才能够只知道“乐此不疲”地干工作,而鄙薄和反对那种争名夺利的行为。

2. 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职业道德观是韬奋在新闻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

①③ 邹韬奋:《生活》周刊,第4卷第28期。

④ 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4页。

⑤ 邹韬奋:《生活》周刊,第4卷第28期。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斗争实践中,他日益感到:“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一切利害的中心,以个人自由为标榜。”^①而集体主义则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中心。要取得自由,必须团结大众,“做集团的斗士的一员”,进而争取民族的解放。所以,“我们要应现代中国的大众需要,就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②抛弃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是韬奋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次重大的转变。

正因为韬奋有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所以在敌人的诽谤、恫吓和威胁面前,在敌人的物质、地位的引诱面前,能够做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正因为韬奋有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他在《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蒸蒸日上的时候,想到的是如何发展事业,更好地为大众服务,从不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动半点心思。他告诫广大青年,在人生修养上尤其应加强集体主义的道德修养。他说,修养不应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要注意到社会性;是前进的,不是保守的;是奋斗的,不是屈服的;是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不是替旧的社会苟延残喘”^③。

3. 社会责任

韬奋的报刊一直洋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经历了从社会改良到社会革命的跨越。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主编《生活》周刊时,认为报刊只是努力帮助人们“敬德修业”的好朋友,这是他初期受改良主义影响所形成的朴素愿望。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时,国难当头,韬奋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以一个先进的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去。《生活》周刊从此改变为以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为主,鼓吹救亡抗日。这是韬奋社会责任感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在具体的办刊的过程中,韬奋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自觉抵制

①②③ 《韬奋全集》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495、496页。

一切低俗的习气,为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的榜样。他曾抨击当时报界流行的“低级趣味的弊病”和“凭空捏造、毁谤诬蔑”的现象,认为这是“新闻记者的道德完全丧失”的表现,是一种“恶劣习性”。针对有人认为是的报刊登载低级趣味的东西可以增强吸引力的观点,韬奋认为:“引人注意是一事,报的内容是否值得一看又是一事。倘若报的内容没有阅看的价值,徒然引人注意也是没有用的。”^①在他的思想里,读者的利益和健康的需要总是摆在第一的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关键是记者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②。

4. 义利统一

在韬奋看来,不管出版社是什么体制,出版永远是一种传播进步文化的事业。他说:“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个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③因此,办报刊的人也不能不重视经营活动,不得不赚钱。因为只有靠自己赚钱才能维护出版单位公正和独立的地位,才能保护“言论上及纪事上的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④,才能维持自己的事业。但是,韬奋深知媒体与金钱的利害关系,金钱的渗入必然使媒体传播的信息受到干扰并使媒体的公信力受到左右,所以他坚决表示,赚钱必须“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切不可见利忘义”,绝不赚“不义之财”,绝不能“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⑤。这种义利统一的经营观,是韬奋不同于当时其他人的显著特征。

① 《韬奋全集》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② 《韬奋文集》第3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0页。

③ 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生活》周刊,第7卷第9期。

④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⑤ 钱小柏、雷群明:《韬奋与出版》,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4页。

正因如此,他在办报刊伊始就立下了明确的规矩,即“向来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钱为铁则”^①。对于别人的“赠款”,不管是出自好意还是恶意,他都一概拒绝。他严格限制广告的刊登,“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不登”。他强调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③。在广告道德方面,韬奋是同时期的报人中强调最多,也是在实际工作中做得最好的一个。

(四)经营管理

1. “社会信用”

韬奋经营管理的核心经验,就是新闻出版事业一定要建立“社会信用”,即处理好新闻出版事业与读者,也就是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这是新闻出版事业成功和发展的命脉。韬奋办刊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也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投资。从《生活》周刊起,他就一直走的是“以刊物养刊物,以刊物助书店发展,以书店支援刊物”的道路。为了有效维护“社会信用”,韬奋强调,一是新闻工作者要有正确的动机,不能利用从“事业上所得到的社会的信用做自己升官发财乃至种种私图的阶石”^④;二是要克服自满、懈怠、退缩等情绪;三是信用也不能被“任何个人或任何党派”所利用,要顽强地与各种“黑暗”力量的迫害作抗争。正因为如此,韬奋主编的报刊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社会信用,受到的欢迎程度在当时是空前的,“无论是怎样偏僻的小岛上,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韬奋的读者”^⑤。这种高度的社会信用为韬奋的新闻出版事业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2. “股份制”

韬奋经营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最主要地体现在企业的股份

①③ 邹韬奋:《〈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生活日报》第55号,1936-07-31。

④ 邹韬奋:《社会的信用》,见穆欣编:《韬奋新闻工作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⑤ 胡愈之:《韬奋与大众文化》,见邹嘉骊编:《忆韬奋》,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制建设方面。他在内部实行合作社制,全部财产为职工所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的多少为比例,作为股份,分配给全体职工。以后新进职工,则于一定时间,以月薪 1/10 投入作为股份资金。而且还规定,社员最大的股款不得超过 2000 元,凡股份超过 2000 元以上者,其超过部分不再给予股息。他还特别注意避免大股东的操纵与控制,以免失去其新闻自由之特质。韬奋这种经营方式体现了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的原则,在当时有效地避免了社内职员收入分化。在合作社内部没有谁剥削谁的存在,每个职工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这使得《生活》周刊在当时政治与经济都很无序的时代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当然,这种制度尽管有可能导致资本的分散化,影响企业的规模生产,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要想保持媒体的新闻自由,这种制度可以说是非常合适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3. “人才主义”

韬奋经营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还着重体现在人才制度的建设上。他认为,在用人方面,要“严守人才主义,力戒安插冗员的恶习”^①。他从制度上规定:“职务上应请的人才,须经过干部全体的通过,或用公开考试的办法。”^②他坚持“为公择人”,重视“有创造力的人才”,重视“中坚干部”的作用,注意放手使用和提拔真才实学的年轻干部。在培养人才方面,韬奋一方面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又主张“修学与任事相辅并进”。为此,他提出建立“同人图书馆”等办法来解决职工的学习问题。至于“爱护人才”,邹韬奋更是无微不至,努力让职工“三无忧”：“第一是尽可以能使工作者无意外之忧,第二是尽可能使工作者无内顾之忧,第三是尽可能使工作者无后顾之忧。”完善的用人制度为邹韬奋的经营管理提供了方便和有力的支持。在他出国流亡之后,《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能够坚持下去并且有所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韬奋完善的人才制度建

^{①②} 邹韬奋:《正在积极筹备中的生活日报》,《生活》周刊,第7卷第13期。

设。

4. “公开性”

韬奋经营管理方式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公开性。他在创办《生活日报》之初就制定了具体的纲要,建议“经济独立,会计公开”^①。《生活日报社股份两合公司章程》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企业的经济独立与会计公开制度:规定每年6月底与12月底各结算一次,无限责任公司在总决算时要提交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损益计算书、公积金及股息红利分派之议案等,先由会计师检查,再转送监察人复核,最后由股东大会来加以确认。公司每届营业总额,除去成本与费用,先提法定公积的1/10,再提付利息6厘,最后就无限责任股东、股东红利、职工奖金、特别公积金四项作百分分配。

“忠诚为民,时刻为民,一切为民。”韬奋在从事新闻工作30年间,从《生活》周刊到《新生》到《大众生活》再到《永生》,从《生活日报》到《生活日报》周刊和《生活星期刊》再到《抗战》《抵抗》《全民抗战》和香港版《大众生活》,他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大众,始终信守为读者、为大众谋利益的宗旨。韬奋把他的思想融于民众的思想之中,始终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息息相通,把民众的利益、社会的发展作为自己工作的方向与目标。韬奋的新闻出版实践再次表明,人民大众是社会的主体,民众意识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主流。韬奋的报刊较好地体现了这些要求,从而促成了他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并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坚强堡垒。

第五节 邹韬奋对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创造性贡献及其时代意义

韬奋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对近代新闻出版工作作

^① 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生活》周刊,第7卷第9期。

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创了编读互动式的评论方式。在我国新闻史上,韬奋是重视编者与读者之间联系的第一人。1926年10月正式接办《生活》周刊后,韬奋就创造性地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有学者将这种言论方式称为由邹韬奋创始的“一种对话式的新闻评论的新型文体”^①。后来在香港主编《生活星期刊》时,从1936年9月6日第1卷第14号起,他又于“信箱”之外另辟“短简”一栏,简明扼要地答复读者来信。在后来的《全民抗战》中,“短简”又改名“回音”。无论如何改动,这一形式在邹韬奋的报刊上始终得以保留,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第一次将“服务精神”作为办刊物、经营书店的基本原则。韬奋在论述生活书店8种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一曰坚定,二曰虚心,三曰公正,四曰负责,五曰刻苦,六曰耐劳,七曰服务精神,八曰同志爱”^②)时,将“服务精神”列于首位,把它看做“生活精神”最重要的因素,看做生活书店的奠基石。他一生不求闻达,不图享乐,以高度的敬业精神热心为读者服务,始终坚持“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③的工作原则,把全国各地的55处生活书店办成了读者最可信赖的朋友,甚至是他乡的家。

第三,正确处理了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问题。韬奋曾作专文来解释两者间的关系,他说:“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我们在上海开始的时候,就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致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在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中,我们也力避破坏团结的作风,而致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事业性的含义”,“但是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

① 胡文龙:《韬奋在言论宣传中的创造性贡献》,载《新闻与写作》,1995(11)。

② 《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4页。

③②③ 《韬奋全集》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682~683、683页。

以仍然要严格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这里便牵涉到所谓商业性。我们的业务费,我们的资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商业性的含义”^②。韬奋在工作中摆正了事业性与商业性的位置,生活书店出版的30种杂志、近千种书籍,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上,韬奋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调“工作第一”的原则,^③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反对不负责任的情况;二是向生产要效益,厉行节约,增产降耗,坚决杜绝浪费现象。

作为“红色出版家”,韬奋的这些创造性贡献,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对落后的中国新闻出版业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即使是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一是甘当“无名英雄”,履行神圣职责。新闻工作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言人,是人民的代言人,应该起到耳目喉舌的作用。邹韬奋一贯倡导编辑记者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追逐个人名利。他曾说:“我生平并无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④从事新闻职业,做官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即使是当了新闻官也必须要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尤其是从事烦琐、忙碌工作的报刊编辑,更应该具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

二是坚持“脚板底下出新闻”,弘扬艰苦创新的斗志。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朴素求实的工作作风和不囿窠臼的创新意识是拓宽新的报道领域、探索新的报道形式、采用新的报道手法的需要。“脚板底下出新闻”,即条件差的地方、艰苦的场合,往往蕴藏着新闻的富矿,需要新闻工作者不怕苦、不怕死地采掘。韬奋当年就是把刊物办到了淞沪抗日前线,为读者及时报告战争消息。试想,如果在现

^① 邹韬奋:《〈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生活日报》第55号,1936-07-31。

今条件下,新闻工作者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能写出受群众欢迎的新闻作品来吗?

三是坚守严谨务实的编辑态度,提高编辑出版业务素质。就编辑工作来讲,其职责是决策、组织、加工、编排,日常要进行组稿、选稿、改稿。记者采写的稿件发到编辑手里,一般都要经过修饰、加工,甚至改写、重写,进行再创作,小到对原稿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仔细地推敲。如从业者好高骛远,小视区区字句,对各种稿件不屑一顾,那么就势必陷入狂妄、盲目、浮躁的境地。韬奋1930年就曾在《生活》周刊上指出,编辑是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的,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又怎能当此重任?因此,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更应坚持敬业爱岗、严谨务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夯实“五个根底”,练就过硬的业务本领。

四是坚定鲜明的政治立场,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韬奋在新闻思想上彻底抛弃了超阶级的观点,站到了“对民族解放前途,对大众解放前途,尽一部分的贡献”^①的政治立场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没有半点含糊。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我们的中青年新闻工作者必须“忠诚党的新闻事业”,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做到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掌握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应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讲究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人民,不辱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① 邹韬奋:《患难余生记》,韬奋出版社1946年版。

第四章 高峰：抗日救亡的战歌

第一节 “文人论政”传统高峰阶段的政治环境与新闻政策法规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从这时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全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与全世界进步力量大联合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大团结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各阶级、阶层大动员的胜利。

一、政治环境方面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从此中止，国内开始出现和平统一、共御外侮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曾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召开各党派会议，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并向国民党作出停止武装暴动方针、红军改变名称、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此一系列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斗争。

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

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紧急议案;杨虎城等人提出了西安方面关于抗日救国的8项议案;李宗仁等人提出了保障言论自由、保护爱国运动、解放群众及加强救国运动等议案。会上,虽然国民党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但在对内政策上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随后,国民党政府或修订或废止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等一批法规,释放了大量政治犯,从而有效地缓和了国内局势。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内政治气候终于在期盼中趋向好转。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第二次谈话时指出:“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中国改变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

二、新闻政策方面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以报刊为主体的新闻界得到了政府与民众的共同瞩目,大家一致认为“新闻界之努力与否,努力途径之正确

^①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1937-07-17。

与否”成为“直接决定抗战建国工作成败之重要力量”，“肩负精神动员之重任”。^① 蒋介石曾说：“我国今日，实已进入真正开始建设之一新时期，故报纸之使命，亦随之而入一个新时代”，“今当我国努力抗战之时，我新闻界为国奋斗责任之重大，实不亚于前线冲锋陷阵之战士。如何宣扬国策、统一国论、提振人心、一致迈进，达到驱逐敌寇、复兴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义国家之建设，实唯新闻界积极奋斗是赖”。^② 于是，为配合抗战任务与建国目的共同进行，国民政府适时调整了新闻出版政策与法规。

早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便提出“国族利益，高于一切，全国报业言论之方针，业务之进行，绝对不得妨害国族之利益”，“关于报业人才，应积极培植之，服务报界之人员，并须施行登记，予以法律上之保障”。^③ 蒋介石亦声称：“今后本党本此主旨，改善管理新闻出版之方法，且当进一步扶助言论出版事业之发展，使言论界在不背国家利益下，得到充分贡献之机会。”^④ 根据“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证”^⑤，1938年11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通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促进新闻事业发展案”，称“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与战时新闻宣传之加强，关系至为重大”，“亟应以抗战建国纲领为张本，而确立新闻报导之原则，以为全国报纸发表新闻之准绳”；决定“改善新闻检查制度，使之不仅实施消极的检查工作，更应推行积极的指导任务”，“扩充全国通

① 荣维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页。

② 蒋介石：《今日新闻界之责任》，《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3期。

③ 孙义慈：《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印，1940年，第65页。

④ 《蒋委员长之谈话》，《中央日报》，1937-02-23。

⑤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历次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7页。

讯广播事业”，“扶助全国新闻事业”，奖励创办地方报纸，进行失业记者登记，开办及援助各地造纸厂，调剂纸张来源，“加强国际宣传力量”，“政府对于新闻记者，应予特别优待，通令政务机关、军事当局对新闻记者工作，尽量予以协助，并准享受交通上最大之便利。对于新闻邮电，由政府通令各军事当局，对于持有证明文件之新闻记者，得予军事邮电递送之便利”。^① 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举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要求着重宣传鼓励，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巨潮。1940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第一期毕业生时提出，新闻界必须“善尽宣扬国策之责任。一切言论记载，悉以促进我国国民独立自主心，养成我国国民奋斗向上心为旨归，处处遵守抗战建国纲领，时时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②。

三、新闻法规方面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以蒋介石战时新闻出版思想为导向，根据抗战建国的需要，先后出台了《修正出版法》《修正出版法施行细则》《修正新闻检查标准》等法令规章，相对减轻了先前紧张的报刊业发展压力。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政治上的倒退，国民政府战时新闻检查加强，军委会成立了战时新闻检查局，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新检处（所、室），颁行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新闻记者法》《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战时新闻违禁惩罚办法》《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等一系列关涉报刊业发展的法令规章，从而奠定了国民政府战时新闻“统制”的基本音调。1942年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甚至规定：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

^① 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107页。

^② 蒋介石：《勉新闻界战士》，见张其：《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中国台湾：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①反攻阶段到来后,国民政府改变了前一阶段的高压态势,发布了《出版品审查办法与禁载标准》等法令规章,禁载事项略有减少,在实际执行中亦一度缓和。

与战前相比,名目繁多的战时新闻法规的迭次颁布,密如天网,这无疑会对报刊的发展产生强大的纠控效用。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报刊发展的压力随即增加,新闻报道动辄得咎,报刊被禁,报人被抓,报馆被封,这些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矛盾尖锐,报刊管理体制紊乱,令出多门,事权不一,有关法规语焉不详,模棱两可,报刊利用各种法规之间的缝隙与漏洞、主管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突破,仍有所发展。同时,报刊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亦常常通过各种编辑和发行手段抵制、阻止、延缓法规的实施,并积极呼吁、争取各种力量的支持,消减了国民政府新闻统制的力量,使其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大体而言,抗战时期国统区报业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新闻政策法规比以往宽松了许多,这是有利于报刊发展的。

第二节 “文人论政”传统高峰阶段的新闻背景

在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既有血与火的军事战场,又有笔与纸的文化战场。在第一个战场上,中国军民英勇奋战,用血肉之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第二个战场上,抗日报刊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日寇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热情地讴歌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思想和力量。“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报刊遍布全国各地和国外华侨集居区,总数达1000余种。这些报刊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发行量一般超过万份,有的甚至超过15万份。

^① 江沛:《南京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载《近代史研究》,1995(3)。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在中国燃烧着战火的大地上,在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广大报人再一次担当起了“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历史责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继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办报高潮之后,办报又一次兴起了大规模的热潮,“文人论政”的传统也在这个热潮中走向顶峰。

一、上海:爱国报刊风起云涌,腥风血雨前赴后继

“七七事变”发生前后,上海抗日爱国报刊风起云涌,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救国的宣传中心。面对国难家仇,这些报刊以血战到底的勇气,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号角,对坚定抗日信心、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抗日新闻宣传史上值得永志的珍贵记录。

“七七事变”后,为宣传抗日斗争,上海书报杂志编辑界知名人士陈望道、顾执中、王芸生、樊仲云等50余人组织成立了上海编辑人协会,并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严饬前线各军不得退让,亟起全面抗战”^①。同时,有新闻界人士参与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统一领导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并创办了《立报》《救国周刊》等,开展救亡宣传工作。8月,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郭沫若的《救亡日报》先后创刊。国民党军队西撤后,鉴于上海租界内人心浮动与惊慌,《救亡日报》及时发表了《加强我们对“持久战”的认识与“最后的信念”》一文,呼吁上海人民“坚定信念,积极继续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使命”。9月,施复亮主持的《文化战线》,章乃器、夏征农等主编的《前线》五日刊,柯灵主编的《民族呼声》,金仲华、郑振铎等主编的《世界知识》半月刊和《国民周刊》,以及《救亡漫画》《烽火》等报刊相继创办。有10家小型报纸也联合出版了《战时日报》。

上海新闻界在抗日的炮火中,荟萃了全国新闻界的精英,他们

^① 陈进鹏:《抗战中的上海新闻界》,《文汇报》,2005-09-03。

中著名的有陆诒、范长江、孟秋江、赵超构、徐铸成等。淞沪抗战时，时任《新闻报》记者的陆诒就深入闸北战地，在战火中开始了记者生涯。范长江在抗日烽火中写成的《中国的西北角》，曾经七次再版，影响广及海内外。孟秋江采写的《大战平型关》中有一句话：“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民族的利益”，成了中国新闻记者的行为准则。《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抗日战争后期赴延安采访43天，他的报道《延安一月》被周恩来同志比作中国记者采写的《西行漫记》。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由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日军占领区的“孤岛”。残酷的法西斯新闻检查制度使30种在租界出版的报刊停刊，4家通讯社停业，“孤岛”新闻界一度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境地。为了摆脱日伪的新闻检查，爱国报人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以外商名义创办并出版了多份报刊，构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独特的“洋旗报”现象。截至1939年4月底，上海租界内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洋旗报”已达17种之多，总销量约为20万份。“洋旗报”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推动了波澜壮阔的新闻界抗日救亡运动，在特殊的环境下发挥了重要的抗日宣传作用。“洋旗报”的兴起，遭到了日寇的嫉恨和迫害，《中美日报》《新闻报》《申报》等被先后警告；《中美日报》《文汇报》《译报》和《大美报》等被先后勒令停刊和吊销登记证。特别是汪伪特工总部成立后，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洋旗报”报馆与报人，袭击、凶杀层出不穷，恐吓、绑架无日不有。在汪伪汉奸报刊上公布的通缉名单中，83人中有43人是报界人士。面对日伪的暴行，爱国报人针锋相对，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①

二、武汉：战斗在抗日洪流和思想的最前线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西移至武汉。在此后约一年的时间内，武汉成为当时新闻事业的中心。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在武汉出版的重要报刊有张季鸾的《大公报》、邹韬奋的《抗战》以及《世界知识》《战时文化》《武汉日报》等。由于这一时期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促,许多著名报刊只是一个过渡,我们特选择邹韬奋等创办的《全民抗战》予以阐述。

1937年8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迁到武汉,并在抗战一周年之际,与李公朴在武汉创办的《全民》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

该刊在《全民抗战的使命》中表明其任务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

此时的“战时首都”武汉,已陷入了日寇步步逼近的围攻之中。《全民抗战》在“全国动员!”“抗战到底!”的口号下,坚决、沉着地投入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开辟了“三日来的保卫武汉运动”“三时时事解说”专栏,出版了“保卫大武汉特刊”。^①

《全民抗战》满腔热情地报道抗日群众运动。当武汉发起三十万封慰问信运动时,它即发表了《参加写慰问信的竞赛!》文章;当武汉发动为军队和难民征募五百万件棉衣运动时,它即向群众叙说“天气渐渐寒冷,前方将士感到衣单履冷的痛苦”,还不断报道一些团体、组织的工作经验和成绩。《全民抗战》对国民政府调集百万军队、修筑工事、抵抗侵略军,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评价;对英勇抗战的官兵,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赞扬他们是“震动寰宇的民族战士”,他们的抗战事迹“真可以动天地,泣鬼神!”

《全民抗战》对抗战中存在的问题,则及时地予以指出并提出批评。首先是批评国民党内存在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指出中国人民

^① 汪苏华:《华文报刊在我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载《新闻前哨》,2005(9)。

的抗战已粉碎了日本“三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我们不愿做奴隶,不愿以此侮辱我们的祖宗先民,不愿以此残害后世子孙,唯一的途径只有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只要团结抗战,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其次是批判国民党顽固分子所谓的“民众运动有流弊,不如不办”的论调,指出群众运动的缺点不在本身,而主要在政府。“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不愿为国家尽力?去拼几个鬼子?”那些要取消民众运动的人,无非是要“民众冷静地站在抗战之外,抗战成为孤军的奋战,而最后的胜利将成为空话”^①。

为动员全民抗战,《全民抗战》还大力宣传持久战和游击战思想。有的文章还明确指出,即使武汉沦陷,还可以利用鄂中、洞庭湖、洪湖一带的有利地形,组织游击队,开展武汉周围的游击战,“给予敌人重大打击”。

《全民抗战》在保卫武汉的3个多月中,出版了40多期。它战斗在民族抗日的洪流里和思想战线的最前线,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齐战斗,是团结抗战的号角,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其销售量达30万份,发行地区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

三、重庆:抗战时期中国报刊卓越表现的标志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机关相继迁到重庆。作为国民党政府战时的“陪都”,重庆也成为国统区新闻事业和全国抗日宣传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战时重庆报刊围绕着“抗战救国”的宣传主题,以纸笔作枪弹,对社会进行“调适”,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报刊卓越表现的标志,赢得了包括外国舆论在内的各界的广泛认可。

战时重庆出版的报刊中,相当一部分是战前就已经在重庆发刊的,如《商务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等。《商务日报》在抗战初期就显示出积极的进步倾向。1944年后,其提出并坚持“在商言商”

^① 汪苏华:《华文报刊在我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载《新闻前哨》,2005(9)。

方针,通过报道物价动态,揭露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状况,支持鼓励工商界起来斗争,反对经济统制、贪污腐化,被誉为“工商喉舌”。《新蜀报》与《商务日报》齐名,并称“两家领袖报纸”。抗战期间,该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积极组织参与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开办“金刚钻”与“新蜀闲话”栏目点评社会;言论有独立见解,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舆论阵地。《国民公报》在抗战时期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民族正义感,坚定地宣传抗战救国,加之鲜明的编辑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支持。该报是居“中”立场,奉行“两面不开罪”的原则。用康心之的话说,就是“现在国内是两大政治势力在斗争,我们是民营报纸,如果开罪国民党,报馆就得关门,办不成报;也不能骂共产党,那样做报纸就没有人看,还是要关门”^①。

战时重庆报刊业的显著变化之一,在于一批拥有全国影响力、声名远播的报刊陆续迁渝。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时事新报》《新民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世界日报》等15家。1938年1月,《新民报》在重庆复刊,是抗战时期第一家由战地移渝的报纸。报社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积极延揽人才,“三张一赵”(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和赵超构)相继加入《新民报》,加上罗承烈任总主笔,报社阵容颇为可观,有力地支撑了《新民报》的发展。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政治气候下,《新民报》同人抱着“生存至上,事业第一”的信条,谨记“民族统一战线实高于一切”的宏愿,明确言论编辑方针为“中间偏左,遇礁即避”^②。由于在言论上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团结抗战的主题,抗战时期成为该报发展的黄金时期,为战后出现显赫一时的《新民报》“五社八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③“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重心开始南移,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等地出

① 陈彝孙等:《〈国民公报〉纪略》,《新闻研究资料》总27辑,1984年。

② 李鹏涛:《抗战时期四川报业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

③ 《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版。1938年12月,重庆版创刊,揭开了《大公报》在渝发展的序幕(《大公报》将在下一节专门论述,此处从略)。《新民报》《大公报》等被喻为“新式的汽划子”的报纸战时移渝出版,不仅直接改变了重庆报业的原有结构,而且在与本地报刊开展竞争合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表达着其办报理念与方式,为战时重庆报刊业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相对宽松,信息交流受到极度重视,读者群体不断扩大,诸多因素给重庆报刊业带来了新的“增量”。根据《四川省志·报业志》“附录”粗略统计,抗战时期重庆新创刊的报纸大约在80家,报刊数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①

四、香港及海外:呐喊汇香江,赤子爱国情

“九一八”事件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战,香港民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各种港报纷纷派遣记者赴内地采访,战事新闻、内地新闻在港报中大量刊出。“七七事变”后,香港报业发展很快,有30多家报纸同时发行。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些重要的内地报刊纷纷迁港出版或由报人到港再行创刊,主要有《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立报》《星岛日报》《大公报》等。一时之间,香港成为抗日宣传的集中地。1941年5月,《大众生活》正式在香港出版新一号。其在复刊词中宣布自己的办报方针是:对于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一切设施,“愿尽其鼓吹宣传之力”;但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现象,“我们也不能默尔无言”。^②《大众生活》的主要栏目有“社论”“论文”“读者来信”等。其社论均经编委会讨论,然后由邹韬奋亲自执笔;其论文多是关于国际国内与抗战有关的专题研究,作者都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

^① 《四川省志·报业志》“附录”,第677页。

^② 邹韬奋:《大众生活》复刊词,1941-05-17。

家;对于读者来信,邹韬奋经常亲自回复。《大众生活》起到了团结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共同抗战的巨大舆论作用,深受群众欢迎,每期发行数高达10万份。1938年4月,《立报》在香港重新出版后,不但保持了其原有的风格,而且还增加了介绍陕北、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文章,全面报道中国的抗日运动。《大公报》香港版在1938年8月创刊,以纪念上海抗战一周年。该报一创刊,就报道了香港民众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的活动。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大公报》予以无情揭露,并刊出不少文章予以痛斥,如《国府明令严缉汪兆铭》《一幕丑剧》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1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港创刊。该报坚持自己“抗战、团结、民主”的办报宗旨,在抗日反投降的大前提下,团结合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战期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汇集香港的华文报刊,发出阵阵抗日呐喊,有力地打击了敌伪的进攻,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这一时期,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热切地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各地华文报刊相继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华侨社会由抵制日货发展到出钱出力支援抗战。在抗战热潮中,华文报刊有了迅速的发展,发行量步步上升。一些报社纷纷罗致人才,加强采编力量;有的报社更新了技术装备,改进了内容和形式。如新加坡1939年出版的《南洋年鉴》有250万字;1940年《星洲日报》编印的《星洲十年》有1300余页,内容丰富,极具参考价值。这些都是海外华文报刊史上的创举。^①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日军所到之处,侨报被查封,财产被没收,一些华侨报人遭到迫害。但是,华侨报人并没有屈服,他们转入地下,与敌人继续斗争。在抗日战争中,这些来自五大洲的海外侨胞的抗日呐喊,汇成了时代最强音,成为打击敌人、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分布在

^① 汪苏华:《华文报刊在我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载《新闻前哨》,2005(9)。

世界各地的华文报刊,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三节 “文人论政”传统高峰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张季鸾的报刊活动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生于山东邹平,名炽章,字季鸾;笔名少白、一苇、榆民、一老兵等。幼年体弱口吃,但秉性聪明,勤奋好学,以擅长撰文著称。作文一挥而就,有“神童”之誉。延榆绥道陈兆璜颇赏识他的文采,“召之入署,命与子共读”。

1902年,在陈兆璜的资助下,张前往关学大师刘古愚在礼泉九峻山下主持的烟霞草堂就读,学业大有长进。期间,他喜读《明鉴》《文献通考》,并抄读《通考序》和《方輿纪要序》等典籍,这为他后来从事新闻报刊事业奠定了基础。翌年春,入三原宏道学堂继续学习。

1905年,张季鸾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堂补习日语,后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部分留日学生创办《夏声》杂志,张被推荐为编辑,积极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号召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与此同时,他还与其侄张崇基创办《陕北》杂志,从此开始了他新闻报刊事业的生涯,走上“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道路。

1911年,张季鸾自日本返沪,协助编辑《民立报》,为革命制造舆论工作。次年,经于右任推荐,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外交文牍事宜。他从南京拍发给上海《民立报》的有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这是张季鸾对于中国新闻事业作出的开拓性贡献。

孙中山解卸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张季鸾即离开南京,与于右任等在上海筹办民立图书公司。1913年,张季鸾和曹成甫北上,创办北京

《民立报》。“宋(教仁)案”发生后,他仗义执言,极力反袁,并揭露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善后大借款”合同,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成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之一。嗣后,张季鸾返回上海,应胡政之的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经常译载日本报刊的时论文章。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撰文抨击袁世凯,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1916年,袁世凯死去,他再度前往北京,主办《中华新报》。1918年9月,因披露段祺瑞政府为满蒙六路向日本大借款的消息,《中华新报》被京师警察厅封闭,张季鸾入狱。1919年,他南下担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1924年1月,张曾发表《列宁逝世》一文,赞扬列宁是无与伦比的“千古一人”。

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续办《大公报》,由吴鼎昌筹资并担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改组成立“新记公司大公报”。9月1日,《大公报》正式续刊。他在续刊号上发表社评,郑重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此后,他一直引领新记《大公报》同人实践这一方针,力主使该报成为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从而开创了他一生中从事新闻事业的鼎盛时期。张季鸾自担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后,除续办天津版外,还主持创办了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使《大公报》从最初发行量不足2000份发展到9700余份,并成为自成体系的有全国影响的大报。他还甘当人梯,对后进多加提携。范长江、王芸生、徐铸成、曹谷冰、金诚夫、李于宽、陆诒、徐盈、彭子刚、孔昭恺、蒋荫恩、孟秋江、王文彬、萧乾、许君远、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等名记者都出自新记《大公报》门下,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闻界的中坚,为中国的新闻报刊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1年,新记《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年度最佳外国报纸。《新华日报》赠送贺联一幅,文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横批为“同心协力”。17年后,毛泽东同志在与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人的谈话中还指出:“抗日战争是《大公

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毛泽东同志强调:“办报要听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谓而发。这方面要学张季鸾。”“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①

1941年夏,张季鸾病危,但仍不时指示新记《大公报》之言论方针,仍不时以时局情况见询。《我们在割稻子》中的“割稻子精神”^②,成为激励后方人民抗击日寇的精神力量。他在弥留之际,言不及私,唯谆谆以“敬慎将事,努力弗懈”勉励报社同仁。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逝世。毛泽东、吴玉章和林伯渠等特致唁电:“季鸾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会内会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毋胜悼念。”^③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致唁电:“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③在公祭大会上,周恩来等人特赠挽联一副:“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次,消磨了国士精神。”^④

张季鸾逝世后,于右任首先发起设立季鸾新闻学奖,以表彰他对中国新闻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44年,张季鸾的著述《季鸾文存》在重庆出版。胡政之在《季鸾文存》的序言中说:“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② 王芸生:《我们在割稻子》,《大公报》,1941-08-19。

③③④ 转引自《报界宗师张季鸾》,张季鸾新闻研究会。

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⑤

张季鸾自1908年在日本东京编辑《夏声》杂志至主持《大公报》笔政,前后达30年之久,共撰写了3000余篇文章。他将自己宝贵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在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他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涌现出的最有影响的中国近现代报刊政论家,堪称中国新闻界的一代大师。

第四节 《大公报》及张季鸾报刊思想评析

一、溯源:报恩主义与文章报国

张季鸾的办报活动可以明晰地分为两个部分:入主《大公报》之前15年,接办《大公报》直至其去世的后15年。但其办报思想则主要集中表现在后15年之中,这既是因为这份报纸的传统影响了他,也是因为他用自己多年的办报实践反过来影响了这份报纸。张季鸾的办报思想可以用两点来概括:一是他的“报恩主义”思想,二是他的“文章报国”愿望,这两点相互交融,影响了他的一生。

(一) 儒学“家国”思想的影响

张季鸾幼年曾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刘古愚,字焕唐,号古愚,“百日维新”中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关学源于北宋儒学大师张载,理论体系以“气本论”为核心,注重气节,主张“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学风,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与强调心性净化的心学在关学中实现了有机的融合。作为儒学的一个学派,关学继承了儒学的大部分价值观念,但是也与传统的儒学存在区别:一是崇尚气节,为儒家之隐者;二是强调躬行实践,注重“民胞物与”和“经世致用”;三是笃

^⑤ 胡政之:《季鸾文存》序言,《大公报》,1944-05-11.

实朴健,特别注重尊老尚礼。此外,关学学说中具有唯物主义成分,对佛、道两家关于“空”“无”的观点持批判态度。著名的关中三李(周至李二曲、富平李因笃、眉县李柏),都有一种隐逸的思想情趣。但这种“隐”与道家的“遁世”不同。道家的“隐”包含了很多的消极意味,而关学的“隐”仍然是儒家的,同时又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愚忠”,而是“造道之深,操志之洁”的儒者之“隐”。这种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哲学精神,对其弟子影响甚深。综观于右任、张季鸾等,他们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对于国家和民族怀有极为浓厚的历史责任感。在他们的心目中,“国”是“家”的放大,对于家族的责任和义务也随之扩展为对于国家的热爱和忠诚。“苟利国家,不求富贵”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政治意识促使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予以很多关注。张季鸾后来立志报国,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历办各报均获得成功,这些都与他受教于刘古愚是有很大关系的。

(二)传统报恩思想的影响

“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恩有君恩、亲恩、知遇之恩、知己之恩等之分。在张季鸾的一生之中,报恩应该说是他时刻铭记着的。正如他在《归乡记》中所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①“报恩主义”深刻影响了张季鸾的职业思想,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张季鸾已将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事业兴衰与国家荣辱完全融为一体。他在文章中动情地写道:“假若国家需要我们上战场,依法征召,我们便掷笔应征。不然便继续贡献这一支笔,听国家作有效的使用。”^②这种报恩思想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从积极方面看,这促使他走上爱国、救国的道路;从消极方面看,这又促使他后

^① 张季鸾:《归乡记》,《季鸾文存》第1册,第1页。

^② 张季鸾:《本报迁渝出版》,《大公报》,1938-10-17。

来为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而奉蒋为“国家中心”。

张季鸾自己受人之恩颇多,这使他养成了急公好义、慷慨助人的性格。名记者邵飘萍是他的知己好友,邵飘萍遇害后,其夫人祝文秀及其母生活困顿。张季鸾毅然将她们接到天津,自己接济、扶助她们母女的生活。他和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披露袁世凯卖国的《善后借款合同》,导致北京《民立报》被封,两人被捕下狱。后曹逝于狱中,张季鸾经营救出狱。其时,曹成甫之子曹谷冰尚少,张季鸾抚养他长大,并送其入上海同济大学读书。1919年曹谷冰进入张季鸾任总编辑的《中华新报》任编辑,1923年2月到德国留学。后来,曹谷冰凭自身的才干与王芸生一道成为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领头人。

(三)“报恩”还是“报国”?

研究者大多认为,张季鸾的“报国恩”,实际上就是报蒋介石的恩。而张季鸾认为:“报纸天职,应绝对维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智识,以裨益国家。”^①他认为自己是从国家、民族、百姓的利益出发来考虑他的言行的。我们认为,对张季鸾具体言行的分析,还是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历史背景。

从张、蒋二人的交往看,张季鸾和蒋介石的前两次交往都因文而生。第一次是1927年4月,张季鸾发表社评《党祸》,对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疯狂屠杀进步青年的行动极为愤慨。第二次是蒋宋新婚第二天,张季鸾发表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对蒋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可以看出,此时的张季鸾也还未把蒋介石看做一国之主。张季鸾对蒋介石看法的转折点出现在1928年。他因冯玉祥的引见初识蒋介石,后随蒋的专列同到北京,因邵力子、张群、陈布雷等的影响,张季鸾敏锐地判断出:蒋是新老军阀中唯一有实力统一中国的人。此后,张季鸾和新记《大公报》对蒋的论调便有所

^①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大公报》,1926-09-01。

变化。他在7月3日社评《欢迎与期待》中,称蒋“大义大勇,不愧为革命英雄”^①,言论与数月前慷慨淋漓的《蒋介石之人生观》大相径庭,此为张季鸾思想的转折点。

真正让张季鸾对蒋介石心存感激之情、产生知遇之恩思想的是两件事:一是1929年12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发出“求言诏”,电头即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一下子就把影响力局限在华北地区的《大公报》推到了全国舆论的中心位置,这自然让张季鸾感恩于怀。二是1931年5月,《大公报》举办发行“一万号”庆典,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寄来贺信《收获与耕耘》,称其“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大公报》因此受益良多,由此产生“知遇之恩”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后来,张季鸾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被尊为“国士”,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为王者师”。

对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报国无非两条路:要么“学而优则仕”,要么以“言论报国”、以“文章报国”。对于深受中国儒家正统观念影响的中国文人来说,他们往往把实现自己政治思想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身上。在他们看来,“忠君即是报国”。事实上,张季鸾一生为人、为文都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品德。其后期思想中对报业性质、报人地位的重新认识,就突显出其个性中诸如“家国同构”“忠君报国”等传统思想的根基。据王芸生回忆,张季鸾曾关照他:“我和蒋介石先生有交情,你写社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②

报国与忠君的统一,表现在张季鸾身上就是“国家中心论”,这一思想在“西安事变”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1937年12月13日,《大公报》在“电讯不通,莫知详况”的情况下,竟称张学良叛变,后又

① 张季鸾:《欢迎与期待》,《大公报》,1928-07-03。

②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见《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47页。

借助报纸的意见组合功能,对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倍加指责。18日,张季鸾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该信后被宋美龄、宋子文印刷数万份,用飞机运到西安上空散发,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季鸾和《大公报》欣喜异常,“连日要闻”版均为诸如《蒋委员长脱险飞洛,全国民众欢跃若狂》之类的报道。而比较同为民营报纸的《申报》对此的反应,却不似《大公报》这样激动。其原因在于:《大公报》是一份“文人论政”的报纸,而《申报》则是一份商业性报纸,两者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办报宗旨。此外,张季鸾的这种“正统”思想还表现在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在“西安事变”中,张季鸾对中国共产党就颇有微词:“共党于陕变有密切关系,现时更成共同负责之势,然则请觉其迷而期其悟……”^①

但我们应当看到,张季鸾对蒋介石的回报不仅仅是对蒋个人友情的知恩图报。综观张的许多评论,他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民族主义立场的。因为张季鸾认为,当时只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蒋介石为“国家中心”,强国御侮才可达成。而尽管张季鸾与蒋介石过从甚密,但当蒋试图延请他正式从政时,张坚决予以拒绝,始终保持了独立的民间报人的身份。

二、坚守:独立报人的理念

在张季鸾的办报思想中,独立报人思想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新记《大公报》如果没有张季鸾的如椽巨笔,没有他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的采集信息的能力,没有他深厚的社会关系基础,要想在短短两三年间即成为北方舆论重镇、不到10年即成为全国性的重量级大报,那是不太可能的。新记《大公报》续刊在一个白色恐怖、军阀混战的时期。其诞生之日,也是中国新闻界噤

^① 张季鸾:《对西安负责者之最后警告》,《大公报》,1937-01-22。

若寒蝉之时，“报界之厄运，至今日而极矣。军权压力，重于万钧；言论自由，不绝一线”^①。1926年4月，著名报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同年8月，《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枪杀。新记《大公报》选择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中复刊，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勇气，其中也不乏一个独立报人的职业精神。

（一）“四不”主义的基本准则

在新记《大公报》诞生前，中国近代报纸大抵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党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为党派利益而鼓噪，报纸充满乖戾之气。创办者并没有把办报纸作为一种独立的事业来办，只是作为党争的工具，如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报纸。一旦这类报纸的宣传目的达到了，报纸的使命也便完成了。另一种是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从经济利益出发来办报纸，充斥版面的是琐闻逸事、商业信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类报纸又显得过于安逸，如《申报》《新闻报》等。张季鸾痛感当时中国报界的种种不良现象：“且中国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无主张，遑言是非。”^②当时中国除了两三家报纸之外，其余都“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③。

鉴于此，厘清报纸的角色定位，是张季鸾首先要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改变“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的根本之道。1926年，他在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③也就是说，要做类似于西方新闻理论

①③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大公报》，1926-09-01。

② 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大公报馆1944年版。

③ 张季鸾：《新记〈大公报〉发刊辞》，大公报，1926-09-01。

中“第四权力”“守望者”的角色,要创办一份为国家进言、为民生呼吁的报纸。10年之后,他更明确地概括:“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①其言下之意就是,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的。要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张季鸾在《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言”的“四不”原则,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办报,为中国报业开辟了一条新路。

1. “不党”

所谓“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②从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张季鸾“不党”思想的含义是: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不成为党争的工具;等视各党,无成见;对各党行为不袖手中立,以至敌视各党各派,而是从国家、公民的立场发表评论。

辛亥革命胜利后,《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等自由,于是“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但癸丑报灾后,又历经督军团之祸、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直皖直奉战争、江浙卢齐之争等军阀战乱,当时报纸“或仰给于军阀之津贴,或为戒严法所劫持,其言论非偏于一端,即模棱两可,毫无生气”^③。

亲历那段历史的张季鸾,对之深有感触。他认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在说话时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张季鸾一生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他在日本留学时担任过《夏声》杂志主编,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同乡井勿幕几次劝他加入同盟会,均被他婉拒。毛泽东同志也曾经说过:“张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

①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1936-05-20。

②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大公报》,1926-09-01。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①

张季鸾除了归国之初,应于右任之荐出任过几个月的临时大总统秘书外,未担任过任何政府公职。他本人是这样,新记《大公报》内部的员工也是这样。三巨头之一吴鼎昌 1935 年出任蒋介石“人才内阁”实业部长之后,即发公告宣布退出《大公报》社。胡政之一直致力于新记《大公报》的经营管理,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组织。新记《大公报》内部也是禁止员工参加政党帮会的。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新记《大公报》天津馆外勤科主任张逊之,是国民党的特务,又有帮会背景,社会关系十分复杂。报馆主要负责人知悉此事后,果断对之予以辞退。但有意思的是,新记《大公报》倒是出现了一批共产党人,像杨刚、李纯青、徐盈、子冈等。而且,后来胡政之对他们有所觉察,却并未如对张逊之那样予以辞退。

18 年的报人生涯,使张季鸾深感国内政坛纷争之乱对报业的影响之巨。他将报纸的地位以公民而非任何政治团体出之,摆脱了康、梁以来办报者多以报纸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传统;同时也暗示着,办报是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报纸方针如何取决于报人的操守和信念,而不受制于外来压力。新记《大公报》在上海印行时,他更是明确地宣布:“同人尊重中华民国开国者孙中山先生之教训,而不隶籍政党,除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②1939 年 5 月,张季鸾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说:“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③

2. “不卖”

“不党”所阐明的政治独立是由“不卖”所秉持的经济独立加以保障的。所谓“不卖”,即“不接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

① 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载《新闻战线》,1988(5)。

② 张季鸾:《今后之大公报》,《大公报》,1936-04-01。

③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大公报》,1939-05-05。

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①。

张季鸾深知,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新记《大公报》成立之初,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约定,办报所需的资本由吴鼎昌一人筹措5万元股本,不向任何方面筹款,而且做好了本金亏完的最坏打算;吴鼎昌以资本入股,张、胡两人以劳力入股。这样,三人之间的约定就规定了新记《大公报》商业运营的原则。至1948年香港版复刊时,新记《大公报》公司共有资本6亿元,共6万股,分属48位股东。他的这种思想并非即兴发挥,三年前他在纪念《新闻报》30周年的文章中,推许《新闻报》能够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并将其成功的关键归结于将“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独能发挥在商言商之主义,不求津贴,不卖言论,不与任何特殊势力缔结关系,惟凭其营业能力,步步经营,以成今日海内第一大报,此诚难能而可贵也”。^②

回顾新记《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张季鸾认为新记《大公报》的成功及产生极大影响的原因在于:“本社营业,始终赖本国商股,不受政治投资,不纳外人资本,同人深感中国独立舆论之亟待养成,故进一步决定以微股独立经营,不为一般之募股,负责同人并相约不兼任政治上任何有酬之职务。”“其牢持短舵以与惊涛骇浪战者,惟赖其无成见,无背景,不以言论作交易。”^③

从本质上来说,《大公报》是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资金来源都是民族资本,从未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的津贴和资助。在抗战胜利前夕,为发展战后《大公报》事业,按当时官定牌价购买到20万美元用来购置印刷设备,以填补在抗战时期转辗搬迁时的设备损失,这纯

①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1936-05-20。

② 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3页。

③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1936-05-20。

属商业行为,完全不接受国民党的津贴或资助。张季鸾也一直以新记《大公报》的经济独立为荣:“除第一年入不敷出,耗用股本之外,未几即渐达收支适合。迩来工场设备之发展,皆以营业收入充之。现时工场财产,价值约四十万,皆自然发达而来者也。”且“同人自复刊以来,常以本报之经济独立,及同人之忠于职业自勉”^①。新记《大公报》的发展使张季鸾深深体会到,要办好一家报纸,真正发挥“文人论政”的作用,就得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制约,以有利于报社坚持自己的风格,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舆论,从而促进社会发展。

3. “不私”

“不党”与“不卖”所确立的报纸独立,目的在于将报纸作为社会公器,即“不私”。所谓“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②。

在张季鸾的理念中,报纸并不是一党或者一人之私有,而是独立的社会公共舆论机关,是一种公众事业;它主张经济独立,要求言论自由,这些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Media Professionalism)已经非常接近。正如张季鸾所说:“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介绍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私见,有偏私。”^③即使在战时,张季鸾也仍然坚持这一原则:“视察战线之纪事,那也要纯采客观的态度,就是一切以新闻价值为标准”^④,强调新闻报道不能掺杂自己的主观感受。

新记《大公报》成立之初,吴、胡、张“约定五事”:三人专心办报,

①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大公报》,1936-09-01。

②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大公报》,1926-09-01。

③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之辞》,《大公报》,1936-09-01。

④ 张季鸾:《无我与无私》,《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21页。

三年内谁也不许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报社由吴鼎昌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三人共同组成评论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讨意见，决定主张。文字由三人分别撰述。而张季鸾负责整理修正，意见有不同以多数决定，三人都不同时以张季鸾的意见为准。其后又分别在《大公报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及《大公报同人公约》中规定：“创办人及专在本社服务不兼社外有给职务者为社员”，“本社职员不兼任何社外有给职务，并不得经营抵触本社利益或影响社誉之业务”。^① 不过，作为学校教师和人民代表的兼职除外。

新记《大公报》作为一份持有中立性的民间报纸，毫无疑问，必然要求其记者对新闻事实的报道要避免记者自身原因所形成的报道上的倾向性，以体现“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宗旨。张季鸾提出了“无我无私”立场观。关于“无我”，张季鸾认为，“在撰述或记载中，竭力将我撇开。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但是要极力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②在张季鸾的时代，新闻本体论还远远未受到重视，政论似乎成为新闻唯一的呈现方式，他能这样地作一明确的区分和要求，实属不易。关于“无私”，张季鸾认为：“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凡束身自好的报人都能避免的。其比较不易泯绝者，是利于所亲、利于所好，而最不可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但是他也认为：“彻底的无私，难矣。所以最要是努力使动机无私。报人立言焉得无错，但只要动机无私，就可以站得住，最要戒绝者，是动机不纯。”^③

进而言之，张季鸾认为，全国舆论的养成，必须“收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尤须仰赖作为公众喉舌的报纸。具体做法有二：一是开放报纸作为公共论坛，各专门家和事业家可

①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9 页。

② 张季鸾：《无我与无私》，《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 年 6 月。

③ 张季鸾：《无我与无私》，《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 年 6 月。

在报上发表言论和互相辩论,只要在法律范围内,报纸忠实介绍而不加干预,让公众作最后的评判;二是发动公众参与报道,“中国革命之第一要务,为普遍调查民生疾苦而宣扬之,此固报纸天职,而力亦不逮,故必须望全国读者之努力合作,凡属真确见闻,随时不吝相告,期使本报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①。

4. “不盲”

“不党”“不卖”“不私”,谈的是报纸的立场和定位问题,落实到具体操作上,就要求“不盲”。所谓“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低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②。可以看出,张季鸾要求报人必须做到独立判断、充分考察、冷静探究、忠于事实。这是一种理性精神。

据新记《大公报》社论委员会成员李纯青回忆:“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所有一切宣传,几乎都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第三,《大公报》的社评作为该报的灵魂,也是独立的,‘不许极左极右的新闻言论漏过政治筛子’,‘编辑权力由中间思想的人执掌’。”^③

新记《大公报》和张季鸾的言论也许有这样或那样的倾向性,但是,那都是他们独立思考讨论的结果,并不存在党派之争。张季鸾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容易”。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

①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1936-05-20。

②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大公报》,1926-09-01。

③ 周雨:《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就“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①,并一直奉行不悖。正是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新记《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上始终保持公正理性的形象,发挥一般报刊所望尘莫及的社会公器的作用。

新记《大公报》虽然是私营报纸,但其始终坚持理性原则,从来没有因为媚于世俗而改变自己的立场。1931年5月,张季鸾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②对于这一点,胡政之在《回首一十七年》中曾大为感慨:“我们历来论事论人,都力求深刻切实,决不随俗唯否,纵因此干冒危险,受人攻击,亦所不辞。”^③“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报纸“缓抗”“明耻教战”论调引来的非议,^④张季鸾对胡政之说:“报纸是我们两人作的,我们只知道国家民族的真正利益,不知有报馆的利害;纵然因此而毁了事业,也是我成我毁,心安理得,我们不能但求多卖报而媚世取宠。”胡政之称“这是不盲主义的最高表现。其他许多文章,干犯时忌,开罪权要,都不过是此主义的发挥”^⑤。对此,张季鸾也深有感触:“同人十年来谨服职业神圣之义,以不辱报业为其消极的信条。……十年来中国报业蒸蒸日上,同人厕身其间,幸未辱及同业。”^⑥

“四不”原则勾勒了张季鸾理想报刊的基本轮廓:政治独立,经济独立,以报纸为社会公器,且秉持理性精神。虽然这是张季鸾在

① 傅国涌:《〈大公报〉三巨子——纪念〈大公报〉创立100周年》,载《世纪中国》,2002(6)。

②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1936-05-20。

③ 胡政之:《回首一十七年》,《大公报》,1943-09-05。

④ 张季鸾的“明耻教战”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有一定的市场(胡适就持类似观点),而且也有他的合理之处。但是,他的这种思想还是显得过于强调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的比较,而忽略了战争的主要因素或者说决定因素在于人,只要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对抗外侮,则战必胜之。从这点来说,张季鸾毕竟是一介书生,书生论政有时难免意气。

⑤ 胡政之:《回首十七年》,《大公报》,1943-09-05。

⑥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大公报》,1936-09-01。

署名文章中阐述的,却代表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的共同主张。它是对民国初期新闻界全面堕落的一种否定,也是新记《大公报》主持人对自身经验的一种总结,是中国资产阶级舆论界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二)“公、诚、忠、勇”的行动纲领

1937年初,张季鸾提出,言论界如果要享受言论自由,则自身发言必须“要公要勇要诚”;1941年初,张季鸾又总结出办报成功之秘诀“曰忠曰勇”。“公”“诚”“忠”“勇”四字主张,实际上是“四不”原则的延伸和深入阐述。但是,后者的提出,并不仅仅是“四不”原则的简单延伸。如果说“四不”原则是张季鸾对新闻事业理想追求的话,那么他其后提出的“公”“诚”“忠”“勇”则是居于新闻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即“四不”原则基于传统道德观念而又赋予其新义,“公”“诚”“忠”“勇”则是基于时代背景对中国新闻事业新使命的诠释;“四不”原则更多的是基于政治立场的考量,“公”“诚”“忠”“勇”则更多地表现为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的是对内而发,而后者是对外而言。

从“公”“诚”“忠”“勇”提出的时间来看,四字主张的提出主要是由于时势的发展、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公”“诚”“勇”提于1937年,“忠”提于1941年。前者提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其时,抗日战争爆发,国家机器都围绕着战争运转,各媒体的中心工作也是加强战事报道,进行战时宣传。因此,“公”“诚”“忠”原则的提出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公”,即“动机要公”,是指报道客观公正,言论不偏不倚,不以报纸谋私利。实际上就是“不私”原则的延伸。1936年4月,上海版《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发表社论《今后之大公报》声明:“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属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

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①1941年5月,《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章。张季鸾、胡政之在对美国民众作的《自由与民主胜利万岁》的广播词中指出:“同人相约不作政治活动,不求权势财富,亦不求虚名。……我们对全国任何个人或党派并不无说好或说坏的义务。除去良心命令以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的约束,我们在私的意义上,并不是任何人的机关报;在公的意义上,则全国任何人甚至全世界任何人,只要在正义的范围,都可以把大公报看作自己的机关报使用。”

“诚”,即“至意要诚”,是指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发表言论,以诚挚之心对待所有的读者,负责任地报道新闻。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面临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时候更需要全民一致,全国一心,如此方能取得最后的胜利。1937年2月,张季鸾发表社评《言论论自由》:“言论界人自身时时须作为负国家实际责任者,倘我为全军统帅,为外交当局时,我应如何主张、应作何打算,此即所谓责任观念也。”在此基础上,应力求避免“自身研究不清,或责任不明,政府是不肯说其是,盖欲免反政府者之相仇故;政府非自亦不敢鸣其非,而徒诿责于干涉之可怕”^②这些缺乏诚意的表现。张季鸾谈到:“我们以为不求权不求财,是士人常行,容易办,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因为办报都希望人爱读,读者越多越欢喜,名声越大越高兴,而危机也就在这里。因为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祸国家。”^③他代表新记《大公报》声明:“同人等愿本其良知之昭示,竭诚为调和疏解之呼吁,当尽可能,剖析事实,衡量厉害,不畏强权,不媚时尚,期以公正健实之主张,化全国各种感情思

① 张季鸾:《今后之大公报》,《大公报》,1936-04-01.

② 张季鸾:《季鸾文存》上册,大公报馆,1947年版,第241页。

③ 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大公报》,1941-05-05.

想上之歧异。”^①

“公”和“诚”要求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编辑抛弃私念,以新闻以报纸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办,而不是谋求私利的工具;它要求新闻人诚实守信,对所报道的新闻、所发的言论严肃负责;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对待读者。

1941年5月16日,张季鸾在为庆贺该报获奖的陪都新闻界盛大集会上致答词时,为青年同业谈报业成功之秘诀时提出了:“曰忠,曰勇”。“忠”和“勇”是指言论者一旦确立了自己的观点,并且认定了其正确性,就应该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勇于公之于众,接受受众评判;同时,“忠勇”更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忠”和“勇”。他指出,办报“须时时准备失败,方能做到‘勇’字。报纸失败有两种可能:一为与政府或当地官厅冲突结果而失败,一为与社会空气冲突致销路失落而失败。以本报为例,自十五年前开始经营,时时准备此两种失败”^②。他还说:“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消极地说,是反统制,反干涉。”^③此时,中国全民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关键的相持阶段,日本军国主义加强了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分化攻心政策,国民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蠢蠢欲动,陪都重庆弥漫着一股悲观气氛。张季鸾在此背景下提出这个观点,其中不乏深意。

(三)独立报人理念与政党报刊理念之区别及与新闻专业主义之联系

张季鸾对言论甚为强调,对报纸应起到的政治作用更加重视,这是否意味着张季鸾对报纸的认识仍与康、梁等一脉相承呢?研究成果表明,虽然都立志“言论报国”,但张季鸾的报纸观念与梁启超

^① 张季鸾:《今后之大公报》,《大公报》,1936-04-01。

^② 张季鸾、胡政之:《自由与民主胜利万岁》,1941-05-16。

^③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大公报》,1939-05-05。

已有泾渭之别,张的办报实践已进入了现代报刊的领域。特别是张季鸾将报纸定位为“采访事实、介绍舆情”的“国家公器”,跳出了康、梁时代视报纸为政治工具的局限。

梁启超认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报馆则其造之机关之最有力量者”。^① 所以,与其说梁启超是一个报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鼓动家、舆论宣传家更为确切。他在前期以报刊为阵地宣传维新思想,后期则沦为保皇党的喉舌。他更注重的是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强调“去塞求通”,但是他的沟通,主要是对封建君臣联系的沟通,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梁启超的新闻理论的核心是封建社会的“喉舌”论,对民国初年政党报刊的泛滥有很大影响。

而对张季鸾来说,报业独立于政治势力,乃现代社会中公民之独立舆论机关,所起到的是沟通社会各界,养成舆论的作用。他提出的“四不”原则,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favor, Withoutfear)的纲领,因而他认为“中国报业是走着英美路线”^②。故而“四不”也被中国现代民营报纸视为圭臬,并开启一代报业先河。

张季鸾主持新记《大公报》期间,努力奉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但是,中国远未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程度,中国报业也远未达到西方报业的发展阶段。中国资产阶级报刊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承担的任务,均与西方报刊不同。因此,张季鸾在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办报原则时,也在“走着英美路线”的大前提下,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他虽然标榜“超党派”,但绝不主张报纸超政治、无立场。他提倡报纸“对政治,贵敢言”,他的新记《大公报》社评也几乎涉及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而绝不像当时一些资产阶级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②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大公报》,1939-05-05。

报刊那样回避政治问题,发表些不痛不痒的言论(被讥笑为“报眉毛”)。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即维护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抗战时期则是维护民族利益)。他的最终理想是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社会制度,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基于此,他反对中国“赤化”,寄希望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基于此,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现象,但又极力维护蒋介石的无上权威;基于此,他在抗战期间主张国共合作,坚持抗战,但又参与反共高潮;基于此,他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不满,直言不讳地予以批评,但又在抗战爆发后在“保卫民族自由”的旗号下,鼓吹一切报纸服从国民党检查等。

所以,张季鸾是把“客观公正”同鲜明立场,把“四不”原则同“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结合起来的。如果不考虑这些特点,就会将“四不”原则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报刊在其发展到成熟阶段时期提倡的“客观、公正”原则,而看不到“四不”原则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了。

三、流变:“文人论政”的情结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入世”精神与时代的嫁接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清议”的传统,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倡清议,进直言”“文谏死,武战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这些思想都根源于儒家的文化传统。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教就作为国教而备受推崇,其秩序和“入世”的观念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和广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千百年来,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以儒家的原则为依归,对国家和民族一直怀有深厚的情怀。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报国与忠君,如晁错对汉武帝的削藩策等;另一方面,又不惮为帝王师,如魏征对唐太宗的十诫等。如果说

历代史官、言官的设立为“清议”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代表着官方的“文人论政”;那么战国的“处士横议”、两宋的“书院议政”以及明朝的“结社议政”等,则代表了民间的“文人论政”。这一传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特别是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之际,这种“清议”传统和“入世”精神往往能做到高度的统一。广大知识分子常常以笔为枪,以天下为己任,表达自我的爱国诉求,将自己有限的能量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报国洪流中去。因此,言论报国、文章报国就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并成为他们热切追求的理想和勇于担当的责任。

进入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知识分子的这些思想有了更深刻的体现。但是,由于有清以来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制度的严厉限制,广大知识分子以言论政、言论报国的渠道少之又少,清末这种限制更是变本加厉。一方面,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而政府几乎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广大知识分子满怀报国激情,却找不到合适的传达和宣泄的场所。这时,西方报刊特别是传教士报刊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启迪,其传播形式特别是所载言论的巨大影响,恰好切合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之急需。由于某种先天的相似性,“清议”传统自然嫁接到了报刊这一新的载体上,并通过这一近代的传播形式,在逆境中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近现代以来“文人论政”的滥觞和主要表现。《循环日报》《昭文新报》等先行者开始将理想付诸实践。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又出现了《万国公报》《时务报》等著名报刊。“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明确提出了“纵民开设”报馆的建议,这成为“清议”传统与近代“文人论政”关系密切的生动注脚。

中国资产阶级报业的发展,除了具有资产阶级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外,还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用张季鸾的话说,这个特色就是“文人论政”。1941年,新记《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最佳外国报纸。张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写道:“中国报原则

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①张季鸾认为,报纸仅仅做到客观地登载新闻,只能算是“无负社会”,“然只此而止,其奈此混乱新邦何乎?”^②他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某些报纸那种仅刊新闻的明哲保身的做法,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充分发挥报纸评论作用的主张:“客观记载,欲求其详;主观论断,更期其勇。”^③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④。

《循环日报》迈出了“文人论政”的第一步。“特别是王韬每天发表的那些评论,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对中国言论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他之前,中国文人固然就有‘清议’的传统,但只有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文明转型之际,他才在这一传统中注入了新的生命,赋予其新的形式”^⑤。自此以后,文人的出路也不再仅仅是“学而优则仕”了,文章报国的志向越来越为后来的文人知识分子所认同。王韬的这种努力,终于开创了一个被新闻史家所称誉的“政论”时代。而这个政论时代的主角便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包括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罗隆基、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人。他们的办报方针及旨趣反映了那一历史背景下,众多爱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独立、真理和激浊扬清、忧国忧民的无私情怀。这种追求,经过他们的接续,燃烧了近一个世纪。

(二)“文人论政”内涵的不断深化

著名学者傅国涌认为,近代以来的“文人论政”表现出如下几大特点:一、公正、客观、理性;二、论政而不从政,公开批评而不介入权力之争;三、富有责任感,勇于负责;四、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五、笔锋常带感情。^⑥张季鸾能被称为“文人论政”的典型,除了具备以上一般

① 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大公报》,1941-05-05。

②③ 张季鸾:《季鸾文存》附录,天津大公报社1944年版,第4页。

④ 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文人论政”的特点之外,更有其迥异于别人的特征,“文人论政”的内涵在张季鸾这里得到了不断深化。

一是张季鸾使“文人论政”理论化。张季鸾提出了著名的“四不”原则。“四不”原则的核心理念就是独立性。“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分别凸现出的是政治、经济、思想的独立。有了这个基础,新记《大公报》才能做到追求自由的新闻思想。但是,“四不”原则只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当时的舆论环境允许“四不”原则的提出,说明言论钳制还不是那么厉害。但提出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困难了。一厢情愿也不行,政府对言论控制的松紧度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说,“四不”原则不仅仅是张季鸾办报经验的总结,也是民办报纸在那个时代的一种求生存、求发展的策略。这样,“文人论政”就可以在一定的框架之内进行。“四不”原则不但是行为规范,更是张季鸾“文人论政”的精神守则,它使“文人论政”理论化,体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理性操守。

二是“论政”新闻本体的逐渐回归。张季鸾关于“论政”的新闻本体的逐渐回归,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文人办报,以人与文来号召读者,人事沧桑,时代推移,新闻纸又进入了本体新闻的时代,这是主观的因素。客观方面,则因:一为北伐以后,国内言论趋于统一,政论之争日少,便发展到‘以新闻争一日之短长’的时期;二是外国通讯社纷纷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例如,英国的‘路透社’,日本的‘电通社’、‘东方社’,俄国的‘塔斯社’等,然对于消息的报道不一,各有各的说法,很令国内困扰。于是,国内各报纷纷设特派员之职,例如中央党部办的‘中央社’及民间的‘申时社’,均于此时派出大量通讯员赴各地采访消息,以供国内报纸采用,这才导致新闻业由注重舆论时期而进入写实新闻时期,并由单纯的报

道,而进一步加以分析、研判、观察,而有特约通讯的专栏兴起”^①。在发展的时代面前,张季鸾的论政也不例外,它已经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时效性大大增强。这样就避免了空谈,把评论与眼前的现实联系起来,从而使报纸有了即时的影响。新记《大公报》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北方乃至全国的舆论重地,与张季鸾发表的时效性比较强的社论是有极大关系的。

三是言论自由成为报刊角色定位后最重要的诉求。张季鸾指出,言论自由“为立宪国民必须之武器”^②。1929年,张季鸾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一文中,首先论证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吾人敢望各级政府机关自身,根本上以善意对言论。”^③他认为政府对言论界采取宽大政策,至少有三大好处:不断贡献意见,使政制得以完善;随时进行监督,使失误得以纠正,恶吏得以惩处;抒发民意,减少怨毒,使少数煽动者难施其伎,以保社会安定。1933年后,针对当局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新记《大公报》表明了基本态度:首先,政府必须依照法律,保障公众和报业应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其次,政府实行新闻检查,“其表现之方法,应依经常之法律,不依临时之命令”^④。最后,言论自由受限,系由现实情势所迫,政府实行检查依法仍应从宽不从严。张季鸾还在法理上论证了言论自由的神圣地位:“保障言论自由为各级政府本身固有之职责”,“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⑤张季鸾有一句话颇得英人弥尔顿古典自由主义的神韵:“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表现于报纸。”^⑤

① 楼榕娇编著:《新闻文学概论》,黄天鹏校订,中国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87页。

② 张季鸾:《季鸾文存》第一册《论言论自由》,天津大公报社,1944年版,第240页。

③ 张季鸾:《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大公报》,1929-12-29。

④⑤ 张季鸾:《论言论自由》,《大公报》,1937-02-18。

⑤ 张季鸾:《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大公报》,1936-04-02。

四是强调服务功能是报纸的重要功效之一。在张季鸾看来,报纸不仅要服务一般人民群众,更要在必要时服务于社会、国家、民族。他认为,“现代报业除发行报纸外,应为社会实际服务,凡社会应倡行之事,报纸宜为其先锋或助手”^①,“报纸为人民共用之工具,凡各地疾苦,各界烦闷,皆宜勉为宣达,以期政治日新”^②,“必不避一切艰难,以可能的最大努力,积极为国家社会服务,以期不负读者的期望”^③。新记《大公报》的服务有两种:一种是社会服务,这种服务多带有人道主义援助的性质;一种是国家服务,当国家陷入情急危难时,以报纸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无偿服务。但在其服务的意识里,具有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包含着某些顺从思想。不过,照他的观点,这只是特殊场合的一种权宜之计。“本来,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说不到言论自由。在平时,报纸要争新闻,这是为着事业,也为着趣味。但在这国家危辱关头,这些问题,全部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国家作战,必需宣传,因为宣传战是作战的一部分,而报纸本是向公众做宣传的,当然义不容辞地要接受这任务”^④。

(三)从“舆论独立,言论自由”到“服从国政,接受统制”的转变

我们知道,主导张季鸾前期报刊思想的是受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思想影响的职业报刊理念。抗战爆发后,张季鸾报刊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其文章言论由效仿西方的“舆论独立,言论自由”转为回归传统的“服从国政,接受统制”。这种转变并非张季鸾思想流质易变。在全民性抗战的大背景下,作为时局浪尖上的大报主笔,张季鸾顺应形势,提出“服从统制”的办报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其理由如下:

①③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大公报》,1936-09-01。

④ 张季鸾:《本报迁渝出版》,《大公报》,1938-10-17。

⑤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大公报》,1939-05-05。

一是在对报纸性质的认识上,经由了“独立的舆论机关”到“国家的宣传机构”的转变。

张季鸾早在1924年为《新闻报》创办30周年写纪念祝辞时,就称赞该报将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①。这种视报馆为独立职业的思想也被张季鸾带到了《大公报》。

然而,正如张季鸾曾感言的,“现代任何事业,无不受社会连带原则之支配”,像新记《大公报》在舆论界名噪一时、南北为之翘楚这样的报纸,也无法幸免地为国难所累。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津、沪版被迫关闭,并先后辗转汉、渝、桂、港等地,报纸的商业性受到严重打击。这就使张季鸾深切地体会到,国家不保,任何个人事业皆难立足。作为一位有着深沉爱国情感的知识分子,他沉痛地反思战时某些报馆消极、一成不变的工作方式,并尖锐地指责某些养尊处优的报人,国难临头,却“一面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②。他认为,积极为国家作抗战宣传是战时报纸义不容辞的责任。1938年10月,张季鸾借新记《大公报》被迫迁渝出版之机发表言论:“抗战期间,一切私人事业,精神上都应认为国家所有。……各业皆然,报纸岂容例外。”^③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张季鸾进一步明确了转变的态度:“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舆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治的公共宣传机关。”^④

二是在对政论时评的认识上,经由了“言论自由”到“言论统制”

① 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见《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3页。

② 张季鸾:《我们有什么面子》,《国闻周报》,1935-01-17。

③ 张季鸾:《本报移渝出版》,《大公报》,1938-10-17。

④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大公报》,1939-05-05。

的转变。

张季鸾认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拘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①他的这种自由言论思想在创办新记《大公报》时期有了进一步印证。他认为报纸的职责如果完全是为政府作宣传，一则会造成“人民神经久而麻痹，反使宣传失效”，此于政府不利；二则会使“全国言论界单调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失读报之兴味，最后促使报纸失其信用”，此于报纸不利；^②三则由于报纸乃“国民之耳目也，倘其所欲言者，报纸不能登，其所欲知者，报纸不能载，是耳目闭塞矣”，此于人民不利。简言之，其思想的核心就是“言论自由，反对统制”。^④然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严峻的形势使张季鸾个人的民族情感骤然迸发，其言论态度也随之急剧直转。他反思道：“夫自由云者，最浅显释之，为不受干涉，其表现为随意发表。……国难如此，不论为日刊、定期刊或单行本，凡有关国家大事之言论，其本身皆负有严重责任。……言论界人自身须作为负国家实际责任者，……此即所谓责任观念也。”^⑤同时，“要保卫民族自由，必须牺牲许多部分的个人自由。”责任重于自由，个人服从民族。张季鸾审时度势，申明大义，认识到“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更说不到言论自由问题”。^⑥因此，新记《大公报》一反往日“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的傲气，表示“在汉在渝，都衷心欢迎检查，因为生怕记载有误，妨碍军机之故”，并且“精神上将这一张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制使用”。^②

三是在道德观上，经由了“忠于‘主义’”到“服从统制”的转变。

①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传》，见《徐铸成传记三种》，学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②④ 张季鸾：《国府当局放开言论之表示》，《大公报》，1929-12-29。

⑤ 张季鸾：《论言论自由》，《大公报》，1937-02-18。

⑥②③④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大公报》，1939-05-05。

张季鸾强调,报人应是“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主义职业人士。

为了摆脱党人办报的诟病,张季鸾等人早年为新记《大公报》订下了“四不原则”作为该报的指导思想。这“四不原则”正是自由主义的缩影,也是张季鸾积极倡导麾下报人所应遵从的职业规范。然而,当新记《大公报》的事业行至抗战爆发后,张季鸾在伤国忧民之际也在反思自由主义在战时的消极影响,因而对报人的地位开始重新思索。他感言:“自从抗战以来,时时觉得自己的存在太渺小了,也太无用了。人们常夸奖言论界,一支笔抵多少毛瑟,然在这两年大战中,实在感觉一张报还不如一个兵。”^⑤ 国难当头,“报人必须与前线将士一样,要自认在抗战工作中有其小小岗位”,要“忠纪律,守统制,时刻本着抗战建国纲领工作。”^⑥ 对战地记者,他更是反复强调:“应当先自认识发表新闻的性质范围与程度,使我们全国的宣传都确实有利于抗战。”^⑤ 从“反统制”的自由主义到“守统制”的服从思想的转变,可以说是张季鸾传统思想的回归。尤其是他在晚期的文章中赞誉道:“在上海等处为国尽忠的中国报人,在道德上是世界第一等!”而这种道德“是中国国民的志气,也是中国报人的精神。”^⑥ 很显然,这一时期张季鸾对报人精神的诠释,已偏重于“服从”“尽忠”等杂糅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了。

(四)“职业报刊”理念的追求

后人归纳张季鸾的办报理念时,一般将“文人论政”视为其核心,而“言论报国”就是其直接体现。张季鸾的报刊思想是否能为“文人论政”所概括,我们在前面已有论述,但就“言论报国”而言,未尝不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报人的职业追求来解读。

在他看来,报人应该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职业追求,应该力求贡

^⑤ 张季鸾:《赠战地记者》,《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年5月。

^⑥ 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大公报》,1941-05-15。

献于社会、影响于政治。征诸报业,应该是报道新闻,发表言论,以为公众之喉舌。张季鸾还希望现代报业除刊行报纸外,还应为社会实际服务,凡社会应倡行之事,报纸宜为其先锋或助手。^① 故新记《大公报》创刊 10 周年时,设立了文艺与科学两个奖学金,以回报社会,此所谓“新闻救国”“言论报国”。

对张季鸾这一代报人而言,多灾多难的中国是其无可回避的现实,而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是断然无法放弃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一目标的追求的。显然,这迥异于美国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批职业报刊所面对的历史环境。因此,在张季鸾身上,其职业追求体现出了更多现实考虑和中国特色。

回顾《大公报》创办之前的中国报界,清末报纸的大发展,是中国衰亡的危机引发爱国志士以报刊为斗争武器的结果。英敛之创立《大公报》,因为直言谈论而倾动一时,言论报国之风至清末达到高潮。但民国建立以来,受军阀政治的高压影响,报狱迭兴,存留下来的大报或寻求外力庇护,或缄默主张从事商业经营。张季鸾不禁慨叹:“近十余年来,除革命机关报之非商业性质者外,求如清末报纸之慨然论天下事者,反不多见。……所谓言论报国者何? 际兹纪念,悲愧交并矣。”^②对他而言,新记《大公报》创立之初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新闻报道的数量与水平,而是独立言论主张的有无。1923 年,纪念《新闻报》创立 30 周年时,虽然曾担任其记者的张季鸾肯定《新闻报》能较真实地记录、反映社会现实,但《新闻报》仍然称不上是他理想的报纸。他给《新闻报》提出的希望是:不仅仅要更加全面、快速地报道新闻,更加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而且要向欧美大报学习,积极发表自己的主张观点,引领全国舆论,成为像英国《泰晤士报》那样有影响的大报。^③

①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大公报》,1936-09-01。

②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1936-05-20。

③ 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见《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 3 页。

张季鸾是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想源流影响的知识分子,其毕生以新闻为业,追求报纸的独立、自由与职业化。他认为,报纸是独立的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对外诉求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对内主张经济独立和专业规范的职业报刊。报纸必须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良好的运作机制保障,它的从业者已经形成了职业共同体,有区别于其他行业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规范加以约束,并有着自身的职业追求。这种思想已经具有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的轮廓,这可谓中国报刊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就这些特征而言,张季鸾所阐述的报刊理念可以用“职业报刊”名之,而有异于同人报纸或政党报纸。

四、旗帜:“文人论政”的社评风格

报纸是报人思想的载体,报人的思想则是报纸的灵魂。因此,研究报纸的精神实质,在于研究者能够透视报人尤其是报纸核心人物的思想理念。对于新记《大公报》这样一份“文人论政”的报纸来说,把握核心人物张季鸾的思想和他的社评尤为重要。从参加《民立报》到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张季鸾驰骋报坛30年,所写评论不下3000篇,其中尤以新记《大公报》社评的影响最为深远。这些社评造就了张季鸾的舆论品格,并使其享誉报林。

(一)责任与“敢言”

张季鸾所处的时代,外部列强环伺,内部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境。这一时期,他撰写了大量揭露社会黑暗、抨击腐败政治的评论。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是被称为“三骂”的社评。

一骂吴佩孚。1926年12月,张季鸾发表的社评《跌霸》,被视为“为吴佩孚与直系军阀送终之作”(吴廷俊)。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综论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

之,但有气耳。”^①该文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一个崇尚武力而又置人民于不顾的独夫民贼形象。二骂汪精卫。1927年11月,张季鸾发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文章用大量篇幅历数汪反复无常的举动之后,对其本质揭露道:“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②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张季鸾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锋进行了笔伐,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③此骂使读者看清了蒋氏的灵魂和人生观,令人拍案称快。

除此之外,张季鸾还写了大量“敢言”的社评。如《勿嗜杀》,批判了直系军阀的杀戮本性;《北洋系之末路》给整个北洋军阀判了死刑;《党治与人权》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呼吁停止“军治杀人”;《中国文明在哪里》把关心民众看成中国文明之所系;《论造成廉洁有能之政府》抨击了国民党军政界种种贪赃枉法的现象等。

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张季鸾不仅敢于揭露黑暗现实,还勇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1928年元旦发表的《岁首辞》一文中,表达了一个旧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即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且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为之奔走呼吁。尽管他的政治理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法实现,但他的主张毕竟代表了那个时代部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愿望。

(二) 爱国与抗日

张季鸾留学日本期间,对日本的历史和明治维新后的变化以及

^{①②} 《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7页。

^③ 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社会思潮、风土人情等作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这为他以后的办报生涯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视野。在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的15年间,他又亲眼目睹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一步步发展为侵略行径的过程,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抗日战争仍处于僵持阶段。因此,在张季鸾的社评中,有关日本问题、中日关系以及抗日战事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张季鸾凭借其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了解,在《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等社评中,已经觉察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可惜没有能够引起当权者足够的重视。“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季鸾撰写了大量有关中日关系的社评,一方面抗议日本侵占东北的“侵略暴行”,另一方面谴责国民党当局“误国殃民”。在《愿日本国民反省》一文中,他对日本提出警告:“吾恐日本将来之损失,将大于中国几倍,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复,甚至永久不能恢复。”^①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张季鸾是鼓励军民抗战的。但考虑到中国国力弱小,张季鸾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主要本着隐忍持重的态度,主张“明耻教战、救亡图存”。直到南京保卫战,张季鸾和新记《大公报》的言论前后出现了重大变化,社评主轴成为“一心抗战,不知其他”。在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张季鸾写了大量的社评文章,如《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最低调的和战论》《为匹夫匹妇复仇》《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等,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周恩来同志曾评价《大公报》是一贯爱国的,是坚决抗日的。尽管张季鸾在抗战前后的某些主张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他十分重视抗日,这是内容的主流;同时他也是爱国的,这符合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张季鸾的社评鲜明地体现了这两点。

^① 张季鸾:《季鸾文存》上册,大公报馆1947年版,第49页。

(三)“拥蒋”与“国家中心论”

张季鸾对国事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多发表于抗战前及抗战初期,其中以“西安事变”中《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和“晋南事件”中《读周恩来先生的信》两篇最有影响,也最受疵议。

关于“西安事变”中新记《大公报》的言论表现,前面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关于“晋南事件”中新记《大公报》的言论表现如下:抗日战争期间,张季鸾一方面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在“国家中心论”思想的指导下,也存在着盲目拥护国民党、诬蔑共产党的情况。中条山之战后,新记《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斥责中国共产党“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①周恩来当即致信张、王,对文中的不实之词予以反驳和解释。23日,新记《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后背离了“国家中心”,对国家的贡献是“负号”的,而只有拥护蒋介石这个“中心”,抗战才有胜利的希望。历史和事实已经表明,张季鸾视蒋介石政府为“正统”而顶礼膜拜,而视中国共产党为“异己”而横加指责,这是他犯的一个大错。

说到张季鸾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关于“小骂大帮忙”的论争。对于“小骂大帮忙”之说,新记《大公报》的说法是这样的:“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假使批评为难,则帮忙时也就乏力。”^②事实上,张季鸾既然倡导“文人论政”,就必然竭力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事论事,而不去考虑所骂的对象是谁,也就无所谓“骂”谁“帮”谁的问题。加之从世界资产阶级报业发展的范围来看,“小骂大帮忙”是资产阶级民办报刊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实现其舆论监督功能的必然表

^① 王芝琛、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② 王芸生:《今后的中国新闻界》,《大公报》,1943-10-01。

现。那种纠缠于“小骂”还是“大骂”的论争,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

(四) 报人理想与政论园地建设

张季鸾作为我国新闻史上杰出的报刊政论家,他的社评更是我国新闻评论中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些社评不但能直言不讳地触及问题的实质,进行鞭辟入里的议论,而且能用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的言词打动读者,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张季鸾创造了报纸和社评的品牌与影响力,这对于今天的新闻界仍具有显而易见的借鉴意义。

对当时中国报界的种种不良现象,张季鸾痛下针砭。究之“民国以来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他认为“其原于环境者半,原于己身者亦半”。^① 而根治这种弊病的方法,就是他所提出的“四不”原则,其实质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这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对国民党的新闻制度,张季鸾总体而言持否定态度。抗战以前,他曾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论言论自由》等社评中,多次对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提出批评。

张季鸾十分重视报纸和报纸评论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并将其视为中国实现英美式资本主义的重要武器。新记《大公报》在1940年5月的社评里道出了其中精义:“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②

此外,除社评外,新记《大公报》另一种“文人论政”的园地就是“星期论文”。1931年1月1日,新记《大公报》在要闻版上以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

①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大公报》,1926-09-01.

② 张季鸾:《上层知识分子的责任》,《大公报》,1940-05-10.

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这一栏目的设置，使《大公报》扩展了与外界的联系。从区域上讲，影响方面及北京、上海等地；从对象上讲，增强了全国著名学者对它的关注，大大提高了新记《大公报》在文化界中的言论地位。

“星期论文”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作者以大学教授为主；二是这个栏目的思想基调仍为自由主义观念。这两个特征决定了“星期论文”对时政的观察与批评是以学者的立场为审视点的，由此形成论题的广泛性和观点的歧异性，也带有鲜明的“知识精英”的色彩。但他们都能以独立的言论姿态表达对中国与世界的看法，这一点可以说是新记《大公报》的成功之处。

从“星期论文”存在的 15 年间所发表的“论政”文章看，其主要论题大体上主要有两点：

第一，“民主与专制”，这是“星期论文”讨论最多的论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在新记《大公报》的社评中，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论题。对于这种一致性，只能用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来加以解释。据有关统计，“星期论文”存在的 15 年里，共发表文章 750 余篇，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以这个主题为讨论对象的。这些讨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人权与约法”争论的延续。1934 年 12 月，丁文江在“星期论文”栏上发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居然赞成国民党可以“试行新式的独裁”以救国。此论一出，立即遭到张奚若、胡适等的反对。张以《独裁与国难》与之辩驳，胡则以《从民主与独裁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一文表明自己的“民主宪政”立场。此类论争在“星期论文”中是屡见不鲜的。

第二，社会经济问题，这是“星期论文”中常见的论题。该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民生状况，而且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在社会经济措施方面的无能。1942 年 5 月，西南联大的伍启元、费孝通等 9 位教授，联名在“星期论文”上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这批经

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学者的社会良知和学术素养,分析了当时物价上涨的高度、速率等状况及其原因,指出这种剧烈变动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1945年5月,戴世光、费孝通、伍启元等再度联名发表《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文中特别强调,社会经济的危机将使“社会经济革命恐终将无法避免”。这些教授们是言之不虚的,后来国民党的溃败,除有军事因素外,社会经济混乱应是另一原因。

总之,社评与“星期论文”充分扮演了新记《大公报》“文人论政”的角色。它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今天看来,虽如尘埃而去,但并非毫无反思的价值,毕竟这种思想理念“对中国社会的总体设计未能充分满足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历史的天平不向它倾斜自有其内在的理由”^①。

第五节 张季鸾报刊思想的历史影响

著名学者顾颉刚说过:“我回顾几十年国内的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路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起了这个作用。”^②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新记《大公报》所占的舆论权威时间最长,可信度最高,影响力最大,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张季鸾。陈纪滢说过:“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把‘文人论政’的地位提高到最高程度,也开启了中国新闻界与新闻从业人员受到国际重视的先端。”^③陈纪滢认为张季鸾的文章比梁启超的文章对国家的贡献更大,影响更深。台湾学者赖光临也认为,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优秀知识分子感于国势的威迫,

① 胡伟希等:《十字街头与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页。

③ 陈纪滢:《报人张季鸾》,中国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1967年版,第33页。

“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从事言论报国,以致近代报业脱胎换骨。近八十年以来,报业人才辈出,“惟谈及‘文人论政’确能对国家当局产生直接影响,除了张季鸾氏,还未见有第二人”。^①

笔者认为,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应当包含以下内容:张季鸾是一个独立的报人,他的“四不”原则体现了他对民营报纸理想境界的追求;张季鸾又是一个文人,“文人论政”是传统和现实赋予他的使命;张季鸾还是一个“政治的人”,论政决定了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独立报人的立场又促使他与政治保持距离,论政而不参政。这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使得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很复杂,有时似乎还显得略有矛盾。但一个不能忘记的前提是,张季鸾是一个历史的人,要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对张季鸾也是如此。因此,对于张季鸾个人的评价,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张季鸾报刊活动与报刊思想的历史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它标志着近代新闻评论“报章体”的结束和现代新闻评论的开始。尤其是他的社评,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中间阶层,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就国统区而言,新记《大公报》在当时所占的舆论权威时间最长。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家局势有什么重大变化,人们都要看《大公报》如何表态,这说明它的言论在读者心目当中的可信度高、影响力大。而新记《大公报》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张季鸾的社评。他的社评大多结合当天发生的新闻,提出一定的看法和意见,有时还把不能发表的“内幕”新闻,暗中在评论里透露出来,读者常从社评里去找新闻。徐铸成曾评价张季鸾的社评:“字字句句,质朴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土崩瓦解’之局。他的一声

^① 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见《新闻界人物(四)》,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

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①

在延安,毛泽东同志曾对《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②而在南京,“蒋介石从不看《中央日报》,也不看《新华日报》,但每日必读《大公报》。在他的办公室、公馆和餐厅里各放着一份《大公报》,以备他随时翻阅”^③。国共双方都对《大公报》如此青睐,显然跟张季鸾的社评有极大关系。他的同乡好友沈钧儒曾有一段贴切的评论:“季鸾对于蒋的思想,揣摩得是很透彻的。在国民参政会初期,青年党的左舜生曾说:张季鸾了解蒋想些什么,准备做些什么,他再把它略略推前一步,作为自己的主张,发为社评。不久,蒋果然这样做了,于是,《大公报》有‘先见之明’,蒋介石则博得‘俯就輿情’之称。因此,不仅读者每从《大公报》社评中窥知时局动向,国民党的官员们,也要从中探悉蒋将做些什么,以便适应。”^④

张季鸾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的时期,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其对于国家大局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无可比拟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张季鸾接连撰写了四篇社评,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这篇社评,被加印数万份,派飞机在西安散发,缓解了当时西安的紧张局面。尽管张季鸾的“报恩”思想和他自身的局限性,使他的社评多少有些偏颇的看法,没有看到张、杨发动“兵谏”逼蒋抗日以及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战的积极意义,但他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竭力避免内战的观点是可取的,也从反面证明了他的社评在西安事变后产生的重大影响。

①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3页。

②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③ 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3册第9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68页。

④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1941年5月,新记《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的最佳外国报纸奖。这是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报纸,此前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得过这个奖。新记《大公报》获得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奖项,除了坚定的抗战爱国立场之外,与其敢言善言的评论特色不无关系。密苏里新闻学院在赠予奖状中说:“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辟,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刊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①日本方面对《大公报》的言论也颇为重视。“九一八”事变前后,关于日本问题,张季鸾发表了若干重要言论,“日本人认为颇能抓到他们的痒处,因此,对我们报特别重视”^②。

张季鸾受过传统儒家教育,他身上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同时,他又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熏陶,认识到中国的积贫积弱源于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正是因为对社会、对时局有着这样深刻的认识,他才能写出一篇篇具有相当深度和独到见解的社评来。张季鸾及其评论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一要学习张季鸾的评论中所体现的“文章报国”思想。书生报国无他途,只能以“七寸之管”来评议时政。他抨击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希望能够改革社会。抗战后积极宣传,写下多篇鼓舞人心的社评,其言论对于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他和同人一起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大公报时代”。二要学习张季鸾的文风。其评论揭示问题深刻到位,笔株尖锐,酣畅淋漓,又不失活泼生动,使读者读之信服,读而后快。相较之下,如今一些评论作品不痛不痒,大而无物,语气生硬,与人拉开距离,且缺少说服力,不能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三

① 王芝深:《抗战时期中国新闻界的一次庆典》,载《红岩春秋》,2005(5)。

② 胡政之:《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

要学习张季鸾的报格。作为一位生于乱世的文人,他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坚持报人的职业操守,坚持评论报道的客观公正,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宗旨。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报人、评论家仍应像张季鸾那样,做到“腾龙飞虎,游刃有余”。

后人形形色色的评说,从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张季鸾在中国现代史上独特的影响力。无论后人如何评说,他毕竟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极具个性的一笔,而且通过亲身的实践,将近现代中国新闻史上“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顶峰。

第五章 尾声：自由主义的绝唱

第一节 “文人论政”传统尾声阶段的社会环境和新闻界的状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颁布《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利用其政权和法统，抢先占领了沿海大城市的宣传阵地，并接收全部日伪报刊，以此作为建立自己报刊网的基础。1945年9月10日，南京《中央日报》复刊，一个以《中央日报》为首的党报体系很快形成。该体系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其一是中央直属党报，其二是军队党报，其三是地方党报，其四则是以国民党党员‘个人名义’出版发行的民间党报”^①。随后，国民党迅速在各地创办或复刊其机关报，如上海的《正言报》、汉口的《华中日报》、北平的《华北日报》等。战前属于民营的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战后也被接管，成为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报纸。战时在后方出版的国民党报刊纷纷向大城市搬迁，如安徽屯溪的《中央日报》迁往上海；《东南日报》福建南平版停刊后，出上海版；《扫荡报》于1945年11月改名为《和平日报》，在南京、上海、汉口等地出版。在大城市中，属国民党系统的报刊数量比战前增多，一个较战前更为庞大的国民党营新闻事业网迅速形成。

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共产党报刊，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

^①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中国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7年版。

持出版。1945年9月,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尽快派人去上海等地办报。《新华日报》除在重庆继续刊行外,并筹备在南京、上海两地出版,但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未能实现。1945年10月,在上海先后创刊《文萃》周刊和《建国日报》(前身为《救亡日报》)。后者仅出版15天,即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946年2月,在北平出版《解放》(北平)三日刊,出版3个多月后,也被国民党当局封闭。1946年4月,在上海创办《消息》半月刊,出版14期后被查封。同年6月,《群众》杂志由重庆迁往上海出版,担负着党报的任务。

抗战胜利后,迫于国内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宣布废止战时出版品检查办法及禁载标准,但对“收复区”仍然施行新闻检查制度。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公然否定了政协会议关于宪法草案决议的民主原则;与之相配合,查封报刊事件在这个时期屡屡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表面上新闻自由的旗下,从1946年2月至7月短短的5个月内,共发生特务捣毁报馆事件17起,共有21家报馆及报纸销售处被捣毁;从1946年1月至5月,新闻界人员被害案达6起,遭特务殴打案14起,遭逮捕案13起。^①

为了缓和舆论,标榜法治,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底公布了《出版法》修正草案、《白报纸配给标准》等具体法规,从法理上加强了对出版业的统治。次年6月,颁布《动员戡乱期间军事新闻采访发布办法》。为了推动该法规的实施,1948年12月,由党、政、军新闻官联合举行新闻界招待会,提出所谓的“新闻自由13条”。但正如香港《大公报》所指出的:“在这13条里,哪儿会看到新闻自由,每一条都是一条锁链,每一条新闻都会触犯了13条里的任何一条。”^②

与政治上的独裁相呼应,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经济崩溃和通货膨

① 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载《近代史研究》,1995(3)。

② 转引自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载《近代史研究》,1995(3)。

胀。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入不抵出,1947年的财政赤字约为27万亿元,1948年达900万亿元。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除加重税收外,当局大量发行纸币。法币发行额猛增,至1948年8月21日已达663万亿余元,比1937年6月的发行额增加了47万余倍。由于发行额猛增,法币贬值,物价随之飞涨。1948年1月,上海每担米售价150万元,8月即涨至6500万元。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城市薪金中间阶层的实际收入仅及1937年以前的工资的6%~12%。^① 这标志着“币制改革”彻底破产,国统区财政经济也随之全面崩溃。

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导致中国社会变革进入异常激烈的时期。我们知道,国民党对新闻界的管制,有一个从抗战胜利后的稍微放宽到国共内战激烈时的逐步收紧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激发了主要来自国统区知识阶层参与政事的热情,他们展开了一场有一定声势的自由主义运动,也就是现在一些学者所说的战后“参与爆炸”(Participation Explosion)浪潮。^② 自由知识分子的劲头,因1946年1月的政协会议的五条决议而变得更大。人们欢欣鼓舞,以为艰难不已的中国自由主义进程出现了融融春意。有人用生动的语言写下当时欣慰的心情:“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和希望他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③然而,陷入全面危机中的国民党,从骨子里是不能容忍这些“异端”存在的,他们必除之而后快。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民盟,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昙花一现后,便连同它们的舆论机关,一同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

这一时期,主宰中国命运走向的无疑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抗战

^① 《大公报》,1946-08-30。

^② 刘景岚:《从参与危机到认同危机——南京国民党政权合法性资源流失的历史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6)。

^③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马叙伦政论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并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与中国共产党虚假和谈的同时,积极进行内战的准备。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3年多的解放战争中,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新闻事业也随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节 新闻界的斗争与“文人论政”高潮的出现

抗战胜利后的一个时期,由于进步新闻界的斗争和国民党当局在一个短时间内对民意的争取,新闻的管制一度有所放松,包括各种民营报刊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团体主办的报刊,一度有所发展。与国共两党的舆论机关所不同的是,这些民间舆论依旧突出着“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主题,广大知识分子一以贯之地延续了“文人论政”的热情,只不过方向由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转向新时期的“民主建国”。1945年9月,由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在上海创刊;同年10月,民盟创办以“宣传民主学说,介绍民主生活”为宗旨的《民主星期刊》,陶行之任发行人;^①同年10月,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创刊。1946年1月,沈钧儒等发起创办《民主生活》周刊,以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①同年1月，民主建国会会刊《平民》周刊在重庆创立；同年2月，《民主报》创刊，张澜为发行人，罗隆基任社长，马哲民为总编辑；同年9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香港分会创办《民潮》月刊。1947年9月，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香港分会创办《自由》月刊；同年12月，致公党机关刊物《公论》在香港创刊。另外，《文汇报》《大公报》（本章《大公报》若无特别说明，均指新记《大公报》——作者注）《新民报晚刊》等则宣布以“超党派”的姿态走“中间路线”。

新闻界的投入，促使一份最能代表这一时期“文人论政”风格的报刊出现。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在上海创立《观察》周刊。该刊组成了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阵容，将“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又一个巅峰。然而，它出现的年代又注定了它必然成为“文人论政”传统的尾声和终结者。

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内的国统区，民间报刊能获得一定的言论空间，获得一定的发展呢？其直接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一定政治空间的保留

如第一节所述，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政治军事对峙的局面业已形成。在两大政治势力之间，“中间”知识分子表现活跃。面对随时可能爆发以及之后正在进行的全面内战，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居斗室，心忧天下。为了争取知识分子、展现“民主”风度，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报刊的言论空间。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的《新华日报》，也一直出版到1947年2月28日，才被国民党“限令”停止一切活动。

政治空间的一定保留，还体现在各种政治势力就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展开的报刊论战上。内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报刊在人民中已毫

^① 王丰年：《〈民主周刊〉的诞生》，载《炎黄纵横》，2006（4）。

无威信可言,而以“不党不私”“文人论政”面目出现的《大公报》在一些人中影响很大,因而《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论战尤其引人注目。内战之初,《大公报》发表《为交通着急!》,以人民代言人的口气说:“对于此时还要破坏交通的有枪杆者,我们老百姓不能不提出抗议。”社评虽未在字面上指明中国共产党,却影射我党是“有了枪杆成为一个势力集团”,“如果不管老百姓死活,一味用破坏手段去求达到目的,在这些势力集团本身来说,也是作践人心,自掘坟墓”。^①1946年11月5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穿所谓恢复交通的办法不过是国民党集团的缓兵之计,从而给《大公报》一记响亮的耳光。《大公报》领导层也感到“震荡惶惑”,遂又于11月20日发表“措词激烈,火气旺盛”的社评《质中共》,公开点名指责中国共产党,攻击我党“欲凭武力”造成“南北朝局面”,还说什么“与其争降争地驱民死,何如兵器销为日月光”。《新华日报》立刻应战,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准确地揭露了《大公报》“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的一贯立场。社论紧接着指出:“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②从而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大公报》标榜“大公”,而实际拥蒋的大私本质。

全面内部爆发后,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大公报》发表了恶毒攻击中共及人民军队的社论《可耻的长春之战》。《新华日报》针锋相对地发表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指出《大公报》已堕落到搬用特务谣言来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依据,真是“可耻到极点”。接着,《新华日报》又选编了一部分群众来信来稿,以《人民皆曰可耻》为题发表,继续批驳《大公报》的反共言论。这次短兵相

① 《大公报》,1946-10-25.

② 《大公报》,1946-11-21.

接的论战,粉碎了国民党御用报刊的栽赃阴谋,澄清了《大公报》的谬误言论,使广大人民群众看清了谁在挑动内战、谁在维护和平的真相,让全国人民拨云见日,有力地配合了我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蓬勃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大公报》上层人物虽然坚持拥蒋反共立场,但是这家报馆的许多中下层人员是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法西斯暴政的,它的一些记者曾经参加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斗争。因此,该报上层人物甘心给蒋介石陪葬的态度,不但为进步舆论界所不齿,也遭到它内部许多中下层职员的反对。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6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它的新生。

二、新闻界和进步势力的不懈斗争

早在抗战之始的1938年,国民党中央即作出《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要求在全国实行战时出版管制。自1939年起,所有出版的书刊,“未经原稿审查者,概予依法取缔”^①。1941到1945年间,关于出版言论的各种临时性指示就多达200余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依旧延续了新闻审查制度。抗战时期,着眼于民族大义与国家利益,广大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这一法令保持了较坚定的支持。但及至抗战结束,当局的新闻审查较战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必然遭到新闻界和进步势力的反抗。

1945年8至9月,国统区新闻界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的出版拉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②。之后,由《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等16家杂志社联署,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三人起草的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于1945年8月17日正式发表,表示自同年9月1日起,上述16家杂志将不再送检,称将“共同高举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

^① 江沛:《南京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载《近代史研究》,1995(3)。

^{②③}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②这一声明的发表,“立刻得到了整个文化界的支持与响应”^③,并由重庆扩展到其他城市,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时值重庆谈判,顾及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国民党最终宣布废止新闻检查制度。但随着时局的变迁,国民党政府一度在一些地区恢复了新闻检查,而针对新闻出版物的追惩制度和猖獗的特务活动,更加体现了专制政权在言论管制上的非民主与非法治。民间报刊的言论空间,正是在与当局的卓绝斗争中保存甚至一度壮大的。

解放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其政治、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起来。以1946年冬上海摊贩斗争和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为起始,国统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个运动逐渐向全国发展,到1946年5月达到高潮。国统区内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与人民解放军武装反对国民党进犯的第一条战线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许多学生团体创办了不少校刊、特刊、快报等,影响较大的有《燕京新闻》《中国学生导报》《学生报》《新时代》《清华周刊》等。这些报刊,成为学生运动的喉舌、第二条战线上的新闻尖兵,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如在“沈崇事件”中,《燕京新闻》揭穿了美蒋新闻机构的造谣污蔑,使读者看清了美国法律和国民党政府媚外的本质。在《岁末忆抗暴》文章中,还以“当冬天来到的时候,春天还会远吗?”作结语,意味深长。^④1947年5月以后,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高潮。“5·20”惨案发生后,《学生报》《清华周刊》等配合《新民报》《文汇报》等进步报刊,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扩大到国统区60多个大中城市,把学生民

^②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页。

^③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2页。

主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国共两党激战之际,国统区新闻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即鼓吹“第三条道路”报刊的出现。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政权,试图在中国实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一条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道路。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国统区就兴起了一股宣传“第三条道路”的潮流,其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民主党派成员。1946年10月,成舍我在《世界日报》连续发表社论,阐述了“走第三条道路”的观点。1947年2月国共合作破裂后,《观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将“第三条道路”运动推向高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储安平《观察》周刊。1948年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渐崩溃,又出现了一轮更大规模的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宣传声势。《大公报》陆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社评,宣传“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等。北平一部分官员和学者、教授在国民党内开明人士的支持下,组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创办《新路》周刊,宣扬改良主义的“新路”,提出了一个“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化”的“初步主张”。南京国民党立法委员刘不同等人,创办了《大学评论》,加入“第三条道路”的宣传中。由于“第三条道路”确实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尚未摆脱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情绪,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影响十分广泛。对此,中国共产党组织国统区内进步报刊对这一主张进行了驳斥与批判,国民党则对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报刊进行了镇压。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解散民盟,这在事实上封杀了“第三条道路”。《大公报》总编王芸生避走香港,1949年9月到达解放区。鼓吹“第三条道路”最有影响的《观察》周刊,也于1948年12月被国民党查封。主编储安平奔赴解放区,加入了人民新闻工作者的行列。“第三条道路”的宣传戛然而止。

第三节 “文人论政”传统尾声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储安平报刊活动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1909年生。出生6天后丧母，14岁丧父，依赖祖母和伯父储南强抚养。储南强早年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清末曾做过南通知县。储安平的成长与后来读书，都得到过储南强的帮助。

由于幼失怙恃，储安平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勤俭吃苦的品质。叶圣陶的一则日记可见出储安平的风格：“储安平请客单印有三事，别开生面：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为度。二、菜不多备，以够吃为度。三、备烟不备酒。曾参观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数人将新出版之杂志插入封套，预备投邮。其出版日为星期六，而今日星期三已印就，定阅者于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纸版分寄台湾、北平两地，因而该两地与上海附近同样，可于星期五阅读。此君作事有效率，可佩。”^①

1928年，储安平入光华大学学习。当时的光华是一所自由空气很浓的大学，他的校长是张寿镛，文学院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其他曾任职的教授包括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和彭文应等。可以这么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一时都集中在了光华大学。储安平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他后来成为继胡适之后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他早年在光华大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1929年，储安平曾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投过稿，在《流沙》

^① 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国闻周报》等报刊发表过作品。1931年,编过一本叫《中日问题各家论见》的政论集。1932年大学毕业后,为《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主编过月刊《文学时代》。1935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学习,师从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浸润。拉斯基的费边主义是“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理论,在保留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力图将它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调和起来,从而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①。储安平时论中所表达的关于国是的各类意见和主张,往往以此理论为依据。在英国期间,储安平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无固定薪水,只领稿酬。1938年归国,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1941年,到湘西“国立兰田师范学院”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抗战时,他在湖南、重庆多所学校任教。1945年春任《中国晨报》主笔。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赴重庆主编《客观》周刊。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已使它失去了革命的活力,尤其是其一党专政阻碍了国家民主化进程。他承认中国共产党有刻苦精神,但又对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他较为笃信英国的民主制度,要求走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宪政的和平道路。他还希望大量培养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中产阶级,“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②。《客观》共出了17期,储安平主编了12期。

1946年,储安平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同年9月1日出版《观

^① 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载《开放年代》,1998(4)。

^② 储安平:《客观》第12期,第1页。

察》周刊。该刊继承了《客观》的自由主义作风,极具英国报刊的韵味。在创刊号上,储安平以“编者”名义,提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并表明刊物将采取“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出尽可能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时局艰危亦不避让,自诩“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①。《观察》云集了一大批最著名的自由主义作者,认为有权利利用言论的力量批评政府及各方面力量,希冀靠言论的力量影响政府的决策,并以此唤起社会的良知。储安平在《观察》上所作的政论时评,主要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给学生运动以同情与支持,维护言论的自由权利和价值,讨论美国对华的有关政策等。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很有一番指点江山、针砭时弊的味道。在《观察》存在的近3年的时间中,储安平大致上信守并践行了他在创刊号上提出的“信约”,并以坦率、公允和极具智慧的笔调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读者,销量从400份迅速飙升到10万份,左右着舆论界自由主义运动的风向,成为当时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成为我国近现代以来“文人论政”传统的绝响。

1947年,他在题为《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一文中告诉人们:他不惧怕肉体的死亡,惧怕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完全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失去表示自我意志的能力。1947年5月,当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三报同时被国民党当局封杀时,他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当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予以取缔时,面对恶劣的政治气候,《观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周炳琳、金岳霖等48位教授《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

^① 储安平:《民主》《自由》,见《储安平文集》(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3页。

缔民盟的感想》等文章。1948年7月,当南京《新民报》遭永久停刊处分,国民党政府磨刀霍霍,新闻界黑云压城,《观察》风雨飘摇之际,储安平还无所畏惧地发表了正气凛然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为国效忠,要是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文章显示了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骨气。

1948年12月,由于多次对政府的强烈批评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观察》被国民党查封。储安平奔向解放区。1949年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并参加民盟和九三学社。1949年11月《观察》复刊,改为半月刊,储安平仍为主编。内容侧重介绍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生产能手等社会的新人物、新气象。1950年5月第14期后,该刊更名为《新观察》,储安平调任,主编为黎澍。

新中国成立后,储安平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提出“党天下”,从此成为大右派。1958年1月被划为资

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9月失踪,时年57岁。^①

1998年,《储安平文集》面世。

^① 关于储安平1966年后的命运,至今有3种看法:虐杀说、自杀说、逃亡说。参见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4页;余开伟:《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载《书屋》,1999(2):40~41。

第四节 《观察》周刊及储安平报刊思想评析

一、追求报人职业品质,创办《观察》周刊

由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文人论政”史上的最后一个里程碑,它的存在和消亡也是自由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中国瞬息繁荣、旋即沉默的一个历史侧影。

《观察》的创办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内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纷纷选择以办报办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民族未来发展道路的期望和主张。傅斯年就曾强调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①他的这一观点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一时间,国统区内新增登记注册的报刊急剧增加,而且多数是社会政治类时评刊物。储安平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办了当时最具权威、最具影响的《观察》周刊的。在其创刊号上,储安平曾著文《我们的志趣和态度》明确宣称:“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②

事实上,在《观察》创办之前,储安平曾在重庆与报人张稚琴合作出版过《客观》周刊。储安平希望《客观》能成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一份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正如他所愿,《客观》广受重庆知识分子的欢迎,在西南地区颇有影响。储安平主编了 12 期后,就转由吴世昌主编。储安平放弃《客观》而转至上海创办《观察》的缘由,一是因为他“感到《客观》虽由他主编,但不是主办,很多事情有诸多牵

^① 关鸿:《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

^② 储安平:《观察》周刊发刊词,《观察》第一卷第 1 期,1946-09-01。

制,便考虑另办一个刊物”^①。二是当时储安平认为1946年春天政治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在《客观》出到第12期之前,政治重心将要东移,因而早有赴上海发展的打算。由于储安平主编《客观》时影响广泛,当《观察》创办之后,原来《客观》的主要撰稿人就开始逐渐转向《观察》。因此可以说,储安平在《客观》的编辑实践为《观察》的创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②。

1946年1月6日,《观察》周刊的发起人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初步拟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等。之后,储安平就离开重庆回到上海开始筹备运作《观察》的具体创刊事宜。同年9月1日,《观察》终于在上海正式创刊。

《观察》每周出版一期,16开本,每期约6万字,每周六发行,24期为一卷。栏目包括“专论”“特稿连载”“科学丛谈”“生活与文化”“周末辟栏”“观察通信”“读者投书”等部分。自第二卷第2期起,增添1页“观察漫画”,作者为孙方成。自第二卷第1期起,增添“读者投书”,刊登读者对时事的短小议论及对《观察》的反响;增添“周末辟栏”和“观察文摘”两栏。为区别于“专论”部分的专题讨论,“周末辟栏”刊载随笔一类的文章。至于“观察文摘”,则主要是转载近期发表于各报刊而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文章。《观察》的主要内容在于“政治·内政”和“观察通信”,分别约占总数的21.6%、30.7%。事实上,《观察》“专论”栏目,主要由这两部分内容组成。而每一期“专论”占半数以上(仅从“政治·内政”和“观察通信”两部分内容来看,已占总数的52.3%)。因此,学界认为《观察》是以政论为主的刊物的认识,似应稍作调整,即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是一个以政论和新闻报道为主的刊物。

① 林元:《碎布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

②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第一卷第24期,第3页。

由于《观察》的言论倾向和编辑风格顺应了当时的时政情境和读者需求,加之储安平主编《客观》时的影响,《观察》的创办倍受瞩目,一经出版,即迅速风行各地,成为全国一个很有影响的时政论坛。《观察》的读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甚至蒋介石政权里的一些高级官员,如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也是长期订户。《观察》的发行范围也很广泛,不仅仅限于上海本地,还扩展到了内地城市、乡镇甚至边疆省份等偏远地区,并在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发行有航空版,最高发行量达15万余份,可谓影响巨大。

1948年12月15日,国民党政府以“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为由,正式查封了《观察》杂志社。被查封的直接原因是《观察》所刊储安平的专论《论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和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为国民党政府所不满,认为它们妨害对美外交,攻击现行政府,泄露军事机密。期间共出版发行了五卷,凡114期。第五卷因杂志社遭查封,只编辑出版了18期。

《观察》的复刊是在1949年5月以后,当时在北平的储安平曾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请求复刊,后经周恩来批复同意,于1949年11月正式复刊,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第14期后,更名为《新观察》。与此同时,储安平调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完全脱离了《观察》杂志社事务,他曾倾注理想与热情创办的《观察》遂成为历史。由于1949年复刊后的杂志已与过去《观察》的自由主义传统迥异,加之储安平作为名义上的主编,已不再负责该刊的编务。故本书中所提到的《观察》,如没有特殊说明,均指1946年到1948年期间的《观察》周刊。

《观察》从创刊开始到被迫停刊,其实际刊行时间还不足三年,每期文字量也仅六万字左右,但在当时却拥有着极为可观的发行量,赢得了全国范围内大批知识分子读者的青睐。“应当说,从《观

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①。

《观察》的成功,当然不能离开储安平作为期刊创办者所付出的努力。实际上,《观察》就是他理想、事业的最大寄托。从他 1947 年农历除夕夜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我们大可体会到这一点:“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到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有此决心,能以长时间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筹,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②在《观察》的前五卷中,每出满 24 期,储安平都要撰写一篇详细的总结报告。这些报告并非一般应景式的总结,而是极其严肃、认真、客观地向读者报告刊物的经营状况、发行情况以及编者所遇到的一切苦衷和想法,这充分表现了他对读者的尊重和信赖。

从《观察》的创办过程我们看到,储安平身上强烈的职业意识和敬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观察》的成功。但这实际上是作为报人所应有的职业品质。从本质上讲,储安平独具个性特色的编辑思想,是形成《观察》的特定风格并使之获得广泛赞誉的重要因素。

二、胸怀自由主义理想,发挥现实政治作用

(一)“自由主义”思潮的中国之路

自由主义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它本身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中就是一个庞杂的思想集成。在人人都赞美自由的同时,却很难有人能对其作出定义。直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它才真正成为一

^① 1985 年《新观察》35 周年纪念册,转引自林元:《碎布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7 页。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版,第 168 页。

觉理论在西方以主义的形式出现,并且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一起,以“三位一体”的整体出现。总的来说,围绕自由主义的是“个人的自主地位”,“强调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可以为相互得益而彼此订立契约”等内容。^①

最早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的是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严复,这种引进应当说是开创性的。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强调:“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他强调,“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主张输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以开启民德民智。^②

自维新运动以来,自由主义遂成为各政治家用以宣传政治理念的工具。直到五四运动开始,自由主义才以一种蓬勃的姿态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信仰之一。1919年底,《新青年》分裂,从这里走出一支力量,“最终汇聚成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集”^③。

1922年创办的《努力周报》汇聚了以胡适等为核心成员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努力周报》停刊后,又有《新月》于1928年创刊,胡适仍为领军人物;“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聚首《独立评论》。胡适表示,对于这个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④。

1937年7月,面对全面爆发的抗战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纷纷各自选择了为国尽忠的方式,不少人南下或进入内地继续从事文教或新闻出版事业,更有一批人进入政府,为中国救亡尽最现实的努力。《独立评论》的成员因此纷纷出走,1937年7月25日,《独立评论》停刊。但自由主义之魂并没有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消亡。抗战胜利之后,大量知识分子重新举起自由主义的旗

①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③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④ 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1933年第51号。

帜,对民主建国的前景跃跃欲试,甚至不少在抗战中入阁的知识分子此时也退出政府,准备以“第三者”的公允和持衡为中国谋求未来。《观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最主要的舆论阵地。

(二)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观察》的选择

《观察》的刊徽设有明确的文字标识:Independence、Non-Party、The Observer。在创刊卷首语《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储安平博大高远的自由主义报刊理想展现无遗。在这篇慷慨激昂的发刊词中,储安平较之前辈的自由主义报人更全面、系统和高水平地阐述了这本刊物所坚持和追求的自由主义的“志趣、风度和立场”,提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原则,并将其称为《观察》乃至整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信守的“四个基本立场”。这个立场表明了《观察》鲜明的独立、客观和超党派的态度。储安平提出:“这个刊物的确是一个发表政见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所感兴趣的‘政治’,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①

储安平明确说明他们“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普通老百姓说话,而刊物也将对政府、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做“毫无偏袒”的评论。^②在第一卷末,储安平也说出了创办《观察》所依赖的两项基础:一是国内拥有数量巨大的“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缺少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平台;二是中国的“知识阶层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观察》应当可以赢得较广的读者。”^③可以说,《观察》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定义为自由思想分子所写、所读的一份刊物,文字里不时透露着储安平等人对知识

①②③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6年第一卷。

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信乃至豪情。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使命感的空前强烈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自五四运动之后,自由主义思想虽较为活跃,但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后来蒋家王朝的独裁专权,都使得他们看不到大变革的希望,因此对自由主义的讨论更多地局限于学理和信仰的探讨。进入全面抗战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更是自觉退位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即为鲜明的例证。但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的对峙,知识分子普遍看到了国家和平建设的希望,由此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如陈布雷等选择进入政权系统,以求“好人政府”可以施行;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联合组党,积极参与“政协”和“国大”,因而出现了民盟、民建、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更多的知识分子则力图保持政治上的独立,通过民间报纸、杂志宣扬其和平建国理念,从而成为这个群体政治活动的一种常态。

通过《观察》的文章,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知识分子高涨的政治热情背后所隐藏的现代化焦虑。《观察》撰稿人多有海外留学背景,这一经历为他们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同时也使他们在中外的“对比”中产生了焦灼和忧虑。另外,《观察》特别对战后的日本投去了诸多目光,文章常感慨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而对中国的举步不前表示了无比的忧虑。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观察》汇聚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如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急迫地选择了《观察》。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将传向中国的各个角落。

(三)《观察》与自由主义现实政治作用的发挥

对于储安平等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来说,在继续发扬自由民主理念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极大运用了自由主义所能发挥的现实政治作用。这一作用由于国共两党的冲突、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对立,而获得了极度的彰显。

一是对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追求。在《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说民主》等文章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具有

政治民主的优势,而社会主义的国营与集体经济以及社会福利等,则具有经济民主的优势。他们认为二者应取长补短,不应打死任意一方。

二是对国共两党的评判。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糜烂统治的失望和对共产党朝气的肯定。但他同时对三民主义寄予希望,仍盼望着国民党政府从内部作出改革和利益调整,而对共产党严密的组织和缺乏民主的风气表示了担忧,这种“优缺共存”的“客观”评判,也是《观察》其他类似文章的大致态度。

三是对政治体制的设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上强调执政的国民党与在野的共产党之间的共存,如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等文中,强调两党间的“平衡与钳制”未必不是好事。

四是对和平的坚持。《观察》所有谈及内战的文章都坚决呼吁两党和平,无论是在共产党放弃石家庄甚至延安、国民党军在形势上似乎一片大好的时候,还是在《观察》被封前夕、国民党即将崩盘的时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偏不倚地进行着和平的呼号。如在《呼吁和平》一文中,张申府疾呼这种和平“必是真和平,必是长期的和平,必是为国为民的和平”^①。

《观察》文章对两党作出了深刻的批评,同时又指出了两党各自的优点。但这种“权宜之计”并非没有限度。《观察》一方面是大施“权宜之计”,希望两党“和平共存”,另一方面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对政治制度设计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建设性建议上。在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总是信心十足。他们认为,要真正实现国家的民主富强,还得依靠真正的“正义”来实现,而这种“正义”已经由人民赋予了知识分子,现在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认为

^① 张申府:《呼吁和平》,《观察》,1948年第五卷。

最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要义植入中国的肌体。

三、网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阐述自由主义思想

(一)强大的撰稿者阵容“星光灿烂”

储安平深知,对一份杂志而言,强大的作者队伍是一个刊物成功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对一份知识分子杂志而言,作者队伍的水平 and 规模决定了杂志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观察》能够在创刊不久即风行全国,与它强大的撰稿者阵容是分不开的。1946年初,储安平及其同人在重庆开始了邀约《观察》撰稿人的工作。他们起草了一份“拟约撰稿人名单”并进行函洽。储安平说,除了刊物缘起、“‘履约担任’或‘不克担任’”的复信等印件外,“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长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①允诺为其撰稿人的,则意味着一是答应愿为《观察》写稿,二是在精神道义上支持《观察》。至创刊之前,只有一位回复“不克担任”,八位没有复信。其他人均复信“履约担任”。凭借自己的自由主义人格魅力和《客观》的成功和影响,储安平网罗了一大批当时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观察》聚集了最“星光灿烂”的一群人。特别是在创刊号上,储安平在封面最下端辟出“撰稿人”一栏,将68位主要撰稿者的名字赫然排列其中,并在第1页最顶端刊登出“本期撰稿人”及其供职单位,以此来表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独立评论》和《大公报》“星期论文”之后的又一次总动员和大集结。

在这些作者中,既有以胡适、马寅初、傅斯年、陈衡哲等为代表的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中坚人物,又有以王芸生、费孝通、宗白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主义者。考察他们的简况,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一、从年龄结构上看,大体有两个年龄段。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19世纪末出生的,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第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约占《观察》撰稿人的10%。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

^①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1947年第一卷。

的加盟,对深受其影响的第二代自由主义分子,给予了莫大的精神鼓舞,使两代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联系更为紧密。二是 20 世纪初出生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无论在专业、思想还是在勇气和精力上,都是人生最佳年龄时期。二、从教育履历上看,他们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多数有留学背景,除个别人是留日、留德外,其余全部是留学英、美,如吴恩裕、邹文海、储安平等都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拉斯基教授的亲炙。三、从职业分布上看,除了个别人为政府官员外,大部分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教授,其中尤其以从事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和文学的居多,并且多数是无党派人士。四、从总体上看,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均怀有深厚的感情。1949 年以后,《观察》撰稿人中约有十几人先后到了美国或台湾,其中绝大多数人主动留在了祖国大陆,由此可见“撰稿人”具有广博的学识、专业的技能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他们秉其智慧、凭其良心,“以社会良心与社会舆论代言人的身份发表政见。……通过在报刊上制造舆论、反映民愿,可对政府的政策制度与执行形成一种监督与压力,从而避免政权的腐败而有助于政治的清明”^①。

(二) 抨击国内民主自由的缺失,传播英美自由主义思想

以《观察》为阵地,中国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携手作战,撰写了大量文章,宣扬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阐述他们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一方面,他们对国内民主自由缺失的可怜现状进行了披露和抨击,如萧公权的《论民主》、葛思恩的《新闻自由的低潮》、周炳琳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邓嗣禹的《谁说中国人没有自由》等,在披露和抨击中表达了对自由主义的渴望之情。另一方面,他们满怀激情地传播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如张东荪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陈衡哲的《关于自由思想分子》、The

^① 《储安平文集》(下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第 65 页。

World Report 的《英国工党政府关于民营事业的管理办法》等。他们深刻而理性地阐释了自己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讨论

在《观察》中,民主主要涉及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大内容。在政治民主领域,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全倾向于英美的民主思想与制度。而在政治民主的实际操作上,他们一方面对政治协商、联合政府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则期待着国民党政府的自我革新。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论政府改组》《论省自治》等文章中。在经济民主方面,他们推崇美国学者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经济民主”的“政策目标是重新分配财富并使经济机会和财富平等化”的观点。^①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如果英美是政治民主的代表,那么苏联就是经济民主的代表。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经济正义与社会安全》《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等文章中。当然,也有对“经济民主”的本质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剖析的,陈志让在《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文中,就建议二者取长补短,形成更为合理的经济制度。他们为中国开出的是一个兼具“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药方。

2. 对自由主义政治路线的讨论

作为“第三条道路”的精神象征,储安平以《观察》为主要阵地,展开了“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当时《观察》对民主政治的含义的解释,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种:自由、法治、宪政、统一。不过,它最关心的是中国应该创建怎样的民主政治,即实行怎样的民主政治模式。伍启元从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的角度,认为中国在亚洲应成为美苏两强的桥梁。为了达到这一点,中国应在政治方面采行民主政

^① 转引自江作军《论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治,而在经济方面采用温和的社会主义。显而易见,这就已经清晰地勾画出了抗战胜利后曾名噪一时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简称中间路线)的轮廓。1946年5月,张东荪公开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自己调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走中间路线的思想公之于众,正式提出了“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主张。这一主张显然是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经济的双重目标发展而来的,它构成了自由主义者对未来中国图景的理想预测。《观察》主要撰稿人曾经对中间路线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并无第二条道路”^①。这显示出了他们幼稚的一面。

3. 对自由主义法治观的讨论

自由的保障需要法治。《观察》也正是从多个方面阐释了这一问题。其一,“要争法治,先争宪法”,如《行宪前夕的一个违宪之法》等文章;其二,“法律至上”原则对于法治而言,是其精神核心,如《法治实行问题》等文章;其三,实行分权制衡是法治在国家权力组织上的必然选择,如《论中国式的代议制度》等文章。此外,《现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几种原则》等文对国民党政府改革中的“三权”与“五权”制度设计进行了讨论,强调了司法权和监察权的重要性。总之,自由主义法治观在《观察》上得到了充分的展开。“欲使中国步入真正的法治,知识阶层的为法律奋斗是不可少的。知识阶层应尽量涤除其孤芳自赏的心理,各扫门前雪的惯行,而应依法组织起来,将官吏的违法行为揭发并纠正,务使大官小吏均逐渐依循法律的轨道而行为”^②。从这个意义上说,《观察》似乎可以被视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份重要的宣传册。

4. 对自由主义社会发展观的讨论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针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在《观察》

^① 《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编后记),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61页。

^② 李浩培:《法治实行问题》,《观察》,1947年第二卷。

上展开了讨论。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认为散布于国共之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数量庞大,但较为散漫,缺少严密的组织;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党参政持质疑态度,认为这样必将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失去他的中心价值”^①。其《文摘》专栏中转载的朱光潜的《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可视为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独立”的、“超然”的特点的总结。对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观察》中出现了两种稍有不同的观点。杨人楩等人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有距离的”,表示“实在不敢赞同共产党‘非甲即乙’的说法”^②;李孝友则认为在当时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虽互不接受,“但谓二者无法妥协则似乎未免言之过早”^③。自由主义正是在这种对立批判中显示其存在价值的。关于自由主义在未来中国的命运,大多人都表示了隐隐的担忧。储安平说:“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④

四、提供公共言论空间,崇尚自由宽容精神

(一) 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

《观察》周刊的《本刊传统》中规定:“我们尊重个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民盟成员张东荪曾表示:“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来独往,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说话却不是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⑤而且,《观察》几乎没有社论。储安平称“曾在或将在本刊上写文章的人,他个人或许对于国事有具体的主张,但是‘我们’,或者说本刊,至少到目前为止,还谈不上这点”。^⑥ 储安平自己撰写的时论文章也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而非代表《观察》编辑部的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第二卷。

② 杨人楩:《关于“中共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第三卷。

③ 李孝友:《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路》,《观察》,1948年第三卷。

④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第二卷。

⑤ 张东荪:《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观察》,1947年,第二卷第6期,第27页。

⑥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1947年,第一卷第24期。

观点。在“作者简介”一栏中,储安平对自己的介绍是“复旦大学教授”,而非“《观察》周刊主编”。

时论的署名问题充分体现了文责自负的立场。《本刊传统》中规定:“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一般报刊上的评论有署名的,也有不署名的。不署名的理由或者认为评论即代表舆论,评论者不过是一个传达公意的使者罢了,他的私人名字和评论没有多大的关系;或者是为了避免或触怒政府,或牵涉某团体,或为个人所不满。^①《观察》时论虽然也承认是舆论的代表,但是更为强调发言者的独立地位和坦荡襟怀。虽然时事评论特别是批评政府的评论,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要担负很大的风险,但储安平坚持认为发表言论是一项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而且作者理应对自己的文字承担责任。

《观察》真正扮演了自由主义独立论坛的角色。他们的理性努力并非单纯延续“文人论政”的自由主义传统,而是寄希望于启迪青年民众,撒播自由主义思想的种子。这正反映了储安平在发刊词中所说的:“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②

(二)自由表达

储安平认为:“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的意见,在今日这种‘两趋极端’的局面下,我们认为最最需要提倡这种‘自由’与‘宽容’的精神。”^③储安平对自由的理解包含着文化上的宽容精神。他在发刊词中即申明:“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悖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

① 郭步陶:《编辑与评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85~86页。

②④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7年,第一卷第1期。

③⑤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第一卷第24期。

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④

在他看来,对时事见解的不同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他甚至“以不一致为贵”,并称“假如以后我们有几个朋友发表意见相同的文章,那也仅是偶合,而非设意如此者”。^⑤《观察》第二卷第四期刊载了梁漱溟的《关于“中国的政局”》,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储文《中国的政局》中(《观察》第二卷第二期)“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实质上相等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在梁看来,国共两者精神完全相反:国民党政府“就地停战”是对中国共产党所提条件之一,要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才能停战,并以关内为限;中国共产党倡言无条件停战,是主张双方不以任何条件为停战前提,既不含有变更此约束之意,也并无关内关外的地域限制。储安平在编辑梁文时,特意采用了较大的字体,而且用黑线围框,以凸显其重要。这种情况在《观察》是很少见的。《观察》向来珍惜版面,字号多为老五号字、老六号字,此举充分体现出储安平对观点内容多元性的提倡。《观察》“虽有一定的主旨,……但这主旨只是一个可以容纳多种声音、多方意见的大范畴,并非一党一派一团体之意见……”^①

储安平鼓励不同的观点的存在。一方面,他认为即使所刊登的观点、论见不为编者同意,但只要稿件质量没有问题,编者就应当予以刊载;另一方面,储安平也表示,作为热爱思想自由的人,在“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的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② 此意在强调自由表达不是对评论者的放纵,评论者仍须尊重评论对象,他人亦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① 杨雪梅:《新闻思想的源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

② 储安平:《论张君勱》,《观察》,1947年,第一卷第19期,第4页。

包括持不同意见者表达的自由和被评论者回应的自由等。

(三) 倡导理性的言论

储安平是基于两个理由考虑加强《观察》政论的“理性”原则的：一是理论依据，“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①。储安平希望借助《观察》政论宏扬理性思辨精神，使刊物呈现出一股思考的智慧力量，促使完整的国民人格形成。二是现实依据，储安平对长期生活在封建奴役下的国人缺乏理性思维、只知被动接受、缺乏主体认知及选择积极性的现状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因为不讲理性，所以善恶不明、是非不辨、公道不在、社会停滞不前，中国“必是一个黑暗的混沌的退步的社会”。他希望借助理性的呼唤疗救这个“病态社会”。^②

储安平对于理性的认识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留学时期的亲身经历，这使储安平对英人“理性”的品质格外推崇；二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对理性的看重，认为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③ 储安平提倡稳健的言论风格，他认为《观察》时论应当凭理性发言，而绝不凭感情发言。在他看来，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那显然是不客观的。

储安平在编写时论时表现出了对理性原则的一贯坚持。在选择稿件方面，他强调“一切感情冲动的文章，概所不取”，虽然他也承认感情冲动的文章更能吸引读者，但他无意以此来吸引读者。撰写时论方面，他不支持一些感情冲动的“刺激”做法，在他看来，“泼辣”并不能增加文章的重量，“严厉的八个字，其斤量远在看似泼辣而实无重量的八千字以上”^④。《观察》对理性原则的坚持并不因现实环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第二卷。

②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6年第一卷。

③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第二卷。

④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1947年，第一卷第24期。

境的恶化而降低标准。即使在《观察》遭遇强大的政治压力时,储安平依然称:“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①

储安平从富国强邦的目的出发,倡导中国应该培养一种理性的是非观。首先,在《观察》发刊词中,当谈及放言论事的理性原则时,他表明自己的“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观念:“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种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②其次,他在《观察》上发表的政治文章,更是严格以理性为判断事物的出发点,凡事都要分清是非而不计利害。储安平在《观察》上发表的政治大体上涉及三个内容:一是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坚决维护。对这些国事他都从总体上全面把握事情的是非曲直,而毫不含糊其辞,从而显示了刊物鲜明的“理性的是非观”。

(四) 坚持无党无派的立场

作为主编兼主要撰稿人,储安平在《观察》上发表 40 多篇政论文章,“大多极有资格被收入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经典序列”^③,如《自由与守法》《评出版法修正草案》《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等。储安平在 1947 年 1 月写给胡适的信中也说道:“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④由此也可以看出,储安平是希望通过《观察》来宣传自由主义思想,促进中国朝着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方向发展的。

① 储安平:《风浪·熬炼·撑住》,《观察》,1947年,第三卷第24期。

②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7年,第一卷第1期。

③ 马晓枫:《〈观察〉周刊与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评析》,载《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3)。

④ 储安平:《致胡适的信·三》,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要保证言论无所偏倚,就必须坚持无党无派的立场。储安平称“本刊所发表的文字,足以真证明本刊不仅是一个‘无党’的刊物,并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本刊确实实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关系的民营刊物”^①。《观察》不是任何党派组织的代言人。有观点认为《观察》是民盟的机关报,此种看法值得商榷。虽然《观察》时论的一些作者隶属于民盟,而民盟又确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组织。但是,认真考察《观察》的文本可以发现:一是大多数作者属于无党派人士,民盟成员并不占多数,而且作者中还存在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二是储安平在简介那些具有多重身份的作者时,基本上不涉及他们背后的政治组织;三是时论作者本人也曾声明自己仅代表个人发言。所以,“机关报”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储安平还特别强调《观察》时论与政府无利益关系。他曾声明:“政府方面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直接或间接,明示或暗示,向我们有过任何接洽。”^②以此说明《观察》时论的观点并不受政府的影响,亦不会为政府代言。

从舆论阶级性的角度分析,《观察》时论试图以“超党派”的立场掩盖阶级意见的分歧,并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但从当时新闻业的具体环境考虑,时论的这一立场值得深思。当时的报界众多民营报刊皆倡导“无党无派”,主要是为了“避开政治斗争漩涡,以求生存和发展。……不如此,一大批有影响的大报、期刊在极为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环境中便难以保存下来。……此外,在政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当时社会一般读者的心理常是愿意听听处于‘超然地位’报刊的意见”^③。在当时国统区的政治环境下,公开支持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报刊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但在超党派的立场下,批评国民党及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容忍的。所以,

① 储安平:《艰难·风险·沉着》,《观察》,1947年,第二卷第24期。

②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1947年,第一卷第24期。

③ 马光仁:《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载《新闻大学》,1994(4)。

《观察》的“超党派”立场既体现了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也是《观察》自身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

(五)对“健全的公共舆论”的思考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储安平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展开他对“健全的公共舆论”观念的思考。他认为:自由是新闻界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由于言论思想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①,所以,储安平希望借助刊物培养国民自由思想的种子,“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以形成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政治社会局面,建立一种“健全的公共舆论”环境。

储安平的“健全的舆论”观念,其实是深受“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观念的影响。无独有偶,同为报刊政论家,同样是为了建设民主宪政的目的,梁启超和储安平一样都很重视舆论的作用,都从实践理想的民主政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健全的舆论”观念。

在梁启超看来,“夫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之意思之结合,而有统一性、连续性者也”^②。梁启超是从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秩序和舆论的宣传效果的角度来提倡“健全的舆论”观念的,否则,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舆论就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误国生祸。而储安平“健全的舆论”观念更侧重舆论的差异性,强调各抒己见的舆论交往自由及互相尊重的风度和胸怀,贯彻其中的是浓重的自由理性、思想争鸣的气息。两人思考关注点的区别缘于两人所处的不同社会历史环境。另外,两人在如何制造健全舆论的问题上,观点也存在着

① 储安平:《政府利刃指向〈观察〉》,《观察》,1948年,第四卷第20期。

②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区别:梁启超认为健全舆论(积极的舆论)应该具备“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五大要素,在封建专制下不提倡这种健全舆论,因为它会成为消极舆论,把社会引上歧途;而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下,健全舆论才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舆论力量。相比较而言,储安平从绝对自由观念的角度,从改造中国缺乏自由的专制社会现状出发,认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意见,都应该允许其亮相,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而且,他认为“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①,自然不会产生什么消极的破坏性舆论后果。可见,对于“健全舆论”的观念,梁启超和储安平的角色意识差别,导致了两人舆论观的区别。

五、保持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确保刊物的客观独立

(一)在经营上坚守独立自主的理念,确保刊物的客观独立

在政党报刊盛行的年代,一份报刊要想保持思想上的独立客观,首先必须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否则将会沦为大财团或者政党的言论工具。储安平深谙此理,他在筹办《观察》之初就十分重视吸收同人入股,不接受来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的筹款。这与他的新闻从业经历是分不开的。

储安平早年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后被聘为该报的主笔。但不久便辞职,之后还主编过《文学时代》《客观》等刊物。由于这些刊物不能在经济上做到独立,因此钳制了言论的自由,使他不能施展自由主义的抱负。待到《观察》在国内影响力日增之时,一些国民党人士便想以投资的方式控制该刊,但遭到了储安平的拒绝。后因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观察》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尤为严重的是纸张价格的上升,从创刊到出第二卷,半年时间纸张即涨了8倍。到1948年8月,纸价涨得令人咋舌,半年涨了16倍。

^①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7年,第一卷第1期。

除此之外,印刷、稿酬、杂工等费用也颇令储安平感到头痛。在经营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有读者建议该社接受读者捐款,或向读者募捐。凭借此时《观察》的声望,此举是颇为可行的。但储安平还是谢绝了一些读者的好意,在艰难的时局中坚持下来了。

正因为这样,储安平自豪地宣称:“本刊是一个纯粹民营的刊物,既无政治集团在后指使,亦无经济集团在后支持,平时用纸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①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确保了其言论的客观自由,这也使得《观察》周刊在读者心中的可信度日益增强。尽管战时国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观察》的读者群体却逐步扩大。这可以从下列一组数字看出:1947年8月30日,《观察》第三卷第1期出版,发行量达到1.9万份,为创刊号初印数的3倍多;半年以后出版的第三卷第24期,发行量增加到2.5万份,为创刊号初印数的5倍。此后印数一直飞跃,第四卷增加到5万份,第五卷更增加到10万多份。发行量的扩大、订户的增加,使《观察》在经营上的困难程度减轻,从而使其在艰难的运营中保持了独立的本色。

(二)在质量上坚持“高度”的要求,尽可能满足大多数读者的愿望

储安平认为,提高“本刊质量”,是编者的责任,也是扩大销售量直接有效的方法。至于“尽量满足读者的要求”,由于每个读者的具体要求不同,难以一一满足,但他们尽可能做到满足大多数读者的愿望。如“读者投书”和“周末文摘”栏目,就是应多数读者的要求而设置的。《观察》社的此番“苦心”,得到了读者的回报,那就是销售量上升和读者对该刊各栏目的满意程度平均在70%以上。

针对部分读者关于《观察》过于严肃甚至枯燥的说法,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说明了两点:第一,《观察》确实是一份硬性的高级刊物,是给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看的刊物,而中学生等并不

^① 储安平:《艰难·风险·沉着》,《观察》,1947年,第二卷第24期。

在该刊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第二，《观察》是一份理性刊物，以理服人，绝不欢迎类似党派间那样凶狠的攻击谩骂出现，因此无法满足一些读者希望看到“刺激”文章的要求。对此，储安平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过这几年来，大家太苦闷了，以致人人都希望读到所谓‘刺激’的文章，感情越冲动的文章越容易吸引读者；但此与本刊的基本精神相背，我们无意如此。”储安平强调：“我们不拟迁就读者的口胃而改变我们的方针”。^①

对于部分读者提出的“每期有时事短评”、专论应更为触及现实等建议，《观察》进行了适当的改进，但终究还是没有设立“时事短评”一栏——没有将《观察》办成一份完全跟着时事走的刊物。在第二卷第12期刊发的对323位读者反馈意见的分析中，认为可以接受《观察》这种严肃风格的读者有227人，“希望稍微轻松一点的”有100人（多选），储安平认为“这项答案使我们大大满意，并增加我们的自信”^②。

储安平对于这一办刊理念的坚持是坦率而执著的。在第四卷报告书的“编辑检讨”部分，面对读者来信中对“观察通信”一栏的赞扬，储安平却“内心暗自惭愧”^③。他认为雅俗共赏的“通信观察”固然更容易“讨好”读者，但硬性的“专论”在一段时间以来的不够充实也是其不够叫座的主要原因。他依旧坚持：“本刊是一个政论刊物，重心应当在专论部分。”^④。由于时值1948年，内战正如火如荼，知识分子普遍沉默，储安平表示“当尽心尽力，广征佳稿”，但也无奈地说明“有无成就，不敢先说”。^②

（三）在资金筹措上采取民间的“股份制”模式，避免官僚资本和

①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1947年，第一卷第24期。

② 储安平：《三百二十三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观察》，1947年，第二卷第12期。

③ 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四卷第24期。

④② 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四卷第24期。

政党势力的渗入

1946年1月,《观察》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举行,该会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尤其是“征股简约”,即《观察》将采取一种民间集资、入股分红的经营模式,预定股额为1000万元。在征集股金时,储安平特别注意不接受来自官方或政治团体的资金。对于不少闻讯后汇来股款的人士,储安平表示,在当下的环境中兴办报刊必定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我们还是请他们再为考虑,……一般公务人员都非常艰苦,……若仅从生活零用中,节省出钱来入股,我们实在感觉不安”^③。另外,刊物还进行了制度化的规定,如“办满一年时,主持人应向出资人提出财务报告”^④等。

在半年多的刊物筹办过程中,股款的“不易筹措”是第一大难题。由于入股人以“教书为生”的知识分子为主,而教职人员从八年抗战以来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所以一开始筹款并不顺利。后来,凭借原《客观》的一些老读者及一些家底丰厚的学生等的入股,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当时,在“物价激涨”的上海,要兴办一份刊物,“似非有二千万元不能”,但《观察》筹集一千万“尚感不易”。储安平形容说:“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盏明亮的灯。……吹不灭、抢不掉,……驱散着周围的昏暗”^⑤。至1946年7月,资金逐步到位,但考虑到暑期来临,学校放假,故发刊日被推迟到9月1日,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兴奋地写道:“这是一个热闷的夏天,但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夏天。”^②

事实证明,《观察》并没有使它的出资人在经济上感到失望。直到第一卷末,《观察》的资金已由开始时账面上的一千万上升到两千万。储安平说,“在经济上,本刊的发行数足以证明本刊可以自给,无须仰求‘外援’”^③,并给总认为某某刊物不是属于这一党就是属

^③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第一卷第24期。

^④ 储安平:《观察周刊社负责人储安平至笄移今函》,载《档案与史学》,1997(6)。

^{⑤②③}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第一卷第24期。

于那一派的人们以这样的认识——办刊物并不一定要靠哪一党、哪一派的津贴。

储安平不仅在创办初期集股时不接受官方资金,而且在创办后也一直都是如此。正是因为储安平不接受任何官方的资金,《观察》从一创办开始就保持了经济上的独立性。

(四)在发行上运用力争直接订户的策略,巩固基本发行量

《观察》的读者分为零售读者和直接订户两种。储安平在当时就认识到:“直接定户是一个刊物的基本读者,也是这个刊物最忠实并最关切这个刊物的读者”,因而《观察》社比较重视争取直接订户的工作。储安平本人多次强调,争取订户的工作,“必须有通盘的计划,中途零零碎碎的,无甚补益”。可见,他是把“推动订户”的工作作为整个编办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来做的。换言之,在他看来,争取订户,必须从整体上、从长远上来规划。因此,至第一卷24期出满时,“除在创刊前分散过一次宣传品以外”,《观察》社没有“在此方面有所努力”。直到第二卷出版时,杂志社各项作业已走上正轨,才开始在“推动订户”方面作出努力。而且,针对部分读者因考虑到刊物是否会中途夭折而不愿订阅的想法,储安平承诺:“我们主持这个刊物,不是一件随便轻率的行为,除非因政治打击而遭封闭,我们决不中途停止。”^①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基于上述认识,储安平把争取订户的活动开展得别开生面。

一是通过《观察》撰稿人的帮助,在各高校征求学生新订户。1947年2月,《观察》社以此方式主动“出击”,却因当时学生贫困,“拿不出2万块钱(约合抗战前法币1元——引者注)”,而“几乎可以说全面惨败”。^②这一次行动,尽管没有达到增加订户的目的,却扩大了《观察》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

①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第一卷第24期。

②③ 储安平:《艰难·风险·沉着》,《观察》,1947年,第二卷第24期。

二是呼吁原有的订户,介绍其亲友成为《观察》新订户。这一行动“出乎意外地获得了可观的成就”。在这一点上,我们惊异地发现,虽然储安平没有学过商业心理学,却善于分析和利用读者的购买心理。比如,他明确指出:“旧的一卷业已结束,新的一卷即将开始,在心理上这个时期最适合征求订户。”^④此言具有指导意义。

三是为直接订户提供各种优惠服务,如八折优惠等。另外,从第四卷第13期开始,《观察》设立了多达1500个名额的“半价订户”,并力求将名额在学生、公务员(包括军人)和后方小城市读者间合理分配,以便“为清寒读者有一点服务”^④。

四是对订户来信所要求的修改投递方式(《观察》提供平寄、挂号、航空平寄和航空挂号四种方式)、修改地址、续订、托购其他书籍等事宜,均有专人回复并尽快办理。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邮政检查制度及蔓延各地的战火,有些地方的订户不能按时收到甚至收不到刊物,储安平在报告书中均详尽说明情况并诚恳致歉。

^④ 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1947年,第四卷第24期。

(五)在编读往来上奉行“负责、迅速、公平”的原则,重视建立与撰稿人及读者的良好关系

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强调了《观察》周刊办事的基本原则是“负责、迅速、公平”。对于撰稿人,《观察》同人都是“最尊重并最热诚的”。另外,《观察》的稿酬一向是透明、公开的,并能根据物价的上扬及时调整。即便如此,储安平仍然经常懊恼自责,一方面是对物价疯长的忧虑,另一方面是对稿酬微薄的无奈。

《观察》与读者的互动也是比较积极的。第一,《观察》对读者来函十分重视,有专人负责,虽不可能“每信必复”,但也尽量复短信予以说明。第二,从第一卷第13期开始,刊物设立“读者投书”这一固定栏目,专门刊载一般读者的原创短文。第三,对于一般读者或并未列入撰稿人名单的学者的投稿,编辑将其与“固定撰稿人”一视同仁,只论质量不计名气。以第三卷为例,在理论性最强、位置最重要的“专论”专栏中,总共72篇稿件里有17篇为读者投稿,占24%左右;而在偏软性的“通信观察”一栏中,总共80篇稿件里更有39篇为普通读者所赐,接近半数。《观察》同人表示:“本刊虽有基本撰稿人七十余位,但本刊仍为全国作者读者共同之刊物。园地公开,绝无私见,稿件取舍以稿件本身为标准。撰稿人来稿亦有退还者。”^①第四,《观察》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读者调研。在第一卷第24期上,附有“读者意见书”一份,这份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的问卷收到了较好的调查效果。之后,储安平撰写了《三百二十三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对问卷进行了分析。

此外,储安平还强调在基层广大读者中间做踏实的推销工作。具体有四种方法:第一,鼓动杂志社成员及其亲友动员他人订阅该刊。第二,设立代理发行点,如北平新宾书店等。第三,出版多种《观察》版本。由于内战爆发后,交通受阻,许多偏远地区的读者读

^① 《〈观察〉周刊社第一次股东会议记录》,载《档案与史学》,1997(6)。

不到或未能及时读到《观察》，自第三卷起，该社先后出版了“华北航空版”“西南航空版”“台湾航空版”等。第四，重视刊物自身的宣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每期出版，都在上海《大公报》封面位置刊载广告一次，内容为本期刊登的文章标题和作者姓名，即使在杂志社财政困难时期或上海《大公报》广告费猛涨之后，仍照刊不误；二、在刊物中穿插“征求直接订户”之类的广告，据笔者粗略统计，此类广告计 23 条之多。

正是《观察》同人在上述方面的齐心努力，最终使得这份完全由知识分子操办的刊物在经营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一切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迅速实现的。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尽管自第三卷以后出现越来越大的亏空，但若加上“《观察》丛书”的收入，杂志社即使未必能实现总收支平衡（可能仍有亏空），也尚能生存下去；二是从收入递增率来看，成绩是明显的，特别是在第一、二卷时期，由于物价上涨情况尚不严重，有较大的盈利；三是在短期内，杂志社人员组织不断发展，销售量、订户数均以异常的速度持续飙升，从而创造了现代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四是杂志社经营两年余，其停刊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由于“言论态度”而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第五节 “文人论政”的高峰，自由主义的绝唱

20 世纪初，科举制度走向终点。令人惊奇的是，广大传统士人迅速实现了向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从王韬的《循环日报》到储安平的《观察》周刊，“文人论政”作为知识分子“家国传统”和“政治惯性”在报刊上的体现，成为中国新闻史上耀眼的一页。这一页是如此的灿若星河、波澜壮阔，然而它的高峰，居然成为这一传统的尾声，这一矛盾的统一体就是《观察》。“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观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① 它的这种命运,显示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和他们无奈的历史宿命。

一、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特色

从储安平的办刊实践和他在刊物上发表的政论,可以窥见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特色。

一是强调报刊的社会责任,反对无限制的自由。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在发展之初是强调完全的自由、彻底的自由的。发展到 20 世纪,社会责任论开始占主流。储安平以天下为己任和教化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把报刊看成是开导民众、拯救国家的利器。他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表明:“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面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也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② 言辞之间,报人以言论救国的昭昭之心可鉴。虽然储安平反对政府对报刊的控制,但亦反对无限制的自由。他认为:“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③。

二是表现出鲜明的英国特色,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储安平早年留学英国时,师从自由主义大师拉斯基。因此,较之前辈,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带有更浓厚的英国特色。在他看来,英国的《泰晤士报》是自由报刊的典范。他的办报理想就是能够效仿英国的自由主义实践,办一份类似于《泰晤士报》的报纸,因为报纸的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且不说《泰晤士报》并非就如储安平所认为的那样能够完全摆脱资本的控制,彻底地独立,单从他在当时中国的形势下,办出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其勇气和胆量也是非同一般的。但最后的

^① 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③}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7 年,第一卷第 1 期。

被迫停刊也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他后来在复刊号上刊发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所言:“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①这份以“本刊同人”刊发的文章,可以看出储安平对自由主义新闻观的理性反思。

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是中国新闻史上追求新闻自由的一次尝试,值得新闻界后人学习和借鉴。储安平本人对新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良知。我们不能说储安平没有看到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是不允许有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出现的。但是,他确实是过于理想化了,错误地估计了自由主义报刊在中国的发展形势。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之受到两方面的夹攻。加之《观察》周刊的作者和读者都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缺乏最底层也是当时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最终使他的理想归于失败。虽然他的尝试失败了,但这份刊物和他本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笔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活。

二、“文人论政”高峰的表现

储安平常常强调言论对于国家的意义以及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责任。他认为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那么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就在一个部长之下;办刊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替国家培养元气。以上思想与邵飘萍、张季鸾等人的“新闻救国”“文章报国”的个人理想是一致的,也是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襟怀一脉传承的。储安平所办刊物的名称由《客观》到《观察》,也表现出储安平对国家的关注更为积

^① 储安平:《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观察》,1949年,第六卷第1期。

极、主动。

储安平强调中国需要无畏的言论和有决心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作为作者,储安平敢于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其不少时论作品如《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堪称是新闻界勇于争取新闻自由的典范;作为编者,储安平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敢于组建知识分子监督社会、评论政府内外政策的论坛,敢于刊载《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点名批评政界要人等的时论,这充分体现出了“文人论政”传统中的批判意识,也呈现出了自古以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知识分子气节。

储安平认为时论的写作和编辑都不应当涉及私人恩怨,不能存有私人攻讦和偏见,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达到利欲的目的。这与梁启超的“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摸棱,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必将有辟于亲好,辟于所贱恶,非惟自蔽,抑其言亦不足取重于社会也,故勉避之”^①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与邹韬奋的“撰述评论的人最重要的品性是要能严格的大公无私,要绝对不肯夹杂私的爱憎、私的利害在里面,要绝对能乘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私人的情面而作违心的言论”^②的观点是相契合的,这些均是“文人论政”传统中知识分子“天下为公”思想的生动体现。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注重教化的作用,几乎每个阶段的论政文人都意识到评论对国人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时报》《新青年》《京报》《生活周刊》《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报刊评论,或鼓励激烈的革命,或提倡渐进的改良,大多竭力宣扬爱国主义,积极宣传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倡导塑造国民理想人格。《观察》也不例外,储安平强调自己的工作是影响思想的工作,期望时论在振奋国民、教育青年

① 梁启超:《〈时报〉发刊例》,《时报》,1904-06-12。

② 邹韬奋:《征求一位同志》,《生活》周刊,第五卷第34期。

和宣扬进步价值观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这种观念无疑是对“文人论政”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三、自由主义的绝唱

《观察》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试图运用“自由主义”变革中国的理想。这些理想既涵盖了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宽容、理性和平等的基本理念,更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剧烈转型的特定环境下,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索。20世纪40年代的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绝对不是一群只会“之乎者也”的书生,社会的巨大震动将他们的目光牢牢地锁在各种现实问题上。但他们的理想很快又被证实不过是“纸上谈兵”。如果说知识分子对现实投入了足够的关注,但他们却恰恰忽视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现实:一是广大人民普遍处在一种蒙昧的状态之中,动荡的岁月让他们要为生活的温饱而忧虑;二是广大官僚普遍脱胎于孔孟之教,思想的不兼容让他们对许多新事物拒而远之。这两个现实问题又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他们的呐喊无法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

当时,对于广大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老百姓来说,“一碗饭”的确比“一张票”来得重要。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依旧理想地认为:“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达到兼而有之的地步”,而“‘吃饭第一’的理论并非遍效,至多只可用作一时期中斗争的口号,而不能真正使大众满足”。^①但知识分子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认识上的理想化,他们最重大的缺陷在于手中未能掌握一丝的行政资源。因此,他们所有的现实呼吁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政权来实现。然而,他们的理想与当时的政治实际又都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又怎能奢望一个政权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的意见呢?

广大人民群众较低的文化水平也是导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迅

^① 杨人楩:《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观察》,1948年,第五卷第8期。

速走向“失败”的原因。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认为,即使不能对当局产生即刻的影响,但或许也可以通过长期的教育、宣传,达到对大众进行启蒙的目的。储安平在卷首语中就明确表示,《观察》办刊的目的是一是评论时事,二就是从长远上,对民众尤其是青年进行教育,希望对他们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这在实质上就是对“启蒙”民众的渴望。^①但这样的“启蒙”从五四运动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都未能达到良好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一个文化水平极度落后的贫穷国家,民众是很难去接受所谓“自由”“民主”等“高深”的理论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务实的策略:从大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开始,中国共产党以最浅显的口号、以最实际的方法,让广大老百姓听得懂、摸得着,最终以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为旗帜,团结了最广大的群众,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国内诸多马列研究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做法称为成功的“启蒙运动”。两种启蒙,思路不一,效果迥然。

在一个秩序失控的年代,理性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令人感慨的是,他们虽然对于失败早有预感,但仍旧埋头向前。这种不渝的理性精神,或许就是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光辉。他们执著地呐喊,他们的声音虽然很快淹没在历史的轰鸣中,但他们的理想一直放射着理性的光芒。

《观察》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匆匆起落,储安平等人“文人论政”的理想在这里得到了短暂的实践。他们以一份刊物的力量在全国的舆论界造成了巨大的声势,并引起了久久的历史回响。但是,他们虽怀揣着热忱的政治理想,但毫无实际的政治手段;他们所坚守的这块文人论政的阵地,注定无法改变整个中国的政治局面。“硬性”“高级”“理性”,成为他们理想的定格,并以这种优雅的姿态进入历史的回忆。

^①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7年,第一卷第1期。

参考文献

一、历史文献

1.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影印版). 黄时鉴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万国公报(影印本). 中国台北:华文书局,1968.
3. 申报(影印本)(第二版). 上海:上海书店,1995.
4. 最近之五十年.《申报》纪念特刊. 1923.
5. 清议报(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1.
6. 时务报(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1.
7. 新民丛报(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1.
8. 生活周刊(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1.
9. 大公报(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0.《观察》周刊. 1946年9月—1948年12月.
11. 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3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12. 文史资料选辑(第39卷第114辑).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2.
13. 中国新闻年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4. 新闻研究资料(总34期).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二、学术著作

1.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共3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下册). 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3.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 黄天鹏. 报学丛刊一集(报学杂志). 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29.
5. 黄天鹏. 中国新闻事业(民国丛书第三编). 上海:上海书店,1991.
6. 胡太春.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
7.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8. 汪治年. 汪穰卿遗著(8卷). 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9. 汪治年. 汪穰卿先生传记、遗文(中国近代史料丛书). 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0.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 上海:上海书店,2001.
11. 徐宝璜. 新闻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2. 赵敏恒. 外国人在华的新闻事业. 上海: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13. 张静庐. 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 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2.
14. 赖光临. 梁启超与近代报业. 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
15. 赖光临. 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 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16. 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17.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8. 汤志钧. 戊戌变法时期的报刊与学会. 中国台北: 台北商务出版社, 1993.
19. 徐载平, 徐瑞芳. 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20. 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21. 曾虚白. 中国新闻史. 中国台北: 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 1966.
22. 孙文烁. 新闻界人物·梁启超.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
23. 张品兴. 梁启超全集(第一至第十卷).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24.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25. 李喜所, 元青. 梁启超传.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6. 夏晓虹编. 追忆梁启超.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7.
27. 李良荣. 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28. 杨光辉.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6.
29. 童兵, 林涵.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30. 黄敏兰. 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 梁启超.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31. 王洪钧主编. 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 中国台湾: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32. 邹韬奋. 韬奋文集. 北京:三联书店,1978.
33. 邹韬奋. 韬奋新闻出版文选.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34. 郝丹立. 韬奋新论.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35. 俞月亭. 韬奋论.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36. 韬奋纪念馆. 邹韬奋研究(第二辑).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37. 冯春龙. 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 扬州:广陵书社,2005.
38. 陈挥. 韬奋传.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9. 钱小柏,雷群明. 韬奋与出版.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40. 姚福申. 中国编辑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1. 王建辉. 出版与近代文明.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42. 徐柏荣. 杂志编辑学.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43. 许清茂. 杂志学.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44. 李频. 中国期刊产业发展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5. 郑兴东,陈仁凤,蔡雯. 报纸编辑学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6. 张季鸾. 季鸾文存(一、二册). 天津:大公报社,1944.
47. 张育仁. 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48. 王芝深,刘自立编.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49. 徐铸成. 报海旧闻.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0. 周雨编. 大公报人忆旧.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51. 王文彬. 新闻工作六十年.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52. 孔昭恺. 旧大公报坐科记.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53. 黄瑚.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4. 薛飞. 凌云健笔——中国记者中的大手笔.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55. 徐铸成.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北京:三联书店,1986.
56. 胡文龙主编.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7.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8. 吴廷俊. 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59. 张新颖编. 储安平文集.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60.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三联书店,2001.
61. 邓加荣. 寻找储安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62. 戴晴. 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
63. 冯英子. 报海忆旧. 太原:山西书海出版社,1991.
64. 龚书铎. 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65. 胡适.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66. 欧阳哲生编. 胡适文集(5).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7. 谢泳. 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68. 许纪霖. 无穷的困惑. 北京:三联书店,1988.
69. 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 北京:三联书店,2002.
70. 张汝伦. 现代中国思想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三、学术论文

1. 徐新平. 王韬的新闻思想. 新闻三昧,2006(10).
2. 马艺. 论王韬新闻言论的思想内容及特征.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3. 王润泽. 王韬办报思想中的西学渊源. 国际新闻界,2005(3).
4. 王琴琴,定莹莹.“立言通才”:王韬的新闻思想精髓. 文教资料,2006(17).
5. 王斌,施素雯. 略论王韬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舆论思想. 东南传播,2006(5).
6. 马增强. 王韬与中国报刊. 华夏文化,2004(1).
7. 赵敏. 谈王韬的报刊思想及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开创意义. 华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05(4).
8. 周韞. 风雨如晦寒气破晓——王韬的启蒙之路. 江苏地方志,2003(4).
9. 傅美林. 论王韬的洋务思想. 历史教学,1996(8).
10. 王仕文. 试析梁启超新闻思想对中国自由传播的影响.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12).
11. 蔡国兆. 梁启超新闻思想试析. 新闻大学,2000(3).
12. 徐新平,覃林.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新闻三昧,2006(11).
13. 张丽萍,刘寒娥.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 社会科学辑刊,2002(6).
14. 龙黎飞. 略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嬗演轨迹. 云梦学刊,2004(3).
15. 刘汉武. 试论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07(5).

16. 柴志芳,杨小强. 试析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产生、转变和发展.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6(1).

17. 王雁. 试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18. 孙文铄. 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纪念梁启超诞辰 120 周年.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

19. 孙景峰. 邹韬奋的出版广告思想与实践. 出版发行研究,2000(10).

20. 吴瑞民. 论邹韬奋报刊思想的民众观. 编辑学报,1998(2)

21. 高建立. 论邹韬奋的编辑思想. 许昌师专学报,1997(2).

22. 张亚华. 试论邹韬奋新闻思想的内涵及现实主义. 新闻传播,1997(1).

23. 雷群明. 邹韬奋论职业道德. 编辑学刊,1997(1).

24. 丁滢林. 邹韬奋的报刊广告观. 新闻大学,1996(春季号).

25. 武志勇. 论韬奋的对读者负责精神. 编辑学刊,1995(6).

26. 徐广芬. 韬奋与编辑出版工作. 出版科学,1995(4).

27. 刘亚,夏锐. 浅谈韬奋的读者观.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4(5).

28. 夏晓林. 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文人论政”.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2(1).

29. 王永亮,邓相超. 近现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 新闻爱好者,2002(3).

30. 宋志标. 回到文人论政,坚守专业主义. 青年记者,2008(6).

31. 来丰. “文人论政,商业经营”——张季鸾的报业经营观. 新闻天地,2001(1).

32. 汤耀国.《大公报》文人论政爱国主线.新闻周刊,2002(15).
33. 张承宇.试论文人论政形成的外因.新闻界,2008(2).
34. 韩晓,张蕴华.从专业主义视角看新记《大公报》的成功之道.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
35. 全燕.论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变化.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2).
36. 徐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读书,2000(1).
37.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二十一世纪,1997(8).
38. 谢泳.储安平编辑生涯.编辑之友,1994(6).
39. 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3).
40. 朱学勤.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12-25.
41. 林建华.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评析.史学集刊,2002(2).
42. 李庆西.何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读书,2000(2).
43. 林元.从《观察》到《新观察》.新闻史料,1989(4).
44. 方小平.储安平和他主持的《观察》周刊.民国春秋,2001(4).
45. 丁滢林.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新闻大学,2004(秋季卷).
46. 郭汉民.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述论.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9(3).
47. 姜红.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流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2).
48. 宁树藩.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国新闻年鉴,1982.
49. 汪荣祖.自由主义与中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0(12).
50. 宋石男.中国近代报纸发展滞后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6(4).

51. 傅国涌. 笔底波澜: 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 广西大学学报, 2006(5).

四、硕士博士论文

1. 夏红娣. 文化认同和自我建构的两种方式.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2. 瞿长虹. 以王韬为例, 论报刊思想与报人社会性的关系. 吉林大学, 2007.

3. 雷蕾.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关口.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4. 梁媛. 论梁启超的新闻人才观. 湖南大学, 2002.

5. 李华. 邹韬奋与中国近代新文化. 山东师范大学, 2002.

6. 陈勇. “事业性”与“商业性”的成功链接.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7. 芦莉菲. 邹韬奋媒介经营管理思想研究. 河北大学, 2006.

8. 刘江浩. 报人张季鸾办报思想研究. 兰州大学, 2007.

9. 王瑛. 报人张季鸾及其社评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10. 高鹏铭. 试论中国现代民营报人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及实践.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11. 王先孟. 论《观察》时期储安平的新闻思想. 兰州大学, 2006.

12. 张阳. 1948年的《大公报》与中国社会. 山东大学, 2005.

13. 郑林. 《观察》周刊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的自由主义文人论政. 厦门大学, 2007.

五、外国文献

1. [美]张颢. 梁启超与过渡时期思想(1890—1907).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2. [日]狭间直树主编.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 [美]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 杨品泉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 [美]胡素珊. 中国的内战:1945—1949 的政治斗争.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5. [美]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 长沙:岳麓书社,1999.

后 记

2008年的夏季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我们的国家承受住了汶川大地震的劫难和国内外各种各样的骚乱和鼓噪后,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西方的许多新闻媒体盛赞这一届奥运会是无与伦比的。确实,在高居榜首的51枚金牌方面,在开、闭幕式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方面,在整个运动会的组织、协调和软硬件建设方面,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华民族综合实力的一次辉煌展示。那些绽放在鸟巢上空的礼花,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自强不息、发愤图强、走向世界、和谐发展的精神内涵的光彩诠释。

历史是一条长河,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中间的一朵浪花,只不过掀起这朵美丽浪花的动力来自中国。抚今追昔,100年前的1908年,国事凌夷的中国对奥运会的向往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以至于南开大学的学生只有在校刊上表白他们嗷嗷的期盼。由此上溯一个多甲子,正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从那时起,中华民族江河日下,国将不国。但是,内忧外患、强邻环伺并没有让我们这个民族臣服和失去思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反而激发出我们骨子里救亡图存的精神。也是从那时起,我们的先贤们开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和技术等诸多方面探寻救国之道。他们的求索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引发了武昌起义的枪声,汇成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2008年,我们国家又一次以一场体育盛典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魅力。

我们一直在圆着一个梦。这个梦,让我们对这个国家竭忠尽智的深厚情怀薪火相传。作为一名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在这

个夏天,面对着日新月异的国家,我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新闻的领域,投向了那些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复兴富强而摇笔呐喊、殚精竭虑的新闻界先贤们。我感喟于他们心中永远燃烧的爱国之情,感喟于他们胸中永不泯灭的报国之志,感喟于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壮怀激烈,感喟于他们敢于以言论政的身体力行。一百多年来,他们执著于“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理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驱之”,愈挫愈奋,前赴后继,不仅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的灿烂篇章,而且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值得我们去总结、去汲取、去扬弃,并以一种合适的形式,服务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本书从构思到动笔,经历了约一年多时间,准备的时间就更为长久。我自1998年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文人论政”的选题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选择在奥运之年完成这一选题,既是对多年来心愿的一个小结,也算是对先贤们的一种追思和怀念吧。

在这里,我要感谢方汉奇先生,先生的亲切关怀和诸多著作,让我受益终身;感谢刘建武、宋元林先生,他的言传身教,坚定了我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做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决心。感谢向阳先生,我还是少年的时候,在北京求学的先生就为我带回了许多新奇的东西,这些东西(含精神的、物质的)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感谢张鹰、余海波、李伦娥诸先生,他们的垂视,让我还是一名普通编辑的时候,眼前就打开了一扇充满魅力的新闻之门;感谢曾景祥、杨国平、李毅松、石峥嵘诸先生,能与诸位同事是我的幸运,他们的关心、鼓励和宽容,是本书能够按时完成的重要保证;感谢张亚东、何频、米华、张新康、彭南海先生,我们在平凡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他们对我的情义。

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感谢郭发仔先生促成此事,感谢蒲浩责任编辑的辛勤劳动。我们从事着相同的事业,因为这本书而相识、相知,这是一种令人庆幸的缘分。诸位的鞭策和厚望,长

系我心,并督促着我前进。

2008年10月于湘潭